

副总编辑：李瑞虹

邮发代号：82-714

责任编辑：周彤

国际标准连续出版物号：ISSN 1003-0484

美术编辑：刘燕

国内统一连续出版物号：CN 11-2546/D

印刷：北京博海升彩色印刷有限公司

海外总发行：中国国际图书贸易集团有限公司

国内发行：北京市报刊发行局

海外发行代号：BM1082

订阅：全国各地邮局

定价：国内每本 10.00 元 境外每本 3 美元

48 当前台湾问题“国际化”情势日益严峻的原因、危害 / 陈文杰

两岸交流 CROSS-STRAITS EXCHANGES

50 武夷岩茶与台湾乌龙茶的渊源 / 杨瑞荣

52 2021 年 8—9 月海峡两岸大事记

宝岛之声 THE VOICE OF TAIWAN

56 疫情背景下两岸关系的危机与转机 / 台湾 刘奕伶

会务园地 BULLETIN OF CCPPR

59 从反“独”促统历史中汲取智慧和力量（下）

——反“独”促统运动 50 年历程简述 / 权伟东

63 抗疫访谈录 / 宋磊

海外统促会之声 VOICE OF CCPPR OVERSEAS COUNCILS 65

68 中国共产党是领导中国人民完成祖国统一大业的核心力量

/ [澳大利亚]陈蔚东

72 七十二年，与祖国同行 / [挪威]马列

文化

华夏文苑 ESSAYS

74 解民心契合之难题 注台湾研究之活水

——读陈孔立《两岸的文化认同》 / 李仕燕 李智聪

历史

历史顾往 HISTORICAL RETROSPECTIVE

77 “五四”影响在台湾 / 程彩霞



《统一论坛》集孙中山先生之墨宝

著作权使用声明

本刊已许可中国知网、超星期刊以数字化方式复制、汇编、发行、信息网络传播本刊全文。本刊支付的稿酬已包含中国知网著作权使用费，所有署名作者向本刊提交文章发表之行为视为同意上述声明。如有异议，请在投稿时说明，本刊将按作者说明处理。

合作媒体：



《统一论坛》联络处

台湾

台北市大安区新生南路一段138号之1, 4楼之1(荣爵大厦)
电话:00886-2-23969678 传真:00886-2-23979678

香港

香港九龙红磡崇安街18号半岛广场17楼1701-11室
电话:00852-31517576 传真:00852-31517977

澳门

澳门士多纽拜斯大马路1-1B号东曦阁3楼A座
Avenida de Sidónio Pais, No.1-1B, Edf. Tung Hei Kok,
3 andar A, Macau
电话:00853-28702791 传真:00853-28703531

喀麦隆

B.P 13000 Douala CAMEROUN
电话:00237-9993352 传真:00237-3437633

南非

39 Faiesiand Ave. Cyrildene Johannesburg 2198 South Africa
电话:0027-11-6228521、6164816、6156068
传真:0027-11-6163720、6228534

尼日利亚

Golden Gate Complex.25B Glover Road. Lkoyi. Lagos, Nigeria
电话:00234-1-2695337 传真:00234-1-2695192

菲律宾

Unit 1108 Dasma Corporate Center #321 Dasmariñas St.,
Binondo Mla Philippines
电话:0063-2-2477141 传真:0063-2-2449973

日本

横滨市中区山下町166番地中山纪念堂1階〒231-0023
电话:0081-45-6818879 传真:0081-45-6643278
日本国东京都中央区银座八丁目2番12号〒104-0061
电话:0081-3-35717611

韩国

首尔特别市江南区新沙洞587-13番地新东和B/D
电话:0082-25438833 传真:0082-25428280

泰国

149 Galaxy Place, Nonsee Road (Rama III)
Chongnonsee Yannawa, Bangkok 10120 Thailand
电话:0066-26811777 传真:0066-26811764

爱尔兰

9 Kilcronan Court, Clondalkin Dublin 22, Ireland
电话:00353-1-4578193 传真:00353-1-4578193

比利时

GROTE MARKET 38 9100 SINT-NIKLAAS BELGIUM
电话:0032-3-7760565 传真:0032-3-7767470

波兰

02-202 ul.drawska 17, Warszawa Poland
电话:0048-22-8223062/63 传真:0048-22-8223061

丹麦

OESTERBROGADE 132 2100 COPENHAGEN OE DENMARK
电话:0045-40412238 传真:0045-35428033

俄罗斯

电话:007-095-7377941 传真:007-095-1664319

荷兰

Francina spoel straat 21 2135 HK Hoofddorp Holland
电话:0031-647490890 传真:0031-235354661

罗马尼亚

Romania Bucureati Bd. Basarabia, Nr.244, BL.MYB, Sc.B, Ap.39
电话:0040-722227038 传真:0040-213482122

葡萄牙

Av. Boavis TA 1588, SALA 314, 4100 PORTO-PORTUGAL
电话:00351-917847880 传真:00351-226063289

塞尔维亚

JURIJAGAGARINA 87/229 SRVIJA BEOGRAD
电话:0038-163249888

传真:00381-11-2260874 00381-11-3185788

西班牙

C/LEGANITO 4' ' 1B 28013 MADRID SPAIN
电话:0034-915422324 传真:0034-915481994

意大利

MONTESUELLO 9 MILANO ITALIA
电话:0039-3386309396、0039-021701258568

传真:0039-0270125856

英国

61 FitzJOHN' S Ave London NW3-6PH U.K.
电话:0044-207-4356087 传真:0044-207-1688501

哥斯达黎加

De la entrada principal de las piscinas de plaza viquez 100 metros al norte
sobre la linea del tren apartamentos de color Amarillo con portones de color
café .San Jose, Costa Rica

电话:00506-22227952 / 88856468

美国

370 RIVERSIDE DR. #2A New York N.Y.10025 U.S.A.
电话:001-917-2243356、001-212-2221699

传真:001-212-2221699

墨西哥

Calle Azucena No:4061 Esq con Blvd.Aguia Caliente Plaza
Estancia Local 7 Fracc.Del prado C.P.22105 Tijuana, B.C

Mexico 电话:0052-664-6080188 传真:0052-664-6084666

澳大利亚

Suite 97, Level 9, 420 Pitt Street Sydney NSW 2000 Australia
电话:0061-2-92818911 传真:0061-2-92818966

斐济

26 LAUCALA BAY ROAD SUVA FUJI P.O.BOX17019
电话:00679-3362829、9916823 传真:00679-3311288

瓦努阿图

P.O.BOX 282 PORT VILA VANUATU
电话:00678-22881 传真:00678-26848

新西兰

NZ Wgtn Assc Promoting Peaceful 16 Arnot Ave
Upper Hutt New Zealand

电话:0064-4-5266518 传真:0064-4-5266518

巴西

RUA DOS ESTUDANTES, 15 APTO.33 LIBERDADE
SAO PAULO BRASIL CEP 01505-001

电话:0055-11-32098762 传真:0055-11-32720180

厄瓜多尔

AV AMERICA 109 Y JOSERIOFRIO QUITO ECUADOR
电话:00593-2-2236624 传真:00593-2-2507786

智利

Av. Chile Espana 330 Nunoa Santiago-Chile
电话:0056-2-2250945 传真:0056-2-2250945

从拜登政府对华与对台角度 看美军撤出阿富汗

■ 周忠菲

8月5日美国从阿富汗撤军，世界各国反应不一。在全球资本主义国家面临深层次危机、中美博弈多层次展开的今天，对美军撤出阿富汗的世界影响如何进行深入的讨论，尚有待时日。但从拜登政府对华与对台角度，提出一些联想，做一些大线条的基本分析和比较，是可行的。

联想之一，美国此举背后的主要原因是什么？美国是不是要在亚洲进行力量收缩？联想之二，从地缘政治角度看，美军撤出阿富汗这样的大动作，对美国印太战略，对未来中美关系，会有什么影响？联想之三，美中博弈更加激烈复杂的趋势下，已被绑在美国战车上的台湾民进党当局，恐怕还要再当一段时间的“冤大头”，替美国继续出钱出力。

本文将讨论这样的观点：其一，拜登政府的“美国回来了”，核心仍然是美国霸权，美国利益至上，这是美国价值观最根本的特征，美国在世界各地历来如此。美军撤出阿富汗，传递到美国对台政策，民进党既是卒子，又是弃子的地位，将进一步

两面“受煎”。一旦被美国抛弃，下场就是如今的阿富汗。

其二，在台湾问题与地区和平与安全关系方面，拜登政府将显示出更多地强调中美合作，而不是强化中美战略博弈的倾向。但这是手段而不是目的。在对华政策上，用台湾问题迟滞中国发展的政策方针，还没有进入“不归点”。

其三，从美国对自身利益的判断，受中美博弈结果影响，从美国对海峡地区安全结构调整的需要看，美国与民进党的关系出现往相反的政策取向发展，其可能性将越来越大。美国对外政策的所谓弹性，必然引发岛内疑惧。这种担忧，无疑将对台湾政治格局走向产生影响。

对撤军背景的分析 ——美国国内政治与经济状况恶化

美军撤出阿富汗是战略决策，背景是拜登政府在经济和金融方面处境的继续恶化。自特朗普执政后期起，美国财政部长就承认经济问题严重。拜登执政以来，全球债务规模继续

创新高。目前民主党政府的最大困境，仍然是一直存在的债务问题。根据美国国会预算办公室测算，截至6月30日，美国债务总额28.5万亿美元，是国内生产总值(GDP)的3.7倍，逼近二战时期历史高点。问题的主因是债务利息上升，以及疫情带来的医疗赤字加重。

美国经济仍然世界第一，能够影响世界，世界也对美国寄予期望。但拜登政府大印钞票，饮鸩止渴的“旧招”，没有给美国经济发展带来明显起色，反而出现处于失控边缘的迹象。进入7月，生产者价格指数连续6个月大幅上涨，同比增长7.8%，创历史新高。消费者信心指数大跌。预计到9月政府补贴结束后，经济和金融情况还会更糟。这种趋势除了引发民众对通货膨胀的恐慌外，民众对政府振兴美国经济计划也出现质疑。对于拜登政府而言，适度收缩海外军事力量，展示在经济与军事力量之间进行平衡的能力，提振美国经济的信心，已经刻不容缓。

因此，美军撤出阿富汗追求的第一效应，是力图维持美国

金融与经济稳定，减少世界对美国可能被拽入经济衰退深渊的疑惧。撤军过程中暴露的问题，美国内部的利益分歧，政党之间的相互暗算等，是第二位的。

利益至上： 撤军与美国在亚洲的存在

拜登政府所谓的“美国回来了”，核心仍然是维护美国霸权，保证美国利益至上。美国价值观认为，美国是海洋强国，维护美国海上霸权，全方位遏制中国发展，是美国的基本战略。地缘政治博弈方面，美国视中国为海上和陆上对手，其中，东亚、南亚、西亚和印度洋是美国策划与中国进行地缘政治博弈重要舞台。从阿富汗撤军，是拜登政府在地缘战略上对美国利益至上原则的执行。战术上，包含实现以退为进，增强美国在亚洲存在的企图。这一点，可以说是“萧规曹随”，是特朗普时期收缩政策的继续。

有两个例证。一是2020年2月19日，特朗普政府与塔利班签署和平协定。当时塔利班政权的国家地位尚未被美国认可。二是拜登政府执政百日之际，美国公布一项民意测验。数据显示，美国公众对拜登政府按和平协定规定，将于8月31日最后期限前执行从阿富汗撤出美军的决定，支持率69%（撤军后降

到49%）。

撤军的地缘政治效果方面，拜登政府预期之一可能是对美国的印太战略进行修补，在阿富汗问题上，给一直争夺南亚霸权，受到疫情重创的印度“提供空间”，以换取印度继续保持东进战略，促使印度在美国印太战略中进一步“履行同盟义务”。

预期之二可能是通过“收缩”，从地缘上强化对中国的军事威慑。这种立足于美国地缘政治中长期存在的，具有强烈偏见和成见的主张认为，在太平洋东南部，即所谓太平洋边缘地带，美国应重视台湾的地缘战略位置。应通过增强美日同盟的军事威胁，怂恿日台勾结，增强美台军事关系等手段，实现在西太平洋对中国进行有效遏制的战略目的。这种主张说白了，就是热衷于通过战争手段进行威慑，从而达到控制战争实质性发生的目的。包括对日台心怀鬼胎的利用。当然，美国手中也不缺“应对的手段”。

但所谓以退为进，增强美国在亚洲存在的地缘战略设想，存在致命缺陷。上世纪70年代，也是在经济出现危机的背景下，尼克松政府决定进行美国力量在亚洲的收缩，以“快刀斩乱麻”方式走出战争泥潭。其所依持的地缘战略支撑点，是尼克松与基辛格设计的和平架构下中美关系的打开。

拜登政府在战略上将中国列为假想敌，所依托的同盟体系，在与中国为敌上表现三心二意，各有各的盘算。对中美博弈见风使舵，是他们的基本特征，因此所产生的地缘政治影响，相对有限。印太战略的修修补补，对美国而言远水解不了近渴。近期，美国猛跑东南亚，就是这个原因。此外，手段也存在问题。当年尼克松推行“疯子逻辑”，对越南狂轰烂炸。特朗普也曾试图模仿“疯子逻辑”，但惨遭失败。美国操纵下抛出的“南海宣言”，最终变成“一张废纸”的事实说明，中国对中美在亚太地区安全上的博弈“成竹在胸”。即使美国“吃下豹子胆”，妄图在中国周边搞狂轰烂炸，也被现实提醒，此举根本行不通。

今天的整个时代背景，是包括美国在内传统资本主义国家正面临一场经济与政治深层危机。在发展方向上，美国与西方的引领地位正在动摇。在逆全球化与继续全球化夹击中，世界的不确定性增加。这种局势下，作为世界经济第二强国的中国，其在亚洲的存在本身就具有强大现实意义。美国故意“视而不见”，只会弄巧成拙。中国对美国反制能力的继续提升，已经不可遏制。对此，不但中国而且世界也都心中有数。这也是人们感叹“昨日越南，今日阿富汗”的言外之意。

美国的“一箭双雕” 与民进党成为“冤大头”

当然，美中关系复杂，美国国内关系更复杂。国际关系格局瞬息万变，拜登政府应对国内外局势变化的压力空前增加。从美国一贯打“台湾牌”谋取自身利益角度看，美国从阿富汗撤军的行动，传递这样一个信号，即不排除在非常情况下，美国对台政策有出现180度大转弯的可能。理由也将是冠冕堂皇的，如“为了稳定地区和平”，为了“实现对‘台独’的有效管控”等。循此联想发展，民进党当局有可能从受美国鼓励的、“勇闯中国红线”的卒子，一夜之间变为美国的弃子。

但美国的“一箭双雕”不会局限于此。从美国立场看，既要民进党对美国做出保证，继续“谋分裂”“谋台独”，对中国大陆进行高调反应方面按美国棋谱移动，又要利用民进党害怕成为弃子的心理，驱使民进党在岛内政治斗争中拼命厮杀，台湾社会将更加分裂。这种局势的出现，反过来可以达到增强美国对台湾岛内政局影响力的目的。民进党当局除了在“武器售台”等方面继续按美国规矩办事外，对美国可能给国民党以扶持或加强控制的举措也要忍气吞声，“两面受煎”。这是民进党对美国一边倒的结果。

民进党对美国从阿富汗撤军的反应，暴露了此种尴尬地位。蔡英文就阿富汗局势是否引发岛内恐慌发言时称：“台湾唯一的选项就是让自己更强大、更团结、更坚定地保卫自己。”其实她暗示的是，台湾需要美国继续售武，再贵也不怕。因为台湾需要美国进一步的军事支持，需要美国承诺不会放弃台湾，愿做不折不扣的“冤大头”。

无独有偶。蔡英文讲话前一天，美国国家安全事务助理沙利文就美国是否最终会抛弃台湾的疑问作答时，采用外交语言表达。原话是：“台湾的情况与阿富汗不同，我们对台湾的承诺一如既往地坚实。”民进党期盼的，拜登政府对台政策的逐渐清晰，没有出现。在是否“出兵相救”问题上，仍然保持模糊。

需要指出的是，如果拜登政府采用地缘政治和军事手段对付中国，只会使美国面临的问题越来越多，应接不暇。选择与中国冲突，非但不能实现美国的地缘战略目的，反而会由于中国对美国的牵制，引发世界对美国经济持续发展的怀疑。

也许这些因素，正是拜登政府需要考虑的。8月16日，中国国务委员兼外交部部长王毅应约同美国国务卿布林肯就阿富汗局势及中美关系通话。布林肯强调，美中对重大国际地区问题保持沟通，就地区安全问题开展合作

“非常重要”。王毅讲话的重点，在于强调“面对层出不穷的全球性挑战和亟待解决的地区热点问题，中美理应开展协调合作”。王毅打开天窗说亮话，强调中美合作“是国际社会的普遍期待”。此外也告诫美国，不肯放弃遏制和打压中国的盘算，同时又“指望中方的支持配合”，在国际交往中，“不存在这种逻辑”。

综上所述，美国的不稳定，使美国成为影响世界不稳定的最重要因素。世界进入重大历史转换期，国际格局的不稳定，仍然是主要趋势。美国从阿富汗撤军，意义是复杂的。中美博弈，或者说对抗与合作，将更加曲折。

中美关系严重冲突，中美几次对话，收效甚微，根本原因是中国发展，西方已经没有办法阻拦。与此同时，美国也不会自动放弃地缘政治方面对中国进行战略讹诈的企图，美国对华政策可能是一个倾向掩盖另一个倾向。

从对台角度看，美国就阿富汗问题与中国沟通，显示在大方向上，拜登政府保持了台湾问题不脱离中美关系框架的立场。此外，在地区安全上，美国保留了战略模糊，说明美国将继续打“台湾牌”。不难想象，民进党当局还会继续“睁开眼睛说瞎话”，继续煽动“台独”分裂主义，以掩饰自己在美国的卒子与弃子之间挣扎的地位。📌

沿着“天路”进西藏，看70年经济民生巨变

■ 李晗雪

沿着318国道进藏，芒康、波密、林芝、拉萨、日喀则……串连起西藏奇绝的美景。许多人说，这是中国“最美国道”。

318国道，起自上海，终点为西藏自治区日喀则市聂拉木县，全程5476千米。其中最早开始修建的，是成都-拉萨线。1951年和平解放前，西藏没有一条现代意义上的公路。1950年初，解放军奉命进军西藏、完成祖国大陆统一的历史使命时，毛泽东指示进藏部队：“一面进军，一面修路。”11万人民解放军、工程技术人员和各族民工用铁锤、钢钎、铁锹和镐头劈开悬崖峭壁，降服险川大河，在4年多时间里，修起了穿越横断山脉的川藏公路。

1954年12月，川藏公路、青藏公路同时通车，成为进出西藏的两条“大动脉”，结束了西藏没有公路的历史，也创造了人类公路建设史上的奇迹。

这，是中国修筑的“天路”的组成部分。

今天，从“天路”进西藏，可以看到，和平解放70年来，这片曾经封闭滞后的雪域高原，已经打通了经济民生从无到“全”的发展血脉。

绝对贫困问题，历史性消除

曾经，西藏是全国贫困发生率最高、贫困程度最深、扶贫成本最高、脱贫难度最大的集中连片特困地区。

在旧西藏，占人口不足5%的三大领主及其代理人几乎占有西藏全部耕地、牧场、森林、山川、河流、河滩以及大部分牲畜。封建农奴制下，占人口95%的农奴和奴隶没有生产资料 and 人身自由，遭受着沉重的赋税、乌拉差役和高利贷盘剥。恶劣封闭的自然环境，更让生活改善难上加难。

“1951年之前，西藏的社会制度是非常落后的封建农奴制，当时的经济几近崩溃，人民生活非常困苦，也导致西藏的经济基础一直非常薄弱。”藏族学者、中国藏学研究中心社会经济研究所研究员格桑卓玛谈道。

西藏和平解放后，民主改革废除了政教合一的封建农奴制，实现政教分离；废除生产资料封建领主所有制，确立农牧民个体所有制；废除对“三大领主”的人身依附，使农奴和奴隶获得人身自由。在民主改革中，农奴和奴隶共分得土地约280多万藏克（约18.67万公顷）。随后，西藏建

立起第一个供销社、第一个农村信用社、第一所民办小学、第一所夜校、第一个识字班、第一个电影放映队、第一个医疗卫生机构。

如果说民主改革使西藏社会制度一步跨千年，近年开展的脱贫攻坚，则让西藏人民生活方式一步跨千年。

中国共产党第十八次全国代表大会以来，连续5年召开深化对口援藏扶贫工作会议，通过精准施策、精准帮扶，在不同地区，因地制宜发展特色产业。例如在农牧区，大力发展青稞和牦牛产业，扶持深加工，创新产品供给，扩展产业链。2020年，西藏共有农牧业产业化龙头企业162家，农畜产品加工业总产值57亿元，比2015年末翻了一番。

在有旅游资源的地区，创新升级“藏文化体验游”，打造“最美318线”，推出“冬游西藏”等。截至2020年，西藏农牧民通过直接或间接方式参与乡村旅游就业8.6万人（次），年人均增收4300余元。

传统文化的市场化开发也受到大力扶持，唐卡、塑像及传统手工技艺如纺织、服饰、家居装



2020年10月18日，西藏日喀则市谢通门县农牧区脱贫致富家庭的四世同堂合影 贡桑拉姆 摄

饰等供需两旺，已形成颇具规模的新兴产业。

与此同时，农村危房改造、异地搬迁等改善居住生活条件的工作也在推进。格桑卓玛对曾去调研的那曲市双湖县嘎措乡印象很深。嘎措乡海拔5000多米，许多村民因为高寒的气候患上风湿性关节炎等疾病，甚至因病丧失劳动能力。近年，嘎措乡村民在政府组织下向海拔较低处搬迁。其中一个搬迁点就设在海拔3800米左右、有温泉资源的拉萨市羊八井镇。村民们不仅住了新房，还能在家中用上温泉水，村里更设有温泉疗养中心。羊八井离拉萨市中心近，就业机会也多。“民众搬迁后，身体、生活的改善很明显。”格桑卓玛说。

2008年以来，西藏39.97万户建档立卡贫困户、农村低保户、分散供养特困人员、贫困残疾人

家庭等4类重点对象，告别了破旧的夯土房、石砌房等危房，住上了宽敞明亮的安全房。截至2020年，西藏在海拔较低、适宜生产生活的地区建成了964个易地扶贫搬迁区（点），26.6万曾居住在藏北高海拔牧区、南部边境地区和藏东横断山区等海拔高条件差、远离腹心市场的地区居民自愿搬迁。全区产业扶贫资金5%用于安置点产业发展，确保每个搬迁户至少“一户一人”就业。

另外值得一提的是，西藏长达4000多公里的边境线上，多数地方生产生活条件一直十分恶劣。在党中央关怀下，边境地区投入逐年增加。截至2020年年底，边境一、二线行政村公路通达通畅，主电网延伸到全部边境乡（镇），实现村村通邮，移动通信网络全覆盖，农村人口饮水安全得到保障。

截至2019年年底，西藏62.8万建档立卡贫困人口全部脱贫，74个贫困县区全部摘帽，历史性消除了绝对贫困问题。“70年来西藏的变化是全方位的，但经济方面最突出的历史性成就，我认为就是消除了绝对贫困，与全国人民一同迈入小康社会。”格桑卓玛说。

产业发展，为美好生活

打下坚实基础

西藏昌都市洛隆县是西藏粮食主产区之一，有“藏东粮仓”的美誉。洛隆盛产的青稞是藏族牧民传统主食糌粑主要原料。

过去的传统手工作坊里，青稞仅有做糌粑一个用处，一天产量仅200多斤。2006年，洛隆县成立了洛宗特色产品开发公司。公司成立后，随着流水线的引入，糌粑日产量达到5000—8000斤；公司还开发出青稞挂面、青稞糕

点等特色产品50多种，销往全国各地。洛宗特色产品开发公司总经理泽仁顿珠告诉媒体记者，目前公司有员工45名，其中38名曾是本地建档立卡贫困户，如今年收入可达近4万元。

拉萨哲蚌寺附近，西藏美术馆正在建设中。而其建筑基础，正是昔日的拉萨水泥厂。

旧西藏没有任何现代意义上的工业企业，仅有一些传统家庭作坊式的民族手工业。民主改革后，西藏先后建成了电力、煤炭、机械修理、化工、建材等80个中小型企业。而1960年建立的拉萨水泥厂，为新西藏的基础设施建设立下汗马功劳。当时，拉萨水泥厂和拉萨皮革厂、林芝毛纺厂、西藏火柴厂，共同形成了新西藏工业文明的象征。

不过，西藏由农业社会向非农业社会的转型，并未遵循传统工业化模式。这里自然资源丰富但生态脆弱，因此，服务业始终占据主导地位，工业则在满足民众生活需求的目标下适度、绿色发展。拉萨水泥厂，正是因工艺技术老旧退出历史舞台，并即将重生为西藏美术馆。这是西藏工业走向可持续发展之路的见证之一。

70年间，西藏形成了以优势矿产业、民族手工业、藏药业、农畜产品加工业、高原特色生物和绿色食(饮)品业、水电能源等工业为主、富有西藏特点的工业生产体系。而旅游文化、高原生

物、绿色工业、清洁能源、现代服务、高新数字、边贸物流7大产业，成为西藏经济发展主引擎。“十三五”期间，7大产业实现增加值超1900亿元。

5月发布的《西藏和平解放与繁荣发展》白皮书介绍，西藏农林牧渔业总产值从1965年的2.64亿元增长到2020年的233.5亿元。2020年，即使受到新冠肺炎疫情影响，西藏规模以上工业增加值增速仍达9.6%，居全国首位。市县乡村四级电商服务全面推开，网络零售额累计突破200亿元。高新数字产业创新发展，数字经济规模突破330亿元。

在保护生态的前提下，西藏的产业发展为西藏人民实现美好生活打下了坚实基础。

“天路”，已是一个四通八达的网络

今天，许多西藏旅游攻略分享着骑行、自驾、火车和飞机进藏的不同体验。而1930年出版的《西藏始末纪要》中形容西藏的道路：“乱石纵横，人马路绝，艰险万状，不可名状。”解放前，从青海西宁或四川雅安到拉萨往返一次，需要半年到一年时间。格桑卓玛说，青藏铁路修通前，还有句玩笑话，出国容易进藏难。

玩笑背后的严峻事实却是，原始封闭的交通极大限制了人流、物流、信息流，严重阻碍西藏经济社会发展。

把铁路修到西藏去！近代中华民族几代人的梦想，终于在和

平解放后成为中国共产党向西藏人民庄严兑现的承诺。

1956年，铁道部正式承担修建进藏铁路的前期规划，青藏铁路列入国家铁路建设议程之内。高寒缺氧、多年冻土、生态脆弱，盐湖、大风、干旱……其中面临的困难几乎都是世界性工程技术难题。许多工人、铁道官兵、科技工作者为修筑青藏线而长眠高原。经过多年攻关，2006年7月1日，世界屋脊上的青藏铁路正式开通运营，西藏自此结束没有铁路的历史。一首《天路》，让全体中华儿女铭记了这份震惊世界的传奇与感动。

今天，“天路”早已不只是“一条路”，而是由四通八达的公路、铁路、航空、管道等多种运输方式织起的综合立体交通网络。

1965年，北京-成都-拉萨民用航线正式通航，西藏迎来空中交通新天路。几十年间，拉萨贡嘎、昌都邦达、林芝米林、日喀则和平、阿里昆莎5座机场渐次建成，国际国内航线达到140条，通航城市66个。西藏建制村已村村通公路，西藏公路通车里程达到11.88万公里。青藏铁路和拉日铁路已建成通车，川藏铁路正开工建设。所有行政村都有移动信号，光纤宽带通达率99%。2020年，阿里与藏中电网联网工程正式投运，西藏实现主电网全区覆盖。

一条条公路、铁路、航线，

将机械和商品送进西藏，将活力和繁荣送进西藏，也给雪域的物产和人才带来了更开阔的远方。

西藏金塔建设集团，从2004年仅有5人的小型农牧民施工队，成长为今天注册资本约6亿的大型民营企业，其成长可谓随西藏经济民生变革而起，也推动着这一变革。金塔集团参与了西藏许多公路桥梁的修建，但集团董事长扎塔说，印象最深的还是修建自己家乡日星乡到日喀则的通乡油路。“心情特别激动，从没想过老家有一天还能通柏油路。”扎塔或许也未曾想到，自己有一天会成为经常往返于西藏和全国各地的杰出企业家。

2016年年底，林芝市墨脱县门巴族村民拉杰在京东商城购买的冰箱送到了家。“冰箱虽不是稀罕东西，但以前不管哪家网站，大件货品都不送墨脱。”2020年11月，位于珠穆朗玛峰脚下的日喀则市定日县扎西宗乡民众，也首次收到了快递包裹。京东大数据研究院数据显示：2021年上半年，西藏家用电器整体下单金额同比2017年增长359%，品类数量增加60%。并且，若是身在拉萨，许多商品，京东物流已做到当日达、次日达。

今天，山不再高，路不再远。

来西藏，看看今天的美好生活

如今来到西藏乡村，会看到自然风光绮丽依旧，人居环境整洁。购物、上学、旅游、去外地工作发展，都已不是难事。



2021年6月25日，川藏铁路拉林段（拉林铁路）正式开通运营。这是西藏首条电气化铁路，也是复兴号动车组首次开进西藏。民众在拉萨火车站复兴号车头前拍照留念 江飞波 摄

扎塔回忆，小时候，日星乡的土坯房不通自来水也不通电。夏天出去放牛放羊可以顺便在河里洗个澡，“冬天就谈不上洗澡了”。为了节省点灯的酥油，家里经常早早就吃晚饭。半年或一年，人们会坐着拖拉机去江孜县、日喀则市购置物品。而现在，日星乡的房屋以钢筋混凝土结构的小楼为主，家家通水通电，家家有小轿车或摩托车，“天天都可以去逛日喀则”。“现在农村很舒服的。”扎塔说。这些年来，金塔集团参与了不少乡村“厕所革命”、庭院改造、污水纳管、垃圾分类、人畜分离等建设项目。

来到拉萨这样的西藏城市，大概更让第一次到西藏的人吃惊：城市道路上车水马龙，道路两边是居民小区、街心花园、共享电动车、来自世界各地的餐饮美食、电子产品旗舰店、大型商场……超市中果蔬品类丰富、日

用杂货选择多样，甚至有琳琅满目的进口商品；星级酒店为远道而来的客人准备了周到服务和24小时热水。绛红或雪白的砖墙下，转经的人群仍在缓步虔诚念诵经文，布达拉宫和诸寺庙依然宁静庄严。但偶一仰头，又能看见飞机划过苍穹，今天西藏与世界又有怎样的往来呢？现代文明与古老文化，在西藏融合出独特的迷人气质。不经意发现的藏装摄影工作室、设计师首饰店和小酒馆，则为西藏城市更增一分国际化艺术气息。很难想象，就在半个多世纪以前，西藏还仅有一座只供少数上层贵族享受的小电站。而今，这里的城市面貌已与中国其他省份城市不相上下。

70年，西藏的变化伟大壮阔，却也具体细腻。或许，感受巨变的最好方式，就是即刻背上背包，沿着“天路”进西藏、走一走。

续

伟大的跨越：西藏民主改革60年 (十)

十、西藏发展进入新时代

2012年中国共产党第十八次全国代表大会以来，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高度重视西藏工作，心系西藏各族人民，从全面建成小康社会、实现“两个一百年”奋斗目标和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中国梦的总要求出发，制定了西藏发展和稳定的大政方针。习近平总书记提出“治国必治边、治边先稳藏”的重要战略思想，作出“加强民族团结、建设美丽西藏”的重要指示，亲自主持召开中央第六次西藏工作座谈会，明确新形势下西藏工作的指导思想和目标任务，确定“十二五”“十三五”中央政府支持西藏的一大批重点建设项目，制定了惠及西藏各族人民的一系列特殊优惠政策。习近平总书记先后致信祝贺第二次青藏高原综合科学考察研究启动、西藏民族大学建校60周年，给隆子县玉麦乡群众回信，为那曲科学种树作出批示，主持研究川藏铁路建设规划，对西藏发展稳定工作作出一系列重要指示批示。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新时代治藏方略，承接着民主改革以来的西藏工作路线方针政策，紧密契合新时代发展需要，不断推进西藏长足发展和长治久安。

新时代西藏的发展坚持以人民为中心的发展思想，坚持创新、协调、绿色、开放、共享的发展理念，努力推动经济社会发展，保障和改善民生，促进各民族交往交流交融，加强生态环境保护与建设，使西藏发展呈现蓬勃生机和强大活力。

——新时代西藏坚持创新发展理念，着力增强经济活力

西藏自治区把创新作为引领发展的第一动力，把创新摆在发展全局的核心位置，大力推动创新驱动发展战略。努力推动制度创新。用供给侧结构性改革引领发展，深入推进国有企业、非公有制经济、

要素市场、财税体制、金融体制、养老保险制度和医药卫生体制等重点领域改革，充分释放发展潜力。以科技创新驱动发展，加大政府引导力度，加快构建以企业为主体、市场为导向、政产学研相结合的科技创新体系，加强科技创新平台建设，推进科技成果转化应用，不断提高科技对经济发展的贡献率。截至2018年，全区已建成众创空间、科技企业孵化器、大学生创新创业基地、小微企业双创基地等“双创”（大众创业、万众创新）载体74家，吸纳创新创业团队和初创企业1338家。一批科技创新企业发展壮大，2018年全区高新技术企业突破50家，同比增长53%；科技型中小企业达75家，同比增长142%。培育了青稞、牦牛、藏医藏药等一系列支撑力强、效益显著的高原特色产业，使特色经济迅速崛起成为西藏经济中最具活力和潜力的亮点。拉萨、日喀则、那曲、林芝4个国家级农业科技园区和林芝国家可持续发展实验区辐射带动作用显著。12家国家级“星创天地”在农牧区科技成果转化和带动群众增收方面发挥积极作用。

——新时代西藏坚持协调发展理念，着力构筑可持续发展格局

针对当前经济社会发展的客观实际，西藏自治区正确处理好国家投资和社会投资的关系，重大项目和民生项目的关系，发挥优势和补齐短板的关系，城镇就业和就近就便、不离乡不离土、能干会干的关系，扶贫搬迁向城镇聚集和向生产资料富裕、基础设施相对完善地区聚集的关系，保护生态和富民利民的关系，城市发展和提高农牧区基本公共服务能力的关系，简政放权和地方承接的关系，以及企业增产提效和改善职工福利待遇、促进农牧民群众增收的关系等，妥善解决全区经济社会问题和发展

不平衡不充分问题。编制乡村振兴战略规划，农村发展新动能持续培育。2018年农民专业合作社达到8364家，农产品加工业总产值42亿元。农村基础设施不断改善，农业防灾抗灾体系、农产品质量安全检验检测体系、动物防疫体系基本建立。村容整治、垃圾污水处理深入推进。行政村通光纤率达到98%。统筹区域协调发展，加快落后地区发展，鼓励各地充分发挥优势、突出本地特色，做大做强特色产业，努力壮大经济实力，形成竞相发展的生动局面，构筑起支撑经济发展的增长点和增长极。积极推进拉萨、日喀则“一带一路”重要节点、面向南亚开放中心城市和前沿城市建设。拉萨山南经济一体化、藏中3小时经济圈逐渐形成。藏东交通、能源建设取得新进展，藏西北生态环境保护不断加强，藏东南全时全域旅游发展强劲。常住人口城镇化率达到31%。

——新时代西藏坚持绿色发展理念，着力建设美丽西藏

西藏自治区牢固树立保护生态环境就是保护生产力、绿水青山就是金山银山的理念，坚持保护优先、建设并重，切实推进绿色发展。严格落实生态环保主体责任，严守生态安全底线，严禁高污染、高排放、高能耗项目进入西藏，严格执行矿产资源勘查开发自治区政府“一支笔”审批和环境保护“一票否决”制。实施生态保护奖励补助机制，安排70万个生态保护岗位，使广大农牧民走上生态就业、生态致富的道路。实施重点生态工程。全面推进国土绿化行动，初步形成了一个类型齐全、分布合理的生态保护网络体系。大力发展绿色产业，积极推进清洁能源产业，发展绿色工业，2018年天然饮用水等绿色工业增加值53亿元，增长14.3%。绿色发展的红利让西藏2018年旅游收入增长近三成，接待游客人次增长31.5%。继续实施生态安全屏障保护与建设工程，稳步推进“两江四河”流域造林绿化工程。生态环境保护考核奖惩机制不断完善。各类自然保护区已达到西藏自治区总面积的1/3，活立木蓄积、人均森林面积、人均森林蓄积、人均天然林蓄积和乔木林单位面积蓄积5项指标居全国第一，江河源头

区、草原、湖泊、湿地、天然林、水生态、地质遗迹、生物多样性得到有效保护，确保了西藏天蓝地绿水清。据中科院和相关部门监测评估显示，当前西藏高原各类生态系统结构整体稳定，气、声、水、土壤、辐射及生态环境质量均保持在良好状态，大部分区域仍处于原生状态，西藏仍然是世界上生态环境最好的地区之一。

——新时代西藏坚持开放发展理念，着力实现互利共赢

西藏自治区紧紧围绕“一带一路”倡议，构建包容、开放、合作的政策体系，不断加快对外开放的步伐。西藏是面向南亚开放的重要通道。积极融入“一带一路”，参与孟中印缅经济走廊建设，推进环喜马拉雅经济合作带。加强与尼泊尔基础设施互联互通，积极建设铁路、公路通道的同时，西藏航空公司与尼泊尔雪人航空公司合资成立喜马拉雅航空公司，打造空中走廊。加快建设吉隆、普兰等口岸，稳步推进樟木口岸科学恢复开通。大力发展开放型经济。成功举办第十六届“中国西藏—尼泊尔经贸洽谈会”，扎实推进吉隆跨境经济合作区、拉萨综合保税区建设，各级园区产值突破250亿元。2018年全区进出口贸易额实现48亿元，边民互市贸易额增长1.8倍。加强招商引资，2018年实施招商引资项目1450个，累计到位资金630.8亿元，同比增长38.8%。广泛开展对外交流合作，有序推进“请进来、走出去”，持续推进旅游、文化、农牧业等领域对外交流合作。成功举办四届“中国西藏旅游文化国际博览会”，并打造成为具有国际影响力、全国辐射力、区域带动力的对外交往交流合作的西藏高端品牌。在拉萨成功举办两届“中国西藏发展论坛”，成功举办首届环喜马拉雅“一带一路”合作论坛和南亚标准化论坛，积极与世界各国专家学者交流先进发展理念，探索新时代西藏发展的路径模式。

——新时代西藏坚持共享发展理念，着力提升幸福指数

西藏自治区不断增强各族群众的发展参与感和获得感，真正实现发展成果由全民共享。民生保障

Democratic Reform in Tibet ——Sixty Years On(X)

X. Development of Tibet in the New Era

Since the 18th CPC National Congress was held in 2012, the CPC Central Committee with Xi Jinping as the core has attached great importance to Tibet and its ethnic groups. The CPC Central Committee has formulated major policies for development and stability in Tibet to meet the requirements for building a moderately prosperous society in all respects, achieving the Two Centenary Goals, and realizing the Chinese Dream of national rejuvenation.

Xi, general secretary of the CPC Central Committee, put forward an important strategic idea: “To govern the country

well we must first govern the frontiers well, and to govern the frontiers well we must first ensure stability in Tibet.” He issued instructions to “strengthen ethnic unity and build a beautiful Tibet”. He presided over the Sixth National Symposium on Work in Tibet in August 2015, defining guiding principles, objectives, and tasks in Tibet in the new era. It was decided at the symposium that the central government would support a large number of key construction projects that were to be included in the 12th and 13th Five-year plans (covering ten years from 2011 to 2020), and a series of special preferential policies benefiting all ethnic groups in Tibet were enacted.


水平不断提升，小康社会建设稳步推进。全力建好社会保障体系，基本实现了幼有所育、学有所教、劳有所得、病有所医、老有所养、住有所居、弱有所扶。2013年以来，新增城镇就业累计27.3万人以上。2018年城镇登记失业率2.83%，城乡居民人均可支配收入分别增长10.2%和10.8%。覆盖城乡的社会保障体系基本建成，全区市地一级均有孤儿院，区、市（地）、县（区）均建有养老院，率先实现有意愿的五保对象集中供养、孤儿集中收养。2013年以来，累计减贫约71万人。贫困发生率由2012年的35.2%下降到2018年的6%以下。新型城镇化建设稳步推进，日喀则、山南、林芝、昌都、那曲撤地设市。2013年以来，实施各类城镇保障性安居工

程31.46万套。加大对口援藏力度，2013年至2017年累计实施援建项目1736个，援助资金达143.46亿元。国家统计局专项调查结果显示，群众对生活现状的满意度超过97%，对全面建成小康社会的信心达97.3%。

结束语

西藏60年的伟大跨越，充分说明民主改革顺应时代发展要求，符合西藏各族人民的根本愿望，契合西藏社会发展的实际需要，是历史的必然。正是有了民主改革，才有了西藏社会制度的历史性变迁，才有了西藏与时俱进的发展，才有了西藏各族人民幸福美好生活，才有了西藏各族人民权利的充分保障。民主改革是真正造福西藏各族人民的伟大壮举。

经过民主改革，西藏各族人民早已成为国家的主人。坚持中国共产党的领导、坚持社会主义道路、坚持民族区域自治制度早已深入人心，不可撼动。多年来，以达赖集团为代表的西藏旧势力，出于自身政治利益的需要，出于对黑暗落后的封建农奴制的眷恋，极力否定民主改革，否定西藏发展取得的巨大成就。这不仅是对事实的罔顾，更是在开历史倒车，是对人类文明的反动。

当前，在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指引下，西藏各族人民正与全国人民一道，为创造更加幸福美好的生活、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而奋斗。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建设正扬帆远航，西藏的明天将更加灿烂。

General Secretary Xi wrote a series of letters to celebrate the launch of the second comprehensive scientific investigation and research of the Qinghai-Tibet Plateau and the 60th anniversary of Xizang Minzu University, and to reply to a letter from the people of Yumai Township in Lhunze County. He wrote instructions for tree planting in Nagqu, and directed research into the Sichuan-Tibet Railway construction plan. He issued many important instructions on the development and stability of Tibet.

The general plan for governing Tibet in the new era defined by the CPC Central Committee with Xi Jinping as the core is consistent with the principles and policies applied to Tibet since the beginning of democratic reform, while responding to Tibet's development needs in the new era. It thus promotes the development and long-term stability of Tibet.

To develop Tibet in a new era, the Central Authority is committed to the philosophy of people-centered development and the concept of innovative, coordinated, green, open, and inclusive development. It strives to promote economic and social development, safeguard and improve people's wellbeing, promote exchanges and integration among ethnic groups, and strengthen environmental protection. These efforts will give vitality and vigor to Tibet.

– Committed to innovative development and greater economic vitality

Considering innovation as the primary driving force, the government of Tibet has worked hard to implement the strategy of innovation-driven development.

It strives to promote institutional innovation. Driving development with supply-side structural reform, it is advancing reforms in key areas such as state-owned enterprises, the non-public economy, the factor market, the fiscal and taxation system, financial system, old-age insurance system, and medical and health system to tap the potential for development.

It drives development with scientific and technological

innovation, while enhancing government guidance. To achieve this, it is working to establish a market-oriented scientific and technological innovation system with enterprises as the mainstay and collaboration between government, enterprises, universities, and research institutes; and building platforms for scientific and technological innovation. It is also working hard to enhance commercialization of scientific and technological advances, and improve contribution of science and technology to economic development.

By 2018, Tibet had established 74 entrepreneurship and innovation entities, including makerspaces, sci-tech enterprise incubators, innovation and entrepreneurship bases for college students, and bases for small and micro businesses, and these entities have attracted 1,338 entrepreneurship teams and startups. A number of scientific and technological innovation enterprises have grown stronger. In 2018, the number of high-tech enterprises in Tibet exceeded 50, 53 percent more than in 2017. The number of small and medium-sized enterprises featuring scientific innovation reached 75, up by 142 percent on a year-on-year basis.

Tibet has cultivated a series of industries with local characteristics, such as highland barley, yak, and Tibetan medicine, which are profitable in themselves while constituting a strong support for other industries in the Region. This rapidly rising "local characteristic" economy has become one of the most dynamic and promising highlights of the Tibetan economy.

The four national agricultural science and technology parks in Lhasa, Xigaze, Nagqu and Nyingchi and the Nyingchi National Sustainable Development Experimental Zone have a significant radial impact. Twelve state-level innovation-driven agricultural centers have played an active role in commercializing scientific and technological achievements in agricultural and pastoral areas and in boosting the people's income.

– Committed to coordinated and sustainable development

In view of the current economic and social climate, the government of Tibet, while properly addressing economic and social problems and imbalanced and insufficient development, has been working hard to handle the following relationships:

- between state investment and social investment;
- between major projects and projects to improve people' s wellbeing;
- between taking advantage of strengths and strengthening areas of weaknesses;
- between urban employment and convenient employment, such as providing nearby job opportunities and improving people' s employability;
- between relocating impoverished people to urban areas and relocating them to areas with surplus productive resources and relatively complete infrastructure;
- between protecting ecology and benefiting the people;
- between developing urban areas and improving basic public services in agricultural and pastoral areas;
- between streamlining administration, delegating power to lower level and localization;
- between increasing the output and efficiency of enterprises and improving the welfare of employees and the incomes of farmers and herdsmen.

Tibet has created a rural revitalization plan to cultivate new driving forces for rural development. In 2018, there were 8,364 specialized farmers cooperatives, and the total output value of the agricultural products processing industry was 4.2 billion yuan. Rural infrastructure has been improved. Systems are in place for agricultural disaster prevention and response, inspection and testing of the quality and safety of agricultural products, and animal epidemic control. Work has been done to improve the rural living environment and refuse and sewage treatment. And

98 percent of administrative villages in Tibet have access to optic fiber networks.

Tibet promotes balanced regional development. It is accelerating the development of backward areas, and encouraging different locations to use their strengths to the full and exploit industries with local characteristics, thus enhancing the economic strength of the whole Region. As a result, there is competition between different areas, and an increase of engines for economic growth.

Tibet has worked actively to develop Lhasa and Xigaze, two important nodes on the Belt and Road, and to open central and frontier cities to South Asia. The economic integration of Lhasa and Shannan is progressing, and a “three-hour” economic and transport circle in central Tibet is taking shape. New progress has been made in improving transport and energy supply infrastructure in eastern Tibet, and ecological protection in northwestern Tibet has been strengthened. All-season and all-area tourism in southeastern Tibet is developing fast. The urbanization rate of permanent residents is 31 percent.

– Committed to green development and a beautiful Tibet

The government of Tibet firmly believes that clear waters and green mountains are invaluable assets, and that ecological protection is also a means of protecting productive forces. Bearing these ideas in mind, it prioritizes green development with ecological protection.

It defines primary responsibilities for ecological protection, follows strict principles of ecological safety, and prohibits high-pollution, high-emission, high-energy projects from entering Tibet. It strictly implements the systems under which only one leading official is granted the right to approve projects for the exploration and development of mineral resources, while at the same time a single veto will block any project detrimental to the environment.

Tibet operates a mechanism of incentives or subsidies for ecological protection. It has assigned 700,000 people

to ecological protection posts, enabling the majority of farmers and herdsmen to find employment and earn a good living through ecological protection. Several key ecological projects have been implemented. Tibet promotes land greening in all areas, and a comprehensive regional ecological protection network is in place.

Tibet is working hard to develop green industries and promote clean energy. In 2018, green industries such as natural drinking water recorded an added value of 5.3 billion yuan, an increase of 14.3 percent over 2017. Another dividend of green development is a 30 percent growth in Tibet's tourism revenue and a 31.5 percent increase in the number of tourists in 2018.

Tibet continues to protect ecological barriers and build new ones, while making steady progress with afforestation of the basins of the Yarlung Zangbo, Nujiang, Lhasa, Nianchu, Yarlung (a tributary of Yarlung Zangbo), and Shiquan rivers. The mechanism for assessing and rewarding or punishing activities with an ecological impact has been improved. As a result of these efforts, nature reserves now occupy one third of the Region. The living wood growing stock, per capita forest area, per capita forest stock, per capita natural forest stock, and forest stock per unit area all rank first in China. River source areas, grasslands, lakes, wetlands, natural forests, water ecology, geological relics, and biodiversity are under effective protection, ensuring azure sky, green mountains, and clear waters in Tibet.

According to monitoring and evaluation conducted by the Chinese Academy of Sciences and relevant government departments, the ecosystems of the Tibetan Plateau are generally stable, and the quality of its air, water, soil, and general ecological environment remain good. Noise and radiation levels are positive. Most parts of Tibet are still in their pristine state. Tibet is still one of the regions with the best ecological environment in the world.

– Committed to open development and mutually beneficial results

Following the Belt and Road Initiative, the government of Tibet is building a policy structure that is inclusive, open, and cooperative in nature, while accelerating opening up.

Tibet sees the Belt and Road Initiative as an important channel for opening to South Asia, and has joined the initiative by participating in the construction of the Bangladesh-China-India-Myanmar Economic Corridor and promoting the Trans-Himalaya Economic Cooperation Zone. To strengthen infrastructure interconnection with Nepal, Tibet is building railways and highways; in 2014, China's Tibet Airlines and Nepal's Yeti Airlines founded a joint venture – Himalaya Airlines – to create air corridors. In the meantime, Tibet is moving faster in expanding trading posts such as Gyirong and Burang, and re-opening Zham.

Tibet works hard to develop an open economy. It successfully hosted the 16th China Tibet-Nepal Economic and Trade Fair in 2018. It is building the Gyirong Cross-border Economic Cooperation Zone and the Lhasa Comprehensive Bonded Zone. The output value of economic and industrial parks at all levels has exceeded 25 billion yuan. In 2018, the Region's imports and exports reached 4.8 billion yuan, and the volume of trade between the inhabitants of border areas increased by a factor of 1.8 over the previous year.

Tibet has intensified its effort to attract outside investment. In 2018, it unveiled 1,450 projects designed to invite external investment, which brought in funds of 63.08 billion yuan, a year-on-year increase of 38.8 percent.

Tibet carries out extensive external exchanges and cooperation by promoting the strategy of “inviting in and going out”. It has advanced exchanges and cooperation in tourism, culture, agriculture, animal husbandry, among others. It has successfully hosted four sessions of the China Tibet Tourism and Culture Expo and has made this a high-end Tibetan brand with nationwide and international influence, while serving as a driving force for regional development. Tibet has twice held the Forum on the

Development of Tibet in Lhasa, along with the First Belt and Road Forum on Trans-Himalaya Cooperation, and the China-South Asia Standardization Forum. Through active communication with world-renowned experts and academics on advanced development concepts, Tibet is searching for new pathways and models for development in the new era.

– Committed to shared development to enhance the happiness of the people

The government of Tibet works hard to enhance the sense of participation and gain for people of all ethnic groups, ensuring that the fruits of development are shared by all the people.

Tibet is constantly improving the level of social security while steadily building a moderately prosperous society. It is creating a social security framework that guarantees all the people the rights to care for pre-school children, education, remunerable employment, health care and old-age care, housing, and assistance for the weak.

Since 2013, more than 273,000 new urban jobs have been created. In 2018, the registered urban unemployment rate was 2.83 percent, and per capita disposable income increased by 10.2 percent and 10.8 percent respectively for urban and rural residents. A social security system covering both urban and rural residents is in place. Orphanages have been set up at the city (prefecture) level, and nursing homes for the elderly have been founded at the regional, city (prefecture), and county (district) levels. Tibet has become one of the first parts of China to realize centralized care of orphans and those who are eligible for the “five guarantees”. Since 2013, about 710,000 people have been raised from poverty. The poverty headcount ratio fell from 35.2 percent in 2012 to below 6 percent in 2018.

Urbanization is advancing steadily. Xigaze, Shannan, Nyingchi, Qamdo, and Nagqu were converted from prefectures to cities. Since 2013, 314,600 government-subsidized homes have been built.


Partnership assistance from other parts of the country to Tibet is increasing. From 2013 to 2017, 1,736 assistance projects were launched, with a total of 14.35 billion yuan in funds.

According to a special survey of the National Bureau of Statistics, more than 97 percent of Tibet people are satisfied with their situation, and 97.3 percent are confident of achieving moderate prosperity.

Conclusion

The leap of Tibet’s development over the past 60 years fully demonstrates that its democratic reform conformed to the historical trend of the times and the fundamental aspirations of all ethnic groups in Tibet, and met the people’s real demand for social progress. This reform has led to a historic transformation in Tibet’s social system. It has brought rapid development to the Region and a happier life to the people of all ethnic groups in Tibet, and ensured the people’s rights are fully guaranteed.

Since democratic reform, the people of all ethnic groups in Tibet have become the masters of the country. It is deeply rooted in the people’s minds that we must remain committed to the leadership of the CPC, the socialist road, and the system of regional ethnic autonomy. For many years, however, the old Tibetan forces represented by the Dalai Lama have attempted to deny the achievements of democratic reform and development in Tibet, for the sake of their political interests and out of a hankering for the dark and backward days of feudal serfdom. They disregard facts, and attempt to reverse the tide of history in opposition to the interests of human civilization.

Under the guidance of Xi Jinping Thought on Socialism with Chinese Characteristics for a New Era, the people of all ethnic groups in Tibet are working together with the whole country to create a better life and achieve the great rejuvenation of the Chinese nation. With steady progress being made towards socialism with Chinese characteristics for a new era, Tibet is bound to have an even brighter future. 

在南太平洋深处发出中国统一呼声

——记新西兰南岛中国和平统一促进会会长王建京

■ 纳若

王建京，1955年出生于北京。21世纪初，王建京一家远渡重洋移民新西兰，定居南岛最大城市基督城。她曾经当过工人，后进入北京第二外国语学院英语系学习；曾经当过记者、翻译，还穿过不同兵种的军装；曾经担任国企公司总经理，成功开创了自己的事业，担任跨国经贸集团总裁。在不同行业打拼，一步一个脚印地历练成长。丰富的人生阅历，培养了她善于敏锐思考、拥有坚强意志和奋斗精神。

创建新西兰南岛中国和平统一促进会

旅居海外的王建京心始终与祖国紧密相连，时刻牵挂祖国的发展，密切关注国际形势和台海局势变化，关心反“独”促统运动进展，希望为促进祖国和平统一贡献自己的力量。当得知新西兰北岛早已成立了中国和平统一促进会，而在面积更大的南岛却还没有成立相关组织时，王建京和一些志同道合的朋友决定担起历史的重任。经过周密筹备，2003年12月新西兰南岛中国和平统一促进会正式成立。

新西兰南岛中国和平统一促进会成立之初，在确定用于正式



新西兰南岛中国和平统一促进会会旗与会徽

登记注册的英文译名时出现了一个小插曲。大家认为，成立统促会的目标不仅是要在华侨华人中开展活动，更要争取新西兰主流社会对中国政府解决台湾问题有关方针政策的理解、认同和支持，所以英文名称一定要突出民间组织色彩，做到通俗易懂、言简意赅。根据这一共识，王建京带领创会骨干们进行了细致的研究。经过精心选择，反复比较，最后确定 One China Association(一个中国协会)为新西兰南岛中国和平统一促进会英译名。这个名称简洁有力，内涵丰富，特色鲜明，朗朗上口，通俗易懂，直白地表达出坚持一个中国原则的坚定立

场。

统促会成立之际，适逢2004年台湾地区领导人选举关键时刻。当时，台湾当局逆历史潮流而动，罔顾台湾民众福祉，无视祖国大陆的严正警告和国际社会普遍反对，悍然推行所谓“防御性公投”。王建京发挥自己的特长，在当地最大华文报纸发表专题评论文章《“和平公投”还是战争公投？》，深刻揭露陈水扁当局执意推动“公投”的危害，以铁一般的事实让新西兰民众认识到台湾问题的真相，用当地民众可以接受的语句表达了全体中华儿女期盼祖国和平统一、期盼世界持久和平的美好愿望。文章作为统促会“开山之作”一经刊登，立即被新华社予以报道，并被海内外100多个中文网站转载，产生了广泛影响。新西兰南岛中国和平统一促进会成立伊始，初试啼声，便在反“独”促统的斗争中崭露头角，让全世界人民都听到了来自太平洋最南端的统一呼声。

开展社会活动

广交朋友 增进团结

俗话说，众人拾柴火焰高。成立统促会的宗旨，就是“广交朋友，增进团结”，敞开胸襟，

广泛团结所有支持中国和平统一的新西兰华侨华人和各界人士，交流见解，增加共识，广结善缘，凝聚最广泛的反“独”促统力量，积极组织、参与各项促进中国和平统一的活动。

王建京性格直爽，宽容大度，心胸开阔，待人真诚，光明正大，有事都摆在桌面上，从不斤斤计较。王建京在基督城朋友圈中以乐善好施、乐于助人闻名。当留学生遇到困难向她求助时，她无私帮助这些远离父母的孩子。统促会成员有许多来自台湾，在交往中，王建京注意情感交流，尊重他们的感受，倾听他们的声音。同时，也向他们表达自己的观点，求大同存小异，增进他们对“和平统一、一国两制”方针的理解和认同。王建京在各种场合反复强调，希望新西兰华侨华人能够更加“抱团”，能够联合起来发出自己的声音，维护自己的利益。所有华侨华人紧密团结起来，不断发展自己，无论是在经济实力还是社会影响力方面，都逐步体现出华侨华人在新西兰社会中是不可忽视、举足轻重的力量。

王建京在基督城华人圈里德高望重，不论年轻或年长，都称呼王建京为“大姐”，岁数大她十几岁的长者也同样，“大姐”成为亲昵的“官称”。侨胞们将她视为华人社区的“灵魂”“顶梁柱”，赞誉有加，不论大事小事，都来让她定夺。

在王建京的带领下，统促会



社区活动中

还十分注重新西兰华人社区之间的横向交流，帮助本地华人企业和华人社团发展壮大，支持并赞助华人社团举办各类公益、节庆或演出活动，并为华人社区组织义演出钱出力。统促会很多副会长和理事，同时也是其他社团的侨领。各社团相互呼应，相互鼓励，增进团结和了解，逐步扩大华人社团的影响力。大家团结一心，共同推动侨团工作开展，共同为促进中国和平统一而努力。

基督城每年举行圣诞大游行，展现各民族多元文化特色，十余万民众沿街观看，影响很大。王建京认为，这是展现中华民族精神风貌，弘扬中华文化的重要舞台，不能缺席。她多次慷慨解囊，赞助活动。在她的坚持努力下，华人社区团结起来，组织起自己的方阵走上街头，展现中华风采。2008年游行第一次打出了

五星红旗，第一次打出了基督城华人社团的旗帜，参加人数最多，造出了声势，扩大了影响，在主流社会面前展现出团结一体、欢乐祥和的华人社区新形象。此后华人社团每年参加游行，延续至今。每次游行王建京都走在方阵最前面，推着小车，散发糖果和小礼品给孩子们，与现场观众互动。她还带队唱歌、喊口号，壮大声势。

2011年2月22日，基督城发生里氏6.3级强烈地震，造成重大损失和人员伤亡。王建京迅速加入震后救援工作，不顾有病在身，没日没夜地忙碌，连续3天总共只睡45分钟，一心扑在救助中国留学生的事上。她率领华人救援志愿者“娘子军”，天天守在华人地震援助小组，一个多月时间接待安抚家属、煮面做饭、打扫卫生、搬运桌椅等，样样抢着干。地震

小组成立之初没有经费，所有开销都由王建京支付，她的手机成为地震小组“公用电话”。记者问她总开销有多少，她却不愿意多说。她说：“大难之后，我们都活着，我们是幸运者，但我们不能忘记那些不幸的人们。我们要奉献，要救助年轻的中国留学生，他们就是我们自己的孩子。”

为了救援压在大楼底下的学生们，王建京全力配合中国大使馆，接待中国救援队，处理救援和善后工作，到大楼坍塌救援现场帮助协调，她的嗓子喊哑了，吃点药继续操劳。她还与新西兰媒体，以及新华社、中央电视台、中新社、人民网、东方卫视等中文媒体保持热线联络，随时传递最新消息。国侨办送来慰问金，王建京是大使馆指定的慰问金监督人，她坚持将慰问金发放到侨胞手中，让侨胞感受到祖国的温暖。很多侨胞领取后纷纷签字留言，感谢祖国母亲。句句留言发自内心的，令人动容。

新西兰南岛中国和平统一促进会成立以来，所有活动费用都由王建京的集团公司承担。基督城任何团体或个人，只要热爱祖国，支持一个中国原则，反对分裂，都可以成为统促会会员，不收会费。在华人社团活动中，王建京一直提倡“团结实干、无私奉献”精神，认为在这种精神指引下，才可以做好工作，让社团发展壮大。她的倡议逐步得到众多侨领的认可，华人社团稳步走

上和谐共生、健康发展的道路。

关心支持祖国发展

促进新中交流和友谊

创建统促会的同时，王建京还创建了新西兰中华企业家协会，她在成立宣言中写到：“我们成立两个协会的基本宗旨，就是希望通过我们组织的一系列活动，架起新西兰和中国之间的桥梁，在经贸、旅游、科技、文化、艺术等方面广泛交流，全面介绍祖国，走入中国，让新西兰华人华侨和各界人士更多、更深入地了解今日中国，扩大我们的影响，团结所有支持中国和平统一的力量，结成最广泛的统一战线，在美丽的南太平洋发出我们的呼声，使一个中国的理念深入人心，支持祖国的改革开放与经济建设，争取早日实现祖国的完全统一。”

王建京无论走到哪里，身在何处，始终把祖国放在心中，怀着拳拳赤子之心和殷殷报国之情，心系民族振兴，关注中国发展。在新中自由贸易协议签署前后几年，王建京与中国广交会和中国大使馆商贸处密切合作，主动牵线搭桥，连续主办了多届中国广交会在新西兰南岛的推广会，广邀新西兰商家出席，鼓励他们抓住机遇，共享中国无限商机，前往中国参加这一盛会，取得良好效果。

2005年1月，中国南极考察队队员突发急病，被国际救援队紧急护送到新西兰基督城医院救治。王建京闻讯后立即赶赴医院，

代表基督城华人社团探望。

2007年2月，北京“张健横渡队”成功横渡位于新西兰南北岛之间的库克海峡，首战告捷，胜利完成2008年北京奥运会前横渡五大洲连接海峡活动的第一战。王建京出资赞助庆功晚宴。

2008年5月12日，发生汶川大地震。王建京第一时间行动起来，带头捐献大额款项的同时，充分利用自身影响力，号召华人社区全面展开“情系灾区、奉献爱心”募捐活动，募集到大量善款。

王建京有中华民族扶贫济困、助人为乐的优良传统，一直通过希望工程定向捐款，资助云南、山东等地贫困学生完成学业。2019年，王建京通过中国驻基督城总领事馆，连续捐款用于外交部在云南省开展的定点扶贫工作，为改善当地群众生产生活条件、推动当地经济社会发展做出积极贡献。

2009年4月，应全国人大华侨委邀请，新西兰侨领代表团一行回国参观访问，团长是新西兰惠灵顿中国和平统一促进会会长黄玉书，副团长是王建京。作为代表团副团长，王建京设计制作了绣有新中两国国旗和新西兰地图的“身居海外 情系中华”锦旗，沿途赠送各地接待单位，还盛赞祖国的发展成就，畅谈参访感受和作为炎黄子孙的骄傲与自豪。

在基督城举行的世界轮椅运动会和残疾人田径世界锦标赛上，王建京带领百余名华侨华人

和留学生到比赛现场，打起五星红旗和“中国加油”巨大横幅，敲锣打鼓，为奋力拼搏的中国运动员摇旗呐喊。

王建京曾多次受邀回国，参加盛大庆典观礼。如2009年国庆60周年庆祝活动，2015年抗战胜利70周年大阅兵，2019年国庆70周年庆祝活动，2021年中国共产党成立100周年庆祝活动。每次观礼归来，她都会撰写文章，发表在海内外媒体上，回顾每个庄严神圣的历史时刻，与全球中华儿女分享自己激动喜悦的心情。

王建京非常注重同新西兰主流社会上层人士保持良好关系，基督城市市长、很多国会议员、政府部长都是她的好朋友。新西兰总理克拉克数次到其集团下属餐厅，出席华人社团举办的晚宴，走进华人社区，倾听华人心声。通过各种形式的良好互动，统促会与部分新西兰主流社会人士深度交往，提高了统促会在新西兰主流社会的知名度，加深了新西兰友人对华人社团和中国大陆的了解，促进了新中两国的民间交流和往来。

宣传理念

扩大影响 占据舆论高地

在工作实践中，王建京充分意识到通过媒体宣传推动工作开展的重要性，并逐渐把“宣传理念、扩大影响”作为统促会的主要工作模式。创会初期，王建京投资买下了当时新西兰最有影响

力的中文报纸《新西兰镜报》，扩展宣传阵地。

每当台海局势发生重大变化时，统促会不仅组织座谈会、理事大会、情况通报会、媒体采访会等，还在当地华人报纸、网站上刊登有关文告、报道、述评、声明、宣言等，表达意见和立场，一方面可以让当地华侨华人时常能够看到批判“台独”分裂势力及其分裂活动、宣传促进中国和平统一的文章，另一方面也可借此不断扩大新西兰南岛中国和平统一促进会的影响，提高声望，使统促会逐渐成为当地最重要的华人社团之一。

2004年9月，王建京专访台北市市长马英九之父马鹤凌先生，发表题为《耄耋父“老骥伏枥”祈和平 寄厚望“九思九如”育英才》长篇报道。这是新西兰华文媒体首次直接采访台湾政治人物。为了写好这篇专访，王建京多次与已逾84岁、身在台北的马鹤凌先生通话，与其反复沟通，问清每个问题，核实每个细节。文章发表后，引起了读者的强烈兴趣，特别是马鹤凌先生鲜明坚定的反“台独”立场给很多读者留下了深刻印象，使他们了解到在台湾岛内恶劣的政治环境下，仍然有人在默默坚守着正义的信念。

2007年8月，在基督城发生涉及“一个中国”原则问题的严重事件。王建京闻讯后，第一时间派遣副会长赶赴林肯大学现

场，接触事件各方当事人，了解事态发展情况，协调安排抗议行动，并向校方投诉了涉事教师的恶劣行径，挽回影响。新西兰南岛中国和平统一促进会迅速投书华文媒体，发表声明，在华人社区引起巨大反响，在网上展开了一场统“独”议题的大辩论，瞬间留言数量之多创下网站新记录。大辩论过程中，赞同“一个中国”原则、反对“台独”的发言占据压倒优势，成为绝对主流民意，显示出大势所趋，人心所向。

2008年3月，由新西兰南北岛三个统促会发起，由南岛中国和平统一促进会执笔，联合新西兰50余家社会团体和新闻媒体，发表了《新西兰侨界坚决反对台湾“入联公投”的联合宣言》。宣言不仅在三大城市主要中文报纸、中文网站发表，而且还在中文广播电台播出，形成极为广泛的影响。新华社当天就向全世界报道了这个新闻，海内外众多网站都转载了这条消息，其中也包括香港“中评网”等许多港台网站。这不仅是南北岛三家统促会第一次南北呼应、并肩作战，也是历史上首次新西兰全国如此众多的华人社团和媒体联合在一起，共同行动。不同地区、不同行业的人凝聚在中国和平统一的旗帜下，向全世界发出了来自南太平洋深处的统一呼声。

北京奥运会圣火海外传递期间，新西兰南岛中国和平统一促



基督城圣诞大游行带领华人方阵

进会同仁专程前往澳大利亚，参加保护圣火活动。当时对西藏暴力事件的报道中，基督城最大英文报纸《新闻报》和其他西方媒体的报道一样，充斥着各种歪曲和编造的消息，令人愤怒。王建京联合数家华人社团直接向《新闻报》投递英文稿件和多幅图片，并冠以醒目标题：“西藏真相不容扭曲”（Facts about Tibet should not be distorted），以读者来信形式刊发。稿件据理力争，揭露事实真相，谴责歪曲和不公正的报道，让一贯标榜客观、公正的西方媒体在事实面前显形。在西方舆论一边倒的语境里，让读者直接了解真相，听到不同的声音，

为改变思维定势，影响舆论导向而做出努力。

2009年乌鲁木齐“七五”事件发生后，新西兰南岛中国和平统一促进会迅即在中文报纸和网站发表严正声明，强烈谴责民族分裂分子的暴行。之后基督城某报刊登文章诋毁声明，污蔑爱国侨胞，攻击中国政府的民族政策和边疆政策，为暴徒鸣冤叫屈。统促会经讨论认为，事关舆论导向，面对大是大非，不能听之任之，必须旗帜鲜明地表达立场，驳斥谬论，匡正视听，占据舆论高地。为此，王建京撰文《不通历史何以谈古 满腹偏见怎能论今》予以驳斥。

多年来，基督城没有中国驻外机构，侨胞或新西兰人必须跨过库克海峡，前往北岛惠灵顿中国大使馆办理领事手续。2010年3月，王建京给中国外交部写信，吁请尽早开设基督城领事馆。之后又撰写《请求尽早开设基督城领事馆的呼吁书》，在基督城发起联署签名活动。如今，中国驻基督城总领事馆已设立10年，成为基督城侨胞最温暖的“娘家”。

2020年，新冠疫情席卷全球。疫情初期，供应短缺，王建京自费购买大量口罩，捐献给华人社区。虽然交通不便，行动受限，王建京仍然笔耕不辍，不断发表多篇文章，关注台海最新局势和相关资讯，表达立场，发出呼声。她还出席了在北京召开的两次重要座谈会，与相关领导和各方面专家学者进行交流，共商反“独”促统大计，探讨深入开展工作的途径。

光阴荏苒，岁月如梭，不觉之间，王建京创建的新西兰南岛中国和平统一促进会已经走过了18个年头。统促会成立以来，日益受到华人社区和新西兰主流社会重视和支持，成员遍及农工商学各界、男女老少各阶层，来自中国大陆、台湾、东南亚等地，充分说明统一是大道之行，人心所向，势不可挡，也看出统促会的工作卓有成效。新西兰南岛中国和平统一促进会与兄弟社团共同奋斗，让反“独”促统的声音响彻南太平洋。🇨🇳

民进党当局煽动舆论和意识形态对抗 无法阻挡统一大势

■ 吴为

民进党当局在经济发展、疫情管控、民生建设等方面左支右绌、备受批评，施政陷入更加被动局面，民意支持度滑落。为了挽回颓势，民进党当局不断在两岸关系上做文章，打“意识形态牌”成为其主要操弄手法。

民进党当局鼓动亲绿舆论造谣生事

在民进党当局组织和鼓动下，包括“自由时报”在内的岛内亲绿媒体和一些绿营人士，长期以“有色眼镜”和“歪曲嘴脸”对待在祖国大陆发生的各种事情，其造谣生事的手法缺乏“技术含量”，跟风带节奏的表演甚至令人“忍俊不禁”。

一是毫无常识，自降智商。早些年，岛内亲绿媒体炒作所谓祖国大陆民众吃不起茶叶蛋的梗，一度成为网络年度“最佳笑话”。然而，这样的“低智商”造谣像病毒一样在亲绿媒体和人士中蔓延。2019年，台湾所谓“财经专家”黄世聪编造大陆民众吃不起榨菜；2020年，“自由时报”又炮制大陆要出现粮食危机，“面临吃不上饭的日子”。这些论调不禁让人感慨，这些亲绿舆论还“活在中世纪”，他们并非真的无知，而只是不愿看到祖国大陆发展得好。

二是移花接木，张冠李戴。亲绿媒体擅于操作“P图”“标题党”手法，比如去年9月，祖国大陆媒体报道了安徽阜阳新兵入伍前泪别家人的新闻和图片，岛内亲绿媒体篡改为“中印边境冲突导致紧急征兵”，配之以“千里送人头”的耸动标题，完全偏离了新闻媒体和新闻工作者的基本职业操守和社会道德，其用心之险恶，可见一斑。

三是无中生有，靠编来凑。近两年，全球新冠肺炎疫情蔓延，台湾更是自今年5月以来疫情大爆

发，让民进党当局焦头烂额。即便如此，岛内亲绿媒体依然热衷“关心”祖国大陆疫情。去年初，武汉火神山医院迅速建成并投入使用，亲绿媒体“眼红不已”，只能编造火神山医院“严重漏水”变成“水帘洞”的说辞，试图抹黑“中国速度”。1月，亲绿媒体发布所谓“大陆疫苗外交，大陆‘疫’团乱”假新闻，声称大陆为拉近与外国关系而大量出口疫苗，导致自己疫苗接种不足，影响群体免疫进程。而事实却是，祖国大陆在短短数月内就实现超10亿剂次疫苗接种。反观台湾，却是出于政治私利拒绝祖国大陆协助提供疫苗，又四处“乞讨”疫苗，台湾民众疫苗接种远远不足，岛内疫情不断蔓延。4月，亲绿媒体编造“世界卫生组织进行病毒溯源，大陆承认政治因素干扰”的假新闻，而事实却是，祖国大陆有关方面明确指出是美国等个别国家对病毒溯源进行了政治干扰。

四是跟风炒作，甩锅丢责。美国等西方国家不断炒作要中国进行所谓“疫情赔偿”，亲绿媒体和人士“嗅觉灵敏”，赶紧跟风，扬言“建议民进党当局研究跟进大陆要求赔偿疫情损失”。对台湾疫情的蔓延，“自由时报”等媒体更是炮制“中国背后阻挠台湾地区向外采购疫苗”假新闻，把民进党当局自身防疫不力甩锅祖国大陆。

五是气急败坏，狗急跳墙。鉴于自去年以来祖国大陆海关多次从台湾地区输入的菠萝中截获检疫性有害生物，海关总署决定自今年3月1日起暂停台湾地区菠萝输入祖国大陆。亲绿媒体气急败坏，不断抹黑大陆是在“政治打压”。四川姑娘李子柒将农村生活拍成视频，在国内外社交平台收获大量粉丝，然而亲绿媒体出于“台独”本性，看不得视频里讲好中华文

化、中国故事，竟然抹黑李子柒的视频背后有所谓大陆“大外宣政策”投资，质疑祖国大陆一名普通女性个人励志的奋斗故事，其格局之低下令人惊讶。

民进党当局加紧意识形态议题操弄

一是操纵亲绿媒体，雇佣大量网络水军，在线上和线下对祖国大陆进行诬蔑攻击，持续抹黑祖国大陆发展建设成就，误导和扭曲岛内民众对祖国大陆的认知，加大岛内民众对祖国大陆的疏离。二是利用所谓“新冠肺炎疫情溯源”问题、参加东京奥运会、加入世界卫生组织等议题，炒作政治敏感话题，编造所谓“大陆打压”谎言，企图制造岛内民众“反中、仇中”情绪，离间两岸同胞感情。三是加大与美国等西方国家勾连，企图参与美国主导的所谓“民主价值”架构平台，附和等西方国家炒作涉疆、涉港等敏感议题，为乱港分子“撑腰打气”，伙同美国等西方国家加大对中国大陆的意识形态渗透策反，不断制造麻烦。四是在岛内出版发行抹黑、攻击祖国大陆的出版物，制作播放各类带有意识形态特性的网络视频，并妄图向祖国大陆传播。

民进党当局加大对抗图谋挽回执政颓势

面对今年以来执政漏洞百出的状况，民进党当局在内务方面几乎很难有所作为，特别是在岛内疫情蔓延的情况下，疫苗施打、发放五倍券政策等都遭到岛内各界强烈质疑和反对。为了转移矛盾焦点，民进党当局再次在两岸关系上大做文章，试图继续制造岛内民粹氛围，误导岛内民众认为是祖国大陆“外部施压”，才造成民进党当局执政不力，把“锅”甩给祖国大陆。同时，这也是民进党当局加大与美国等西方国家勾连的重要连接点。当前中美战略博弈持续，美国大打所谓“民主价值牌”，以鼓动拉拢西方国家跟随其共同遏堵中国。民进党当局见缝插针，试图参与美国等西方国家所谓“民主价值联盟”，即为了谋求美国等西方国家更大力度挺台，也为了借美国等西方国家作为“靠山”，增强其对抗中国大陆的底气。另外，民进党当局为了进一步“绿化”岛内社会，打“意识形态牌”是惯用伎俩。通过制造两

岸意识形态差异，歪曲台湾民众心理认知，巩固其支持基础，并且可以借此打压岛内在野势力，对反对民进党执政的势力进行“抹红、抹黑”操作，逼迫在野势力在意识形态领域方面也同民进党一道站在反对祖国大陆的战线上。

民进党当局和亲绿舆论充分暴露丑恶的政治本性

民进党当局、台湾亲绿媒体和人士，出于政治私利和“台独”本性，罔顾客观事实，制造各类“无脑”假新闻，极力造谣、抹黑祖国大陆，本质上是对祖国大陆综合实力发展壮大，并不断拉开与台湾地区差距，和两岸最终走向统一的害怕和焦虑，妄图趁机扰乱岛内民心、加剧台湾民众对祖国大陆的忌惮。

新冠肺炎疫情发生以来，祖国大陆在疫情防控、疫苗接种等方面，对在祖国大陆的同胞一视同仁，同等对待。5月，台湾疫情爆发后，祖国大陆第一时间表示愿意尽最大努力帮助广大台湾同胞应对疫情，包括向台湾同胞提供被世界卫生组织认可的祖国大陆疫苗，支持上海复星医药集团参与研发并独家代理的BNT疫苗服务台湾民众。反观民进党当局，自岛内疫情爆发以来，从一党私利出发，漠视台湾民众生命健康福祉，顽固坚持“反中仇中”的“政治防疫”立场，百般污蔑抹黑祖国大陆善意，以种种借口阻止祖国大陆疫苗输台，对岛内一些县市、民间机构和企业与上海复星集团依照商业规则洽购疫苗设置种种政治障碍。凡与祖国大陆有关包括疫苗在内的所有防疫措施一概拒绝，完全无视人民生命健康。事实证明，让台湾陷入“疫苗荒”的是民进党当局，利用“病毒疫情”操弄“政治疫情”的也是民进党当局，造成台湾迄今近1.4万人染病、700多人病亡的祸首更是民进党当局。

亲绿舆论不断抹黑祖国大陆，也反映两岸发展差距加大，制度优劣性高下立见。一百年来，中国共产党团结带领中国人民，以英勇顽强的奋斗实现了中华民族从站起来、富起来到强起来的伟大飞跃，中华民族伟大复兴进入了不可逆转的历史进程。最根本的是因为中国共产党领导人民建立和完善了中

美国从阿富汗仓皇撤军 为民进党当局敲响警钟

■ 钟决贵

历史总是惊人的相似。近期，美国从阿富汗仓皇撤军，上演“喀布尔时刻”，堪比1975年的“西贡时刻”，直接重创美国全球公信力，引发台湾各界热议。岛内舆论多忧心“昨日越南、今日阿富汗、明日台湾”，美国连“铁血盟友”都会轻率抛弃，台湾的命运也就可想而知。台湾终将被美国抛弃，由棋子沦为“弃子”。

岛内舆论担忧台湾

成为“翻版阿富汗”

阿富汗政局一夜“变天”，在台湾投下“震撼弹”，岛内各界多“兔死狐悲”“物伤其类”，由此联想到台湾自己的命运，接连向民进党当局敲响警钟，呼吁台湾当局要以阿富汗为戒，借阿富汗悲惨遭遇深切反思台湾处境，重新定位台湾的战略。

一是“今日阿富汗、明日台湾”。蓝营多担心，美国曾为阿

富汗投入超过2万亿美元“真金白银”，“真刀真枪”地为阿富汗牺牲2000余人，双方利益捆绑如此密切，但最终仍选择撤出。美国连阿富汗都会放弃，未来自然更会放弃与美国利益捆绑度较低的台湾。国民党民意代表洪孟楷称，美国在阿富汗经营20年，说撤就撤，极为讽刺，未来台湾不能指望美国。台湾海军陆战队退役将领、台湾军事院校校友总会

国特色社会主义制度，形成和发展了党的领导和经济、政治、文化、社会、生态文明、军事、外交等各方面制度，不断加强和完善国家治理能力和体系建设，充分彰显了中国共产党领导和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制度的优势。反观台湾，尤其是民进党当局施政之下，政治勾心斗角，经济发展滞碍，民生沉闷萧瑟，社会乱象频出，根本上是因为岛内的制度和治理模式问题突出，完全不能符合台湾民众希望稳定发展、望安求富的期待。但亲绿舆论并不愿承认两岸在这些方面的差距，即便实际看到了这些问题，仍然采用造谣中伤、抹黑歪曲的手段，企图继续蒙蔽欺骗台湾民众，害怕让台湾民众看到两岸真实的差距和问题，而动摇了“台独”分裂势力在岛内的社会基础。

两岸必然统一大势不可阻挡

尽管台海形势持续复杂严峻，民进党当局不断阻挠两岸交流合作，利用舆论和意识形态议题大做

文章，妄图阻挠祖国统一进程，但是乌云不会持久遮蔽台湾海峡，阳光终会照耀两岸。

进入新时代，中国比历史上任何时期都更接近、更有信心和能力实现祖国完全统一、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目标，必将为之付出更大努力，任何人任何势力都不可能阻挡中国人民捍卫国家主权和领土完整的坚强决心、坚定意志、强大能力。中国已经开启全面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国家新征程，“十四五”规划顺利开局，高质量发展态势良好。祖国大陆的繁荣昌盛为广大台湾同胞发展提供了巨大机遇和广阔空间，台湾民众在祖国大陆的广阔天地大有可为。正如一位在福建漳州深耕多年的台湾青年所说，“大陆内需市场足够强劲，每年都有很大的发展和进步。只要你肯做，就有很多机会”。广大台湾同胞必能明辨是非，坚信“邪不压正”，不被岛内别有用心之人制造的仇恨和歧视蒙蔽双眼、错失良机，抓住机遇到祖国大陆追求梦想。🇨🇳

理事长季麟连表示，“昨天的越南，今天的阿富汗，明天的台湾”，台湾真的还能靠美国外援吗？美国永远以自己国家的利益为第一，当美国认为有利益的时候就会加以援助，一旦认定没有利益，说放弃就放弃。

二是“美国不可靠”，不会“协防台湾”。台湾“中国广播公司”董事长赵少康称，阿富汗事件显示美国情报系统严重误判，也说明美国已不想、也无能力再做世界警察。台湾固然不是阿富汗，但美国还是那个美国。美国对两岸若生战端是否派兵保台回答有“创造性的模糊”，其实就是不会派兵，并没有任何一项美国法律或文件要求美国必须协防台湾，对台湾连最低程度口头承诺都没有。蔡英文应向岛内民众说实话、做最坏打算。“台海开战，老美第一个逃跑。”台湾当局前大陆事务副主管黄介正称，台湾许多人认为台海一旦开战，美国会“协防台湾”，这是“过于天真浪漫的想法”。台湾跟美国无“邦交”、无“同盟”、无驻军、无联合训练、无联合演习，协防只是协助台湾自我防卫，若台海有事，美国最多国会谴责、发表外交声明进行干涉、摆摆出兵姿态。即使美国愿意介入，中国大陆也会采取“闪电战”模式，“首战即终战”，在美国驰援前就已经“解决台湾”。

三是台湾将沦为“孤儿”。在“美主台从”结构下，美国根

本靠不住，美国连阿富汗都搞不定，台湾还想指望美国对抗中国大陆，无异于痴人说梦。中美虽会竞争，但两个核巨头不会军事开战。美国是否会“协防台湾”，决定权并不在台湾手中，台湾只能像“孤儿”一般乞求美国救援，被动等待，而没有任何主导权和主动权，也没有任何“不被出卖”的自主权。台湾“中时电子报”文章《沙利文的话还能信吗》，认为美国在阿富汗之后对台湾“坚定承诺”等只是冠冕堂皇的“外交辞令”，沙利文不可能将“必要时，美国会如同抛弃阿富汗一般抛弃台湾”的真实想法公之于众。

四是重批民进党“倚美协防”错误政策。蓝营多批评民进党当局不断对美国军购是购买“心理安慰”，“紧抱美国大腿就以为天下太平，混一天拖一天就以为永远没事”，民进党利用媒体垄断向台湾人灌输“应该把台湾的前途交到美国人手上”，“大陆不会打台湾，打了美国会来救”等想法是不负责任的错误做法。未来民进党应该以阿富汗为鉴，重新思考对美政策。台湾若不想成为第二个阿富汗，就要在“和”“战”之间想清楚，不要以为抱美国大腿就没事。

蔡英文讲话暴露“美国靠不住”，台湾“倚美协防”只是痴心妄想

美国从阿富汗狼狈撤军后，民进党当局以鸵鸟政策低调处理，“陷入死般沉默”，严防该议题被

持续炒热对台美关系和民进党执政不利。但在舆论强大压力下，民进党当局又不得不出来应对。8月18日，蔡英文首次就阿富汗局势表态，整体态度不思悔改，反而继续“嘴硬”，叫嚣“唯一选项就是让自己更强大、更团结、更坚定保卫自己”“自己不作为，只依赖别人保护，不是我们选项”。行政部门负责人苏贞昌也称，阿富汗是因内部乱，外部想要帮忙也没办法，“唯有自助才能人助”，台湾只要内部不乱，就能对抗任何想“侵略”台湾的外来武力。民进党当局不断如此渲染，主要目的有：

一是展现“自卫”决心安抚民心，为“明心志”叫嚣“过去戒严时期我们不怕被杀被关，现在也一样，一定守护这片土地”。

二是鼓噪“中国威胁论”，抹黑祖国大陆，煽动岛内“仇中”情绪，称“仰赖没有价值做基础、而且对台湾不放弃用武力的人（指大陆）的一时善意或施舍，更不是我们的选项”。

三是挟洋自重，谋求“跟有共同价值及利益的伙伴，一起努力和合作”。台湾外事部门发言人欧江安称，美国对“盟邦”及伙伴承诺一向神圣不可侵犯，不容他方质疑，“拜登政府自上任以来，已多次强调对台湾支持是坚若磐石，并以实际行动持续力挺台湾。将坚定不移地提升自我防卫能力，并透过台美及区域国家合作，维护台海稳定”。

为了走夜路吹口哨自己给自己壮胆，民进党当局还图谋“以武谋独”，疯狂推出2000亿元新台币特别预算案，加速提前量产各种具有“源头打击”能力的导弹，意在展现“坚决捍卫台湾的决心”。

蔡英文此番展现“自卫”决心“麻醉和欺骗民心”的言行，强调“唯一的选项就是靠自己”，反而暴露了连“哈美亲美”的蔡英文都知道，“靠山山倒，靠人人跑”，在关键时刻美国是“靠不住”的，是不可能“协防台湾”的，台湾只能“自求多福”。

岛内绿营媒体还用“阿Q胜利法”式的“话术”给岛内民众“洗脑”。声称台湾不是阿富汗，美国从阿富汗撤军不等于美国不会“协防台湾”。台湾固然不是阿富汗，但美国还是那个美国。美国对两岸若生战端是否派兵“保台”一直保持模糊策略，始终环顾左右而言它，连最低程度的口头承诺都没有，因为没有任何一项美国法律或文件要求美国必须“协防台湾”。所以若是指望美国提供“安全保证”，只能是“台湾自己想多了”。

美国表面虚张声势， 实际为撤离台湾预做准备

对“台湾是否会步阿富汗后尘、成为下一个牺牲品”，美国“亲台”政客也忧心忡忡，曾在阿富汗参战并获得铜星勋章的共和党众议员沃尔兹称，“如果我现

在是在台湾，目睹阿富汗正在发生的这一切，一定会被吓个半死，因为这就是拜登政府所展示出来的美国承诺”。《纽约时报》刊文称，看到阿富汗的下场，台湾应该知道不能指望美国的“保护”。

面对外界质疑，拜登亲上前线，把台湾提升到了与“北约”盟友以及日本、韩国同等重要的位置，声称“美国一向信守承诺，如果任何人入侵北约，美国会做出回应，对台湾日本韩国做法也一样”。美国国家安全顾问沙利文称，“台湾问题不同于阿富汗问题”“美国对台湾承诺一如既往地‘坚定’”。

对美国的此番表态，蔡英文当局视为“定心丸”，台湾外事部门第一时间跟进，回应称，“台美关系正处于历史最高点”“美国政府重申对台湾坚定支持，台湾表示由衷感谢”。

就在民进党当局为拜登言论受宠若惊、欣喜若狂的时候，美国白宫发言人又无情地给台湾泼了一盆冷水，声称“美国对台政策没有发生任何改变”。事实上，美国盖洛普等机构民调数据显示，美国仅有35%左右民众支持“协防台湾”，50%以上民众都不愿意为台湾而战。美国精英界也多认为美国不会“协防台湾”，如芝加哥大学国际政治学教授米尔斯海默(John Mearsheimer)表示，“中国大陆军力持续成长，美国守护不了台湾”。美国智库“国防重点”资深研究员戴维斯(Daniel L.

Davis)称，“美国没有理由去冒着军事失利或财务崩溃的风险去协防台湾”。由此可见，“协防台湾”并不是美国主流民意，美国历史上从未为台湾牺牲过一兵一卒，过去不会，现在不会，将来也不会。“两岸若打仗，台湾只能自己上。”

美国为维护自身利益，1949年抛弃国民党，1979年与台湾“断交、废约、撤军”。美国过去能抛弃台湾，将来依然有可能重演。美国为自己的利益牺牲盟友，信誉已经荡然无存，1975年离开并肩作战的南越，2019年抛弃叙利亚库尔德人，2021年在阿富汗上演“逃跑式的撤离”，台湾应从这些历史经验中看清自己的命运。近期美国军机多次降落台湾，“运输物资是假，演练撤离是真”，主要目的是提前适应台湾机场周边环境，防止出现类似在阿富汗久拖不决的困局，确保若台海有事，可第一时间“金蝉脱壳”。

阿富汗变局对蔡英文“倚美抗陆谋独”的错误政策敲响了警钟，警告民进党当局不能“紧抱美国大腿就以为天下太平，混一天拖一天就以为永远没事”。未来民进党当局应该以阿富汗为鉴，深刻认识到“押宝美国只会自取灭亡”。台湾若不想成为第二个阿富汗，就要在“和”与“战”之间想清楚弄明白，知所进退，只有早日接受“九二共识”、放弃“台独”党纲，才能为台湾海峡带来持久和平。📖

台军作战体系重大调整评析

■ 瞿定国

据台湾《军事家》国际版2021年第6期报道，台湾防务部门主管邱国正5月10日在立法机构表示，未来台军将废止各“军团”“防卫指挥部”等衔称，保留“作战区”以作为今后部队编制。军事观察家认为，这是台湾作战体系的重大调整，对今后台军整建和备战将产生诸多影响，但无法改变两岸军事实力对比的差距，以及“以武谋独”死路一条的结局。

“军团”改衔“作战区”

按照台军防务部门规划，从2022年1月1日起，陆军各军团全部衔称将正式废止。陆军“澎湖防卫指挥部”“花东指挥部”及第6、8、10军团，将分别改称第一至第五“作战区”。这一做法将改变台湾一直由陆军将领担任战区指挥官的现状。

上世纪50年代国民党溃台后，为应对所谓“台澎防卫作战”需要，曾将澎湖与本岛北、中、南、东分为5个作战区，以陆军为主。即：“第一作战区”陆军澎湖防卫指挥部（称“镇疆部队”）；“第二作战区”陆军花东防卫指挥部（称“正义部队”）；“第三作

战区”桃园陆军第6军团指挥部（称“前锋部队”）；“第四作战区”高雄旗山陆军第8军团指挥部（称“干城部队”）；“第五作战区”台中陆军第10军团指挥部（称“昆仑部队”）。此外，还有“作战分区”，如台北关渡指挥部称为“台北作战分区”；兰阳指挥部称为“兰阳作战分区”。各作战区司令以军团司令充任，后军团司令改为指挥官编制后，战时依旧出任作战区指挥官，负责战区作战成败，均为陆军中将编制，平时以军团或防卫指挥部任务为主要职责，当需要救灾或作战时，会以“作战区”相称，但依然是单一陆军的活动。在以往“汉光”演习中演练过的“跨区支援”也只是陆军的动作。

此次改制后的“作战区”，是从体制编制上定位的，情况则不一样。出任指挥官者，陆、海、空军将领均可担任。他们将如同“联参小总长”，能够有效整合陆、海、空军兵力，用于联合作战之中。

有分析指出，台军实行平战结合的战区制，是参考美国军方体制经验，并对应于中国大陆五个战区，以凸显台军的唯一作战

任务及假想敌就是中国大陆解放军。这种思考真是大谬不然，既是在政治上搞“台独”意味的暴露，也是在军事上对中国大陆战区无知的表现。

强化联合作战能力的需求

军事专家认为，调整作战体系、使用作战区编制，是强化联合作战能力、顺应当前全球趋势的做法。未来台海战事极有可能是台湾各作战区独自接战，因此战区指挥官权限与历练相当重要，应能于战时有效统合区域内海、空军与其他单位的作战能量。对此，邱国正表示，考虑到联合作战，需要根据不同战区担负的主要任务调派指挥官，目前虽尚未有定论，但未来会朝此方向逐步规划。此次作战体系改制后，意味着台军作战方式由以陆军为主向三军联合作战转变，陆军将领垄断战区指挥官的现状将被打破，以后会有更多海军及空军将领担任战区指挥官，如同美军和中国大陆解放军一样。这将是一个重大转变。

台湾军事学者向英国广播公司(BBC)介绍，台湾的防务改革一直在进行，作战层级变化只是

其中一环，凸显出在“北京威胁日益增加”之际，台湾防务部署升级的必要性，改革的脚步必须“加速”。近年来，解放军在台湾海峡动作不断，从频频军演到军机、军舰活动日益常态化，为此台湾也必须加快军事防卫部署。从力量对比看，大陆规模较大，台湾规模较小，但台湾希望能通过升级自己的军事力量与结构，显示出“认真自卫”的意愿，并给台湾制造一个“战略性的不对称杠杆”，“就像车子要换轮胎，是要由一个小的点把很重的车子举起来”。“这种不对称策略使得小规模的力量可以反抗大规模力量。”作战体系调整，联合作战能力提升，就是“台湾强化自我防卫能力的一部分”。

期盼战时与“潜在盟友”配合

台湾防务部门智库“国防安全研究院国防战略与资源研究所”所长苏紫云认为，战区架构象征着台湾的战地防卫策略发生了转变，“这不再是一个内陆的考量，而是把思考范围扩大到了近海”。“这符合全世界国家的国防趋势”，也将有利于台湾在未来战时与“潜在盟友”的配合。

谁是台湾未来战时的“潜在盟友”？其实说得不必那么隐晦。首先当然是美国，其次是日本，还有几个可能“跟班”的。近年来，美国、日本违背一个中国原则，高调“挺台”，动作不断，而台湾数典忘祖，挟洋自重，主动

勾连美国、日本。这方面的事例已不胜枚举。

拜登上台后，在政治、经济、军事、外交等多方面对中国进行围堵，但并没有产生多大实际效益，没能阻止中国迅速发展的脚步，但美国对此并不甘心，进而不断炒作台湾议题，挑起事端。今年六七两个月，美国就已3次派出军用运输机赴台，送人运物，上演“快闪”闹剧，直逼中国大陆“红线”，意在不断推进试探“可接受的界限”。这是相当危险的。

除军机入台事件之外，美国串通其他国家拿台湾说事，也越来越频繁。美国、日本“2+2”会议和领导人共同声明都触及台湾问题，“强调台湾海峡和平稳定的重要性，鼓励和平解决两岸问题”。这是美国、日本领导人52年来首次在联合声明中提及台湾问题。两国还共同推动七国集团外长会议也涉及台湾问题。

日本新政府上台后，在台海问题上与美国联动频繁，插手台海事务。日本副首相麻生太郎扬言，“美日要一同防卫台湾”。2021年度日本《防卫白皮书》写入“台湾海峡的稳定比以往任何时候都重要，台海地区正受到中国日益加大的军事压力威胁”。台湾问题事关中日关系政治基础，日本的所作所为严重违背中日四个政治文件精神和日本所作承诺，严重违背一个中国原则和国际关系基本准则，已严重损害中日关

系。中国驻日本大使馆发言人强调，日美国守冷战思维，在地区拉帮结派搞“小圈子”，甚至制造政治对立和军事对抗，完全是逆时代潮流而动，只会带来混乱、分裂与冲突。有学者指出，日本渲染周边安全威胁、抹黑中国维护国家主权利益的正当行动，根本目的是在为自身军事扩张松绑、摆脱战后束缚制造借口，这是很危险的。

对于相关议题，中国外交部发言人曾多次表示，“中国必须统一，也必然统一”。我们愿尽最大努力争取和平统一的前景，但绝不会为任何形式的“台独”分裂活动留下任何空间。希望各方充分认清台湾问题的高度敏感性，恪守一个中国原则，切实谨言慎行，不向“台独”分裂势力发出任何错误信号，多做有利于台海和平稳定的事。

值得警惕的是，美国、日本、台湾都有一些“反华挺独”势力，竟敢冒天下之大不韪，幻想以战争手段解决台湾问题。有分析称，阻止“武统”台湾是美国遏制中国的“最后底牌”。据美国媒体透露，五角大楼正在秘密制定一份关于未来可能发生台海冲突的作战计划。如果美国政府的口头警告和武力威慑都无法阻止中国“武统”台湾，那么美国将与中国进行一场战争。美国将会投入三分之二军事力量，时间定在2030年左右，而地点则在台海周边。此前有消息称，美国、日本

正在就台海战争进行高级别兵棋推演。日本高官还扬言，一旦台海冲突发生，日本将与美国一同“守护”台湾。

7月12日，《联合报》报道称，7月9日，台湾“前参谋总长”李喜明与美国智库“2049计划研究所”专家艾瑞克·李(Eric Lee)在美国国家广播公司新闻网(NBC)发文建议，“美国应在台湾设立军品储备库，并贮存关键国防设备，直接加强台湾的战争准备”。4月18日，台湾所谓“驻日代表”谢长廷也曾提出，“美日台三方”有必要尽快实施联合演习，以应对“大陆方面制造的威胁”。这些都是置台湾人民福祉和安全于不顾的战争叫嚣。

如果两岸一旦不幸发生战事，美国和日本是否会直接出兵参与呢？众多政治家和专家学者压倒性的看法是否定的。从美国来讲，美国不断地“打台湾牌”，是为了美国自身的战略利益，并不是真的“挺台独”“护台湾”。7月6日，白宫印太事务协调官坎贝尔参加美国智库亚洲协会(Asia Society)视讯座谈会时的表态，充分说明了这一点。他直言不讳地表示，美国在维持台海和平稳定上拥有重要利益，“我们支持与台湾坚实的非官方关系，我们不支持‘台独’。我们充分了解这议题极具敏感性”。日本也一样，首相菅义伟和拜登会谈，发表涉台联合声明，回国后态度马上就“变了”。4月20日，菅义伟

就访美行程向国会作报告。一名议员质问：“日本会跟随美国的对华军事战略，在台湾问题上进行军事干预吗？”菅义伟回应说，尽管联合声明提及台湾，但日本不会有军事介入台湾冲突的考虑。上述情况表明，美国、日本对台海情势、尤其是两岸问题依旧维持“战略模糊的可调性”，对台湾安全不打算给予正面承诺，当然也就不可能把军事合作台面化，把出不出兵的问题说得那么明确了。

对于美国在台海问题上的挑衅，中国该如何反制？美国智库兰德公司直接指出，经济实力就是中国目前的王牌，中美之间发生直接军事冲突的可能性很小。中国仅凭经济一招，就可以对付美国的战争威胁和警告。苏紫云之所以提出“潜在盟友”这个概念，大概也是对美国、日本在未来两岸可能的战事中，是否会“军事介入”或者“军事介入”到多大强度，持怀疑或否定态度的缘故。

“改变不了台军战力低落的现实”

对于台军将“军团”“指挥部”改衔“作战区”等改革，岛内网友质疑：“这样打仗就能赢？”有的直言，“再怎么改，也改变不了台军战力低落的现实”“没战力就是没战力”。台湾陆军前“总司令”、退役上将陈廷宠一针见血地指出，目前岛内部队受训只有4个月，战力基本上为零，挡不住大陆的攻势。一旦爆发战争，解

放军就会在最短时间内拿下台湾，让台湾没有机会等美军驰援，而且现在美军根本不可能来。目前台湾和大陆之间的军事差距相当之大，即使美军向台军提供帮助也无法弥补这个差距。

据台湾媒体爆料，从台军训练情况看，严寒酷暑不训练，气温超过32℃不出操，这样的军队很难有战斗力。有网友比较说，台湾新兵男兵徒手跑3000米19分钟合格，而大陆女兵在高原地区徒手跑3000米的合格线是18分42秒。有人在网上晒出一组台军训练照片，只见台军练习打靶时地上铺有软垫，头上有超大遮阳伞遮荫，仿佛是在海边沙滩悠闲度假。网友在粉丝专页发文称，“草莓兵团待遇真好！实弹射击打靶训练，制作铁架，软垫，栈板，大型遮阳伞！……雨大不打，太热不打，太冷不打”。这种情况真令人难以相信。但经台湾防务部门查证，确有其事。这是台南后备指挥部举行的例行射击训练时拍摄的，打靶的都是尉级以下军职人员，靶场是在官田区203新训旅靶场。颇具讽刺意味的是，号称台军“最精锐特战部队”的两栖侦察营，竟然也是在基地游泳池里完成初期技能培训和日常训练的。难怪台湾网友要嘲讽台军为“草莓兵”了。

对于若有战事台军能撑多久，台湾防务部门前负责人冯世宽曾宣称，台军实力比以往大，可撑不止两周。另一位前负责人

日本借台湾问题扩张自卫队军事实力

■ 曾晓栩

一、日本对中国政策发生转向

台湾媒体报道，8月27日，日本自民党国会议员与台湾民进党民意代表举行“台日外交防卫政策交流”，即所谓双边安全对谈，变相开展官方往来，公然违背一个中国原则和中日4个政治文件精神，干涉中国内政。

近10年来，中国与日本之间关系起起伏伏。2010年发生“中日钓鱼岛海域撞船事件”，2012年因日本“国有化”问题爆发“中日钓鱼岛冲突”后，中日关系一度恶化。直到2017年，中日关系出现向好的态势。除了双方基于经济社会领域互利互惠的双向多元

合作发展需求因素外，美国因素也起着相当大影响作用。特朗普政府对日本予取予夺的做法，让日本对美日同盟的不确定性深感疑虑。

2018年5月，中国国家主席习近平和日本首相安倍晋三进行电话会谈，推进了双边关系缓和与改善。接着中国总理李克强访问日本，日本首相安倍晋三访问中国。特别是2018年安倍晋三访问中国，明确提出要把日中关系由竞争转向协作，扩大合作空间。习近平应安倍晋三之邀拟于2020年4月访日，期待双边关系进一步改善。但是，随着新冠疫情爆发与蔓延，习近平访日延期。之后，

安倍晋三辞职，菅义伟接任首相。虽然菅义伟刚上台时与习近平举行电话会谈，中日关系仍然维持了改善基调，但是当针对中国成为了“菅外交”的关键内容，尤其是2021年4月16日菅义伟访美，与美国总统拜登共同发表涉及台湾问题干涉中国内政的日美联合声明后，中日关系发生重大倒退。

中日关系转向，其中有两个主要原因：一是日本国内的原因。菅义伟刚当选首相时，民调支持率曾经一度达到74%，为日本历届政府第三高。但是随着日本疫情蔓延，疫苗接种普及率低，感染人数居高不下，一些地方的医疗体系行将崩溃，再加上受疫情

严德发也曾夸口称，从来没有撑多久的问题，心中只有一个信念，就是任何时候，绝不让对手得逞。防务部门负责人邱国正更是口出狂言，不要问大陆攻台台军能扛几天，而是大陆“要打多少天，我们就奉陪多少天”。有台湾网友打脸说：“只能打一天，因为一天就结束了。”

众所周知，海峡两岸经济力量对比日益悬殊，军事力量优势

也早已向祖国大陆倾斜。如今无论是质量还是数量，台湾三军装备均远落后于解放军。这还没有计算解放军火箭军的各种“快递”和战略支援部队的有力支撑。台军作战体系即使调整后，五个“作战区”最多也只能和祖国大陆一个战区相对应。至于未来，恐怕真如网友所言，只能“和一个省军区比较了”。

习近平总书记在庆祝中国共

产党成立100周年大会上的讲话，发出了对一切企图阻碍祖国统一势力的严正警告：“坚决粉碎任何‘台独’图谋，共创民族复兴美好未来”，强调“任何人都不要低估中国人民捍卫国家主权和领土完整的坚强决心、坚定意志、强大能力”。两岸同胞应当积极响应号召，把握大势，携手粉碎“台独”，为实现祖国完全统一的任务而奋斗。✿

影响经济状况不佳，日本民众认为这都是政府不作为。而菅义伟内阁却只关心是否如期召开东京奥运会，希望通过奥运会的成功召开提高支持率。事与愿违，奥运会闭幕后首个民调显示，菅义伟的支持率滑落到28%，自2020年9月以来，首次低于30%，而且由于疫苗接种缓慢，截至2021年8月6日，日本累计确诊新冠肺炎病例突破百万。9月，日本将举行自民党总裁选举、众议院选举。为了转移国内矛盾焦点，提振内阁支持率，菅义伟通过挑衅中国，深化与美国的协作，把民愤引向国外，获得民众支持，以强硬立场彰显其作为领导人的决断能力，获得美国的支持以助其实现连任。

二是美国政府以更加强硬姿态对付中国，中美关系持续处于紧张状态。拜登上任伊始就宣布将联合盟友全力遏制中国，拜登政府以世界秩序、民主自由价值观以及经济供应链产业链安全链为连结基础，建立更加广泛的联盟。拜登力图最大程度上发挥盟友的作用在地缘战略竞争中遏制中国。美国要求盟国加强对拜登提出联盟政策的承诺，随着日本在美国全球战略中的权重不断增加，美国要求日本一致对中国采取严厉态度，在安保领域对华保持强硬路线。日本将此视为扩张影响力牵制中国的机会，菅义伟内阁一改此前尽量不刺激中国的做法，明显转向美国，全力配

合拜登“联合盟友与中国展开全面竞争”战略，进一步巩固了美国对日本的安全承诺，同时借日美联盟扩大日本在区域内的影响力。

二、日本公然干涉中国内政，借台湾问题增强防卫能力

(一)日本新版《防卫白皮书》渲染台湾海峡“有事”，高度关切突发事态

拜登政府上任以来，在多个领域推动发展与台湾地区的关系，除了多次重申恪守“与台湾关系法”及对台“六项保证”外，还表示对台承诺“坚若磐石”。7月13日，作为美日同盟盟友的日本，内阁会议通过2021版《防卫白皮书》，公然干涉中国内政的台湾问题，首次明确指出稳定台湾地区局势对日本安全保障和国际社会稳定十分重要。《防卫白皮书》提及台湾地区局势对日本的影响，是鉴于日美首脑4月16日联合声明中52年来首次提及“台湾”，有意展现出日本防备突发事态的姿态。

日本2021版《防卫白皮书》指出，从特朗普总统上台开始，美国对台湾地区的关注日益加深，不仅依据“与台湾关系法”对台军售达11次，派遣军舰频繁通过台湾海峡，而且还积极派遣高层官员访问台湾地区。从美中动向看，拜登政府将同前任特朗普政府一样，在军事上力挺台湾的立场将更为明显；与此同时，把台

湾问题视为其核心利益的中国也几乎不可能在台湾问题上对美国做任何妥协。

日本1997年《日美防卫合作指针》及1999年《周边事态安全确保法》中早已有“周边事态”的表述，这其中就暗含了当台湾海峡“有事”时，日美得以合作之意。到了2015年安倍晋三制定力图解禁“集体自卫权”的《和平安全法制整備法案》，则更进一步提出了“存立危机事态”和“重要影响事态”概念。这些文件虽然都没有直接点出“台湾”，但却指向明确，揭示了日本一直以来将台海安全纳入日本安保议题的考量范围。2021版《防卫白皮书》强调，美中之间在台湾问题上的对立可能趋于明显，因此稳定台湾地区局势对于日本的安全保障以及国际社会的稳定而言非常重要，日本有必要以高度紧张感对此密切关注。中国在台湾地区周边的军事行动趋于活跃以及台湾对此所作的应对，让外界无法否认两岸军事紧张情势升高的可能性。“随着中国迅速提升其军力，美中军力平衡中的变化有可能影响印太地区和平与稳定，因此有必要对两国在南中国海和台湾地区的军事动向给予更多关注。”

同时，日本还挑动中国周边国家和中国对立。日本认为在印太区域内通过增加更多潜在的平衡力量，将会使中国解决台湾问题的行动计划和环境更趋困难与

复杂化。这对日本也将更为有利。在美国和日本的有意渲染和推动下，印太区域内国家将台湾问题视为美中在亚洲安全紧张局势的晴雨表，并在制定自己的安全战略时，将台湾问题列为需要重点考虑的因素。

(二) 把中国解决台湾问题的决心，视为日本行使集体自卫权的“存立危机事态”

蔡英文当局持续对美军购，妄图打造对抗统一的“非对称军事能力”。蔡英文已经把防务预算又上调了10%，达到台湾地区生产总值的2%，达到20世纪90年代以来最高水平。蔡英文自2019年起就反复向日本提出希望展开台日安保对话。蔡英文曾在2019年一次采访中表示，准备自己承受来自中国大陆的第一波打击，直到其他国家的后援到来。而菅义伟内阁2020年一上任，防卫大臣岸信夫即透过《产经新闻》表示将与台湾地区展开安保对话。

2月，日本自民党组建一个新的“对台政策研讨小组”，探讨今后如何实质性进一步提升日台关系，以便“更有效地制约中国”。自民党再次提出日本应该像美国的“与台湾关系法”一样，有一个自己版本的对台交往法案，和台湾地区之间应该要有“外交”以及“国防”的“2+2”对谈。3月16日，美日外交部部长与国防部部长“2+2”会谈就涉及台湾地区。

在《日美安保条约》中，日

本出动自卫队的前提是基于“周边事态法”，尽管宪法仍然禁止自卫队在不完全以防御为目的的情况下使用武力，但经过日本政府多次有意的修改和日美持续更新联合军事计划，自卫队可以基于几种不同情况做出必要且最低程度的军事行动。如在日本领土以外地区，若是造成“存立危机事态”，也就是威胁日本生存的情况，日本可以发动集体自卫权配合美军的行动，日本也可以对遭受攻击的盟军提供防卫等。如日本与澳大利亚正在就6年前启动的防卫合作协议《互惠准入协定》进行最后磋商，将允许日本自卫队保护澳大利亚军事资产，将澳大利亚军队追加列入日本自卫队保护他国军队舰船的“武器等防护”对象事宜。“武器等防护”是日本自卫队应他国军队请求而保护舰艇和飞机的行动。以前日本只和美国有类似协议，目前日本与澳大利亚的磋商已进行到最后阶段。

3月14日，日本自卫队前统合幕僚长河野克俊在电视节目中说，现在安全保障的最前线是第一岛链，日本和台湾地区都在这个岛链上，所以“台湾有事”，直接意味着“日本有事”，会对日本产生重大影响。7月5日，日本副首相兼财务大臣麻生太郎表示，“如果中国侵犯台湾，日本应将其视为存立危机事态，行使集体自卫权，与美国一起防卫台湾”。7月6日，日本官房长官加藤胜信

表示，“存立危机事态”的认定范围提前决定与表态是很困难的。日本会根据对日安全造成的影响程度，决定应该采取什么样的措施。

日本正在加大军费投入，防卫大臣岸信夫表示，“日本的军费要以保卫国家的标准来筹措，而不是以国内生产总值(GDP)的比例”。日本不再将国防开支限制在国内生产总值1%以内，并且将以安全威胁程度决定防务开支水平。岸信夫表示，日本防卫省自卫队不仅与美国，而且也要与澳大利亚、印度、英国法国等欧洲国家、加拿大、新西兰等国家积极合作，共同遏制中国，对维护地区与国际社会的和平与安全做出更多贡献。不过，岸信夫还表示，目前日本不打算与台湾地区建立直接军事关系，因为他相信台湾地区“有自卫能力”。

(三) 日本与美国针对中国开展联合军事演习

6月30日，英国《金融时报》文章指出，由于担心可能因台湾问题与中国大陆发生冲突，美国和日本一直在秘密举行专项军事演练和联合军事演习，以应对中国有可能发起武力夺取台湾地区的行动。

美日军方从特朗普总统任期最后一年开始为台湾地区可能发生的冲突认真计划，并进行了最高机密的沙盘推演。美国军方和日本自卫队曾经以救灾训练为名在南中国海举行联合军事演习；

双方也曾在钓鱼岛附近举行更多军演。美国前助理国防部部长薛瑞福表示，“我们所进行的一些训练活动是可以高度互换的”。例如，在“救灾的情势下”进行两栖登陆，可以“直接运用于”钓鱼岛或台海周边任何冲突。4月，4架驻日美军F-16战斗机挂载实弹从三泽基地长途奔袭至台湾南部巴士海峡海域，与罗斯福号航母战斗群展开联合训练，演练“台湾有事”时的“近程驰援”。5月中旬，日本联合美国、法国、澳大利亚首次在东海进行联合海上演习，并在九州岛雾岛演习场开展直升机突击及巷战演习。曾经担任过华盛顿号航母战斗群指挥官、美军印太司令部作战部部长的退役海军少将蒙哥马利公开宣称，美国需要对日本在战时可以提供的支援有一个“全面的了解”，“随着危机的爆发以及日本变成潜在参战一方，美国需要了解日本可以如何支援或加强美国的作战能力”。

一旦美中就台湾地区爆发冲突，美军将必须依赖日本的空军基地，美日两国外交官都在检讨与双方联合军事行动相关的法律问题，包括军事基地的使用以及在美中发生冲突时日本可以向美军提供什么样的后勤支援。

美日想要与台湾地区组建一个三方资讯分享机制，以密切关注中国海空军动向，特别是中国海空军进出台湾东边宫古海峡的情况。宫古海峡东北部部署有日


本的传感器，而在宫古海峡西南部则部署有台湾的传感器。“台美之间和日美之间已经在分享各自传感器收集的资讯和数据，但是三方没有直接分享的机制。”不过，三方在2017年分享了军机识别码，以帮助确认友军军机。在美日两国开始扩大双边联合军事计划的时候，日本要求美国提供并分享其有关台湾地区的作战计划。但是美国国防部的回应却并不干脆，因为美国出于控制日本的考虑，希望分阶段扩充与日本的军事协调。

三、日美外部势力干预不可能改变中国走向统一大趋势

为了延续执政，菅义伟选择基本无条件地满足美国诉求，但这并没有带来支持率。在新冠疫情新一波冲击下，民众普遍不满，党内大佬派阀不再力挺，菅义伟不得不黯然宣布弃选自民党总裁，从而无缘首相连任。新当选的自民党总裁岸田文雄成为下任首相，岸田文雄在9月29日记者会上表示，将推进安倍的“自由开放的印太构想”，重视菅义伟参与的日美澳印四方安全对话机制首脑会议。预计岸田文雄将在外交和安全保障方面将沿袭前任路线。

关于台湾问题，1972年《中日联合声明》第三条明确规定，中华人民共和国政府重申：台湾是中华人民共和国领土不可分割的一部分。日本国政府充分理解

和尊重中国政府这一立场，并坚持遵循《波茨坦公告》第8条立场。此后，1978年《中日和平友好条约》，1998年《中日联合宣言》，2008年《中日联合声明》都重申了这一原则。也就是说，关于台湾的归属问题，日本通过4个政治文件郑重向中国做过承诺，4个政治文件也成了自中日邦交正常化以来中日两国关系的基础。台湾问题事关中国核心利益，事关中日关系政治基础，事关两国间的基本信义。

妥善处理台湾问题是中日关系的前提与基础，日本在涉台等问题上动作频频，日本确认台海“有事”日美同盟将紧密合作，日本公然违反国际协议把台湾问题与日本的安全联系起来，是损害中国主权、安全和发展利益的行为。台湾是中国的一部分，解决台湾问题是中国内政。两岸势必走向统一，美国和日本实质提升对台关系也好，美日同盟加强协防台湾地区也罢，无论外部势力如何干预和介入，都不可能改变这一大趋势。7月1日，习近平总书记在庆祝中国共产党成立100周年大会上讲话强调，“解决台湾问题、实现祖国完全统一，是中国共产党矢志不渝的历史任务，是全体中华儿女的共同愿望”，要“坚决粉碎任何‘台独’图谋，共创民族复兴美好未来。任何人都不要低估中国人民捍卫国家主权和领土完整的坚强决心、坚定意志、强大能力”。

蔡英文“台独”的变异、构造及特质

■ 周天柱

提及台湾的“台独”历史，有三个代表人物众人皆知，按在台执政顺序排列，那就是“台独教父”李登辉(A型“台独”)、“台独之子”陈水扁(B型“台独”)，及现仍当政的“台独之女”蔡英文(C型“台独”)。李登辉早就背上“叛徒”骂名，先后背叛了共产党与国民党，在台湾执政长达12年。下台后自创“极独”“台湾团结联盟”。陈水扁与蔡英文则都是以民进党为垫脚石，前者执政8年，后者已掌权5年多。

笔者撰写这篇文章的起因，是台湾大陆事务主管邱太三接受媒体采访时曾流露出一句“真心话”：(我)还不太清楚大陆对“台独”的定义。这就令人好生疑惑，作为民进党资深党员、曾担任台湾司法部门负责人多年的邱太三，竟然自认至今仍对“台独”的定义“还不太清楚”。那我们就遵照习近平总书记在庆祝中国共产党成立100周年大会重要讲话所强调的，“坚决粉碎任何‘台独’图谋，共创民族复兴美好未来”要求，把上述三个岛内“台独”代表人物的三种“台独”类型，放在阳光下好好晒一晒。

A、B、C型“台独”的变异

剖析A、B、C型三种“台独”的变异，首先必须追根溯源，不管哪种“台独”，其最根本的政治宗旨是将“台湾”与“中国”彻底切割，将台湾从中国的版图独立、分割出去。而正是这条政治宗旨，最终将李登辉、陈水扁、蔡英文绑在历史的耻辱柱上。

A、B、C型“台独”尽管最终目标相同，但三种“台独”自立于不同的主客观环境，为能达到“台独”目的，所采取的策略有所不同。

一、李登辉“修宪台独”

李登辉在任期间，受自身是国民党主席的身份限制，其推行的“台独”有一个从“暗独”到“明独”的过渡转变过程。1991年起，李登辉开始“修宪”，到下台前的10年时间，竟连续7次“修宪”。而“修宪”的最终目的，是不断推进“台独”或“独台”，从法理上切断台湾与祖国大陆的联系。为此，A型“台独”被称为“修宪台独”。

二、陈水扁“制宪台独”

陈水扁当政时期，一再刻意操弄统“独”议题，接连抛出“一边一国”“正名制宪”“入联公投”

等激进“台独”政见，并付诸实践，将两岸关系推到危险的边缘。陈水扁的激进B型“台独”路线，集中体现在“制宪台独”。他曾一再公开提出“宪改”“要认真考虑领土问题”，明确提出更改“国号”、“国旗”、领土范围等敏感问题，企图以“公投”方式催生所谓“台湾新宪法”。

三、蔡英文“释宪台独”

C型“台独”又被称为“释宪台独”，是因为在蔡英文看来，面对岛内错综复杂的政治形态和两岸长期僵持的政治对峙，“释宪台独”是可行而又便捷的通关快捷方式。因为“大法官”的第一要义是“解释宪法”，“释宪”是以会议形式决定，不需要冗长复杂的程序。如果大法官把“台独”理念输送到解释文里面，就有可能形成“法理台独”。

现台湾“司法院”共设15名“大法官”(包括“院长”“副院长”各一名)，蔡英文直接掌握了11位。“司法院院长”许宗力是“两国论”主笔；“司法院副院长”蔡炯焜长期与绿营团体保持密切关系；另几位“大法官”多数均明确支持“人民公投制宪”。许志雄与黄昭元更是公然表达不认同

现行“宪法”的立场。按“大法官”“释宪”规定，2/3以上“大法官”出席及出席人数2/3同意即可通过。蔡英文应可完全主导“释宪台独”。

蔡英文C型“台独”的形塑构造

蔡英文C型“台独”的形塑构造，由密不可分的两部分内容组成，一是“台独”的理论论述，二是“台独”的表现形态。

一、C型“台独”主要理论论述

作为C型“台独”的吹鼓手，蔡英文的“台独”主要论述随心所欲，随着情势的变化而不断变化。由“台湾共识”“维持现状”“台湾价值”，演变为最新版本的“中华民国台湾”。

(一)“中华民国台湾”

蔡英文抛出所谓“中华民国台湾”论调，从表面上看似“中华民国”与“台湾”等同，是将台湾岛内长期存在的“中华民国”派和“台湾”派撮合在一起，从而形塑台湾内部在所谓“政治认同”上的最大公约数。但究其实质，究竟是“中华民国”的“台湾”，还是“台湾”就是“中华民国”，谁也说不清楚。但有一条让人明白，“宪法一中”已束之高阁，所谓的“中华民国”仅仅是“台独”的遮眼布。

(二)“台湾民族论”

“台独”势力为了从血缘上“去中国化”，建构“台独”的民族主体性，由民进党当局审定的历史教科书，煞费心地加入“南

岛语族”与“有唐山公，无唐山妈”等概念。他们先是创造“只有唐山公，没有唐山妈”的谎言，然后再用粗糙与错误的的数据，力主台湾近85%以上的人都有平埔族的“南岛语族”血统。这种“台湾国族血统论”自然经不起遗传学的科学检验，但是却被民进党拿来作为“教育台独”“文化台独”的依据。

蔡英文想尽办法杜撰了莫名其妙的“台湾民族论”，认为“台湾原住民属于南岛语族”，强调台湾是“南岛语族”地理分布的最北端，并配上一张图把祖国大陆与台湾完全划开；讲大坵坑文化时不再提及与祖国大陆的关系；教师手册则直接写明，“台湾原住民人种属于马来人，语言属南岛语系”，无视许多学者认为的“南岛语族”源于华南论述，以及亮岛人被发现于马祖的事实。蔡英文当局幻想用“南岛语族”取代“中华民族”地位，甚至从遗传学角度否定两岸同胞同根同源，试图从民族角度“去中国化”，捏造“台独”理论中的重要支撑——“台湾民族论”。

(三)变相“法理台独论”，即推动“准法理台独”与“释宪台独”

“法理台独”被定义为体现解构一个中国原则、完成台湾的所谓“国家化建构”，其核心内容是重新定义台湾本为一个“主权独立国家”，界定其“领土”为台、澎、金、马。

对于如何判断“法理台独”，祖国大陆学界认为：第一是改“国号”、制定“新宪”；第二是“修宪”推翻“宪法”第四条“固有疆域的规定”；第三是“修宪”推翻“宪法”第六条“国旗”。此外，在两岸尚未统一情况下，除了上述三个重大变更之外，还包括台湾地区擅自更改政权具有象征意义的“歌曲、旗帜、徽章”现状，在台湾岛内推进含有改变两岸同属一国性质和把台湾从祖国分裂出去的“台独公投”等，都属于“法理台独”组成部分。《反分裂国家法》已为“法理台独”划下不可逾越的红线。

就目前岛内政治生态而言，变相“法理台独论”，即推动“准法理台独”与“释宪台独”，不仅理论上具有象征意义，更重要的是完全具有现实的可能性与可行性。蔡英文提名宣扬“两国论”的“台独”“大法官”已上任，她还力图通过“司法改革”对法官进行“政治任命”。若这一设想过关，蔡英文一再追求的由“大法官”解释两岸关系政治定位与台湾“国家性”的“宪法解释”即可实现。

二、C型“台独”核心表现形态

由蔡英文主导的C型“台独”核心表现形态，与台湾地区领导人选举密切相关。具体排列如下：

“台湾共识”(2011-2012年，蔡英文第一次投入台湾地区领导人选举)——“维持现状”(2015-

2016年，蔡英文第二次投入台湾地区领导人选举)——“台湾价值”(2018年)——“中华民国台湾”(2018-2019年)——进一步“修宪”(2020-2021年)。

(一)“台湾共识”

蔡英文第一次参与台湾地区领导人选举，为赴美“应考”，匆忙提出“台湾共识”。蔡英文提出的“台湾共识”只有框架，并无实质内容，一句空洞的“由2300万台湾民众决定”，使选民一头雾水，最终选举败北。而凸显“台湾”的“共识”，明显贯穿蔡英文的“台独”主张。

(二)“维持现状”

蔡英文第二次参与台湾地区领导人选举，汲取上次选举惨败的教训，提出模模糊糊的“维持现状”，迎合岛内多数选民求安定求和平的心愿，最终骗取800多万张选票如愿当选。马英九的一句狠话戳穿了蔡英文的“台独”本质：“你究竟是维持陈水扁时期的‘现状’，还是我当政时期的现状?!”显然是前者而不是后者。

(三)“台湾价值”

“台湾价值”包含了“国家认同”“宪政体制”及两岸政策。蔡英文以“像说‘台独’，又没说‘台独’”的抽象词汇，替代表达“台独”的隐藏意涵，可谓煞费苦心。

(四)“中华民国台湾”

“中华民国台湾”是近些年来蔡英文四处兜售的最新“台独”

理念。蔡英文当局刻意将“中华民国”与“台湾”并称，不是要追求两岸连接，而是要使台湾现行体制进一步靠拢“台独”，以期凝聚岛内民意最大公约数，合力维护所谓台湾“主权”，用以对抗祖国大陆，推动“台独”。

(五)进一步“修宪”

这是自陈水扁执政时期以来，时隔17年民进党再提以推动“法理台独”为目的的“修宪”行动。去年一年，台湾民意代表提了各项“修宪案”43件，其中3件与“法理台独”直接相关(一件因太露骨已被迫撤回)。目标是通过“修宪”方式降低未来“修宪”门坎，通过删除“宪法”增修条文前的“国家统一前”等字样，以及修改“宪法”规定的“固有疆域”等，从法理上实现“一边一国”，为未来的“台独制宪”提前打下伏笔。目前民进党已完全主导立法机构，具备“立法”挑衅两岸政治定位或偷渡“一边一国”“两国论”意识形态的能力。

C型“台独”主要特质

蔡英文在台湾执政已5年多时间，由蔡英文一手推展的C型“台独”早已在台湾社会、政治、经济、文化、教育、军事、法律等各个领域全面铺开，其范畴的宽泛，渗透的快速，影响的恶劣，大大超过了A、B型“台独”。C型“台独”的主要特质是构成这类“台独”的关键元素。

一、只做不说，多做少说

这是C型“台独”极为重要的一个特质。蔡英文之所以要保持如此低调，为的是就她原本不多的言论，布下外人始终琢磨不透的迷魂阵。媒体、智库尽可这样那样解读，反正不是她亲自破题，如有问题仍有回旋空间。

二、小英闭嘴，他人多言

预设金蝉脱壳之计，实在有话须讲，蔡英文不说，交给助手或下属讲。万一无法自圆其说，因不是蔡英文讲，可赖可退，进退自如。

三、随情势变化而变化，或采取进两步退一步策略

前述蔡英文的核心论述时，读者已看得很清楚，蔡英文精于随情势变而变，从“台湾共识”到“准法理台独论”，不知变了多少次。现在再问蔡英文何谓“台湾共识”，已有10年时间，她仍讲不清楚。

至于进退问题，蔡英文最擅长进两步退一步。进多遭反弹，就稍退一点，趁你不注意再进。

四、蛊惑人心，骗民耳目

把谣言重复一百遍，甚至一千遍，不怕你不相信。

五、混淆逻辑，胡乱嫁接

断章取义，人为嫁接，是蔡英文驾轻就熟的拿手好戏。正如赵少康在批评蔡英文的一次谈话中所指出的，明明人家在《告台湾同胞书》发表40周年纪念会上没有讲“九二共识”就是“一国两制”，那是在一篇很长的讲稿里前、后段的叙述，是不同的场

景，民进党却要把这移花接木乱嫁接，说人家有讲，扣人帽子。

六、针锋相对，即刻反应

为更多地干扰、阻碍、破坏两岸关系发展，民进党当局网罗岛内行政主管部门，以及台湾的智库、学者，专门成立了针对祖国大陆的反击型工作小组。祖国大陆一颁布促进两岸关系发展的新政策，针锋相对地第一时间进行反击。

七、在“文化台独”上大做文章

蔡英文深知，没有青年的选票，民进党就无法执政，而要影响广大青年，唯有大力推行“去中国化”文化与教育。按一本教科书10年版权计算，每年约20万台湾学生使用，10年就是200万，加上外溢效果，估计全台湾有400万人受到“去中国化”教科书影响。

八、利用网络，制造恐怖

民进党当局豢养、纵容“网络水军”抹黑污蔑祖国大陆、打击岛内异己，已不是什么新鲜事。岛内媒体早就揭露，民进党当局通过各种资金支持的公关公司豢养网军。眼下在岛内，谁如果敢对民进党说个“不”字，网军各种污蔑谩骂就如潮水一般排山倒海而来。

若干思考与建言

习近平总书记庆祝中国共产党成立100周年大会重要讲话强调，“坚决粉碎任何‘台独’图谋，共创民族复兴美好未来”。针对

“台独”分裂活动，“坚决粉碎”是祖国大陆第一次提出，是比反对“台独”，打压、遏制“台独”更为严厉、更为迫切的升级版战略部署。C型“台独”决不会甘心失败，会不断变换面目与手法，不断挑衅两岸关系现状与发展。祖国大陆面对更加复杂严峻的海形势，必须做好充分思想准备。

近年来，祖国大陆针对“台独”分裂势力的频频挑衅，在国际社会与其展开了激烈较量，祭出了不同类型的“惩戒措施”，适时遏制打击了“台独”势力，教育引导了台湾民众。归结起来祖国大陆的“惩戒措施”有以下几种类型：

第一、“世界卫生组织（WHA）模式”。即严禁台湾当局在没有与中国大陆协商基础的情况下出席国际组织相关会议。

第二、“圣多美与普林西比模式”。即与中国大陆建交或复交的前提，必须先与台湾“断交”，要求其断绝与台湾一切官方往来的模式。

第三、“尼日利亚模式”。即禁止使用“中华民国”字样称谓，将台湾在该国的派驻机构逐出该国首都，禁止该国与台湾当局发展任何实质的官方关系模式。


第四、“斐济模式”。即要求与中国大陆建交国撤销实质“具有政治意涵”驻台机构的模式，包括名称、活动范畴及内涵。

第五、“越南模式”。即在中国与越南签署的《中越联合公报》

中，越南重申“坚定奉行一个中国政策，支持两岸关系和平发展与中国统一大业，坚决反对任何形式的‘台独’分裂活动，不同台湾发展任何官方关系”的立场。

自去年起，台湾当局“以疫谋独”，在欧洲、南美洲地区加大了拉拢与中国大陆建交国以及欲与台湾断交所谓“邦交国”的力度，企图在上述地区制造关系突破的假象。为此，对待任何形式的“台独”决不能手软。“台独”现象一露头，即可酌情选择上述“惩戒模式”，将其消灭在萌芽状态，坚决粉碎“台独”图谋。

针对蔡英文一刻不停加快加大的“台独”行径，祖国大陆有必要通过最权威形式，如发表白皮书等，严厉批驳民进党当局杜撰的各种“台独”谬论，重点抨击新近冒出的种种论调，如“中华民国台湾”“台湾民族论”“准法理台独论”等。两岸台湾问题学者、教育专家、历史学家肩负义不容辞的重大责任，须充分运用详尽、科学、客观、公正的研究成果和基础资料，戳穿、驳斥民进党当局大搞“台独”的种种政治谎言。

根据笔者长期跟踪研究蔡英文所得出的结论，在不遗余力着重推进C型“台独”的蔡英文当局眼里，从没有“最独”，而只有“更独”。不断创意、变化新招是蔡英文的本性所驱，对此我们应该始终保持高度警惕，并第一时间予以精准打击。

蔡英文当局“阻融抗统”“修法”类型及主要内容简介

■ 陈咏江

2016年民进党重新上台以来，凭借占据立法机构多数席次的优势，在不直接碰触“法理台独”红线的情形下，大搞“阻融抗统、去统趋独”的所谓“法律防卫机制”，先后修订“国安五法”“反渗透法”等系列规定，对两岸关系发展造成极其恶劣的影响。“修法”内容涉及面向广泛，为有效掌握其“修法”状况，现将其“修法”类型及主要内容整理介绍如下：

一、修订“两岸人民关系条例”相关基本规范，试图改变两岸交流融合方向

(一)“两岸人民关系条例”相关“修法”开始紧缩两岸人民交流

“两岸人民关系条例”是岛内直接规范两岸人民交往最主要规定，马英九时期曾经在助益两岸互动方面进行多次修订，包括扩大两岸商品贸易、实施两岸学历互认等，大幅促进两岸大交流局面的形成和发展。蔡英文当局则反其道而行之，大幅增加防范措施，涉及“违规陆资入岛处罚”“两岸政治协商限制”“退役将领登陆管控”等不同领域。

一是封锁两岸政治协商。针对两岸政治协商进行“立法”限制由“时代力量”最先于2019年3月15日提出。随后，在大陆事务主管陈明通推动下，蔡英文当局于4月9日提出行政部门版本的限制“法案”。两个版本都指向增订“两岸人民关系条例”第5条之3。在绿营全力护航以及蓝营弃守情况下，该案在立法机构进展极为顺利。5月31日，立法机构三读通过增订“两岸人民关系条例”第5条之3，共10项内容，对两岸政治协商进行全方位封锁限制。主要内容包

分之三之出席，及出席‘委员’四分之三之同意，始得开启签署协议之协商”。协商过程须适时向立法机构报告，若全体民意代表二分之一以上之决议，可要求负责协议之机关终止协商。立法机构会议审查协议草案经全体民意代表四分之三之出席，及出席代表四分之三之同意，再由行政部门将协议草案，连同“公民投票”主文、理由书交由“中央选举委员会”办理“全国性公民投票”，其获有效同意票超过投票权人总额之半数者，即为协议草案通过，经负责协议之机关签署及换文后，呈请台湾地区领导人公布生效。“主权国家地位”与“自由民主宪政秩序”之毁弃或变更，不得作为政治议题谈判及协议之项目。“违反该条规定所为之政治议题协商或约定，无效。”

二是加大违规陆资入岛处罚力度。针对陆资的特别“立法”防范，同样最早由“时代力量”于2017年5月19日向立法机构“内政委员会”提交草案。2017年10月，蔡英文当局正式提出行政部门版本草案。11月底，民进党民意代表庄瑞雄等20人也提出不同版本。三个版本经过折冲调整，都指向修订“两岸人民关系条例”第93条之1。2019年4月9日，原93条之1正式“三读”修订完成，由原来的6项内容增订为7项，且每一项内容均有所调整。修订后的第93条之1针对“违反第七十三条第一项规定从事投资者”，不仅将处罚额度由原来的60万元新台币以下提高到2500万元以下，而且规定“必要时得停止其股东权利”。同时，增加了“规避、妨碍、拒绝检查”也要面临处罚的情形，并提高了处罚上限。

三是管控退役将领“登陆”。从2016年9月起，

先后有民进党民意代表罗致政、李俊俤、洪宗熠、赖瑞隆、林俊宪、刘世芳、邱议莹，以及“时代力量”民意代表徐永明等领衔提出不同版本针对退役将领“登陆”进行“立法”限制的草案。2017年9月，行政部门版本出炉，涉及第9条、第9条之3及第91条等。2019年7月3日，立法机构临时会三读通过修订第9条及第91条，增订第9条之3，主要内容包括：扩充赴陆受限的公务人员范围，不仅包括涉及“国家安全”人员，也含涉及“国家利益”人员；对于政务人员、“直辖市市长”，以及防务、外事、科技、情报、大陆事务或其他相关机关从事涉及“国家安全”、利益或机密业务之人员，进入大陆地区返台后，应向（原）服务机关或委托机关通报；“直辖市市长”应向行政部门、县（市）长应向内务部门、其余机关首长应向上一级机关通报；曾任防务、外事、大陆事务或与“国家安全”相关机关之政务副首长或少将以上人员，或情报机关首长，不得参与大陆地区党务、军事、行政或具政治性机关（构）、团体所举办之庆典或活动，而有妨害“国家”尊严之行为，如向象征大陆地区政权之旗、徽、歌等行礼、唱颂或其他类似之行为；有妨害“国家”尊严之行为者，得由（原）服务机关视情节，自其行为时起停止领受5年之月退休（职、伍）给与之50%至100%，情节重大者，得剥夺其月退休（职、伍）给与；已支领者，并应追回。

（二）修订“台湾地区与大陆地区人民关系条例施行细则”，具体增加限制交流规定

2018年5月30日，行政部门修正发布“台湾地区与大陆地区人民关系条例施行细则”，增加大量对大陆地区人民进行防范、限制的具体条文。

一是增设“国安”条款。“台湾地区与大陆地区人民关系条例施行细则”修订包括第2条、第4条、第5条、第8条、第15条、第17条、第20条、第22条、第40条、第42条、第43条、第45条、第46条、第55条，并删除原第14条、第18条、第54条条文。其中，涉及“国家安全”条款的内容主要包括：增加了“验证大陆地区制作文书的补正事项”；增加了因危害

“国家安全”而径行强制其出境的情形；明确“经事业主管机关核可受聘担任学术研究机构、社会教育机构、专科以上学校及戏剧艺术学校之研究员、副研究员、助理研究员、博士后研究、研究讲座、客座教授、客座副教授、客座助理教授、客座专家、客座教师不得担任涉及‘国家安全’或机密科技研究之职务”。

二是增加限制性规定。修订后“台湾地区与大陆地区人民关系条例施行细则”还增设了针对祖国大陆地区人民的限制性与歧视性规定，重点内容包括：非法入境情形中增加“冒用或持冒用身份申请之护照”行为；扩大了祖国大陆船舶的定义范围，将非属“中华民国”、外国、香港或澳门船舶，而由祖国大陆地区人民所有、承租、管理、营运或担任船长、驾驶之船舶，视同祖国大陆船舶；新增对于“有涂抹或隐蔽船名、无船名、拒绝停船受检者”，得“扣留其船舶、物品及留置其人员”。

二、制定“反渗透法”，制造不利于两岸正常交流的氛围

蔡英文将建立针对祖国大陆的所谓法律防卫机制作为任内目标，“反渗透法”是其重要一环。2019年11月底，民进党以“防范境外敌对势力之渗透干预”为名提出“反渗透法”，利用民进党的立法机构多数优势，仅1个月时间就于12月31日强势通过。“反渗透法”将原本分散在各个规定中的法条集中在一起，加重处罚，并增加部分新的防范两岸交流内容，企图破坏两岸融合发展，营造对立氛围，以助力民进党的选举。

一是“反渗透”直接针对祖国大陆。“反渗透法”全文仅12条，但开宗明义就表明“防范境外敌对势力之渗透干预”，并且将“境外敌对势力”限定为与台湾“交战或武力对峙之国家、政治实体或团体”，“主张采取非和平手段危害‘我国主权’之国家、政治实体或团体”，表明就是针对祖国大陆。“渗透来源”的内涵，不仅直接囊括所有祖国大陆党政军组织，而且以“所设立或实质控制之各类组织、机构、团体或其派遣之人”的规定，几乎涵盖与祖国大陆

官方有联系的所有学术机构、行业协会、基层组织等，对岛内民众参与两岸社会融合发展造成寒蝉效应的意图明显。

二是重点针对几种政治活动。“反渗透法”第3条到第7条针对所谓“受渗透来源之指示、委托或资助”从事选举、“公投”等政治活动进行处罚，意图恐吓、限制参与两岸交流的台湾民众参与正常政治活动的权利，主要内容包括：参照“政治献金法”第7条及“公民投票法”第20条等规定，禁止“受渗透来源之指示、委托或资助，捐赠政治献金，或捐赠经费供从事‘公民投票’案之相关活动”，意图恐吓、限制参与两岸交流的台湾民众参与正常的“公投”活动，并设置较“政治献金法”及“公民投票法”相关条文更高的处罚；把现行“总统副总统选举罢免法”第50条及“公职人员选举罢免法”第56条“政党及任何人不得邀请相关人士为其从事竞选活动”的内容予以扩充，意图恐吓、限制参与两岸交流的台湾民众参与正常的选举活动，不限于“邀请”这一情形；同时把所谓“渗透行为”作为违反“总统副总统选举罢免法”第43条、“公职人员选举罢免法”第45条各款行为的加重处罚情节，设置较“总统副总统选举罢免法”“公职人员选举罢免法”相关条文更高的处罚；把“游说法”第8条规定相关人士不得自行或委托其他游说者进行游说的规定挪至此处，意图恐吓、限制对祖国大陆友好的岛内力量进行正常的“立法”游说活动；同时就防务、外事及大陆事务等涉及“国家安全”或“国家机密”进行游说，视为加重处罚的情节，设置更高的处罚；把“刑法”第二篇分则第七章“妨害秩序罪”其中之第149条至第153条，以及“集会游行法”第31条的规定挪至“反渗透法”，将所谓“渗透行为”作为加重处罚的情节，设置较“刑法”与“集会游行法”更高的处罚，意图在各类激烈的政治冲突情形中，把与祖国大陆友好的岛内力量置于不利的地位；把“总统副总统选举罢免法”第五章及“公职人员选举罢免法”第五章及“公民投票法”第五章规范“妨害选举罢免”及“公民投票”等行为的规规定挪至“反渗透法”，将所谓

“渗透行为”作为加重处罚的情节，设置较“总统副总统选举罢免法”“公职人员选举罢免法”和“公民投票法”更高的处罚。

三是扩大打击面。“反渗透法”还针对法人、团体、机构等组织从事所谓“渗透行为”规定相应处罚，将“转指示、委托或资助”等行为视同“渗透行为”，规定了所谓“减刑”情节及“检举”义务等，内容包括：把法人、团体或其他机构纳入所谓“反渗透”范畴，不仅对法人、团体或其他机构从事相关行为的负责人进行处罚，还对法人、团体或其他机构处以罚金，意图扩大对所谓“渗透行为”的打击面；把所谓“接受指示、委托或资助而再转指示、委托或资助之中间人”纳入“反渗透”范畴，意图将广大参与两岸交流融合发展的民众、团体变成“嫌疑人”，恐吓、限制其他台湾民众、团体与直接参与两岸交流的民众、团体进行正常往来的活动空间；设置所谓“减刑”情节，利用民众惧法心理，鼓励台湾民众告发参与两岸交流活动的民众、团体，意图形成干扰两岸正常往来的社会风气，让普通民众、团体产生惰于参与两岸交流的心理；赋予各级“政府”机关举发的义务，营造“反渗透”整体社会氛围。

三、修订“国家情报工作法”，加大对两岸往来的情报侦搜力度

2019年12月13日，民进党以立法机构多数优势强势通过修订“国家情报工作法”。蔡英文2020年选举连任胜出后，“国家情报工作法”1月15日正式公布施行。“国家情报工作法”共修订全文33条中的11条，在美台情报合作升级背景下，意图强化台湾情报工作的保障力度，加大对相关情报犯罪的惩罚，构成蔡英文当局所谓“法律防护网”重要一环。

一是强化情报工作保障。“国家情报工作法”加大了台湾情报工作保障力度，扩张了情报工作内容范围，包括：增加了对情报工作“相关人员”的保障，强化对情报工作相关人员的掩护、安全、教育训练等管理措施，提升对情报工作相关人员薪水给付、补偿及奖励等的法制保障，意图拓展情报工作体系，

增强情报工作弹性空间；将蔡英文当局新设不久的“国防部参谋本部资通电军指挥部”纳入情报机构范畴，为“国防部参谋本部”直属单位，于2017年7月1日正式成立，主要任务为电子作战、资讯作战、网络作战及军线（军用电话线）维护管理，意图将网络空间作为情报工作重点；将“为外国势力或境外敌对势力以刺探、收集、窃取、泄漏、交付或其他不正当方法取得之营业秘密信息”列为情报搜集、研析、处理及运用对象，意图以情报工作之名，重点强化对半导体等方面台湾科技企业的全方位管制。

二是加大情报犯罪惩罚力度。“国家情报工作法”延续民进党当局构建所谓“法律防卫体系”一贯做法，加大了针对情报工作犯罪处罚力度，尤其是涉密人员泄密管控，主要内容包括：对泄露或交付“涉及情报来源、管道或组织及有关情报人员与情报协助人员身份、行动或通讯安全管制之信息”，将刑期由“一年以上七年以下”增为“三年以上十年以下”，罚款上限由五十万元增为二百万元；对于泄露或交付给外国势力、境外敌对势力或其工作人员者刑期由“七年以上”调整为“无期徒刑或十年以上有期徒刑”；泄密获利的罚款上限由一百万调增为一千万；排除针对有关“间谍行为”追诉权时效上限，使普通民众参与正常两岸交流永远都会面临被“查水表”的风险。

四、修订“国安”相关刑事条款，增加刑事处罚力度

（一）修订“刑法”，把祖国大陆纳入“外患罪”范畴

2019年5月7日，通过修订“刑法”第113条，明确“应经‘政府’授权之事项，未获授权，私与外国政府或其派遣之人为约定，处5年以下有期徒刑、拘役或科或并科50万元以下罚金；足以生损害于‘中华民国’者，处无期徒刑或7年以上有期徒刑”。修订第115条之1，将“外患罪”一章所涉及罪行适用于地域或对象为祖国大陆地区、香港、澳门、境外敌对势力或其派遣之人，行为人违反各条规定者，依各该条规定处断之。需要指出的是，看似只修订一

条，但“外患罪”一章包括103条到115条，涉及“通谋开战端罪”“通谋丧失领域罪”“直接抗敌‘民国’罪”“单纯助敌罪”“加重助敌罪”“战时不履行军需契约罪”“泄漏交付国防秘密罪”“公务员过失泄漏交付国防秘密罪”“刺探搜集国防秘密罪”“不法侵入或留滞军用处所罪”“私与外国订约罪”“违背对外事务委任罪”“毁匿国权证据罪”等，均属于“刑法”分则第二章所定“外患罪”具体罪名。所以，看似只增订了第115条之1，其实是对103条到115条全部进行了修订。

（二）修订“国家机密保护法”，严惩对祖国大陆泄密

2016年年底到2017年年底，针对涉密人员的“立法”限制，先后有民进党民意代表姚文智、吕孙绫、刘世芳、罗致政、陈明文等领衔提案修订“国家机密保护法”版本，以及“时代力量”立法机构党团提案版本。2017年9月，行政部门提出民进党当局“官方”版本。2019年5月7日，三读通过“国家机密保护法”第26条、第32条至34条修订，加大对泄密的惩罚力度，尤其防范对祖国大陆及港澳地区及人员的泄密。重点内容包括：泄漏或交付“国家机密”于外国、大陆地区、香港、澳门、境外敌对势力或其派遣之人者，处三年以上十年以下有期徒刑；泄漏或交付依第六条规定报请核定“国家机密”之事项于外国、大陆地区、香港、澳门、境外敌对势力或其派遣之人者，处一年以上七年以下有期徒刑；为外国、大陆地区、香港、澳门、境外敌对势力或其派遣之人刺探或收集经依本法核定之“国家机密”或依第六条规定报请核定“国家机密”之事项者，处一年以上七年以下有期徒刑；所刺探或收集以及所泄漏或交付属绝对机密者，加重其刑至二分之一。

（三）修订“国家安全法”，对违反所谓“法律防卫机制”行为设置重罚

2017年4月开始，民进党民意代表林俊宪、陈其迈、王定宇、刘世芳、叶宜津等先后领衔提出管控退役将领“登陆”的“国家安全法”“修法”版本。2019年6月17日，立法机构三读通过“国家安全法”，

台湾民进党推动“港独”与“台独”合流

■ 陈本铨 李小燕

3月11日，十三届全国人大四次会议表决通过《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关于完善香港特别行政区选举制度的决定》，体现了中央政府全面贯彻落实“爱国者治港”原则，有力保障“一国两制”实践行稳致远。但台湾民进党当局不仅对全国人大涉港决定妄加评论，恶意攻击，还妄言台湾朝野政党应摒弃“九二共识”“一国两制”主张，“政府”将持续给予香港人民必要与充分的“人道”支持。这再次暴露其打着“民

主”“自由”的旗号欺骗舆论，暴露其政治操弄香港事务，“乱港谋‘独’的险恶用心与邪恶本质”。

民进党推动“港独”与“台独”合流，一是意在“火中取栗”，持续煽动“反中”情绪。2019年7月，香港爆发“修例风波”，民进党当局对香港事务不断指手画脚，炒作歪曲香港形势，企图煽动台湾民众“仇中反中”情绪。民进党在2020年台湾地区领导人和民意代表选举中再度获得大胜，内在因素是民进党由现任台湾地

区领导人竞选连任，顺利完成内部整合。但蔡英文利用香港局势，火中取栗，巩固绿营基本盘，拉拢不少年轻选民，助推民调支持度，是其获得连任的关键因素之一。

当前蔡英文和民进党的民意支持度持续新低，根据岛内“绿”媒《美丽岛电子报》6月民调显示，47.6%受访者满意蔡英文整体执政表现，比上月减少1.3个百分点；49.1%受访者不满意，比上月增加1.8个百分点。不满意度

修订第2条之1、第5条之1，增订第2条之2、第5条之2，内容包括：新增禁止行为即为外国、大陆地区、香港、澳门、境外敌对势力或其派遣之人“发起、资助、主持、操纵、指挥或发展组织”；新增网络数字空间为“国家安全”维护领域；对于为祖国大陆地区“发起、资助、主持、操纵、指挥或发展组织，泄露、交付或传递关于公务上应秘密之文书、图画、影像、消息、物品或电磁纪录，以及刺探或收集关于公务上应秘密之文书、图画、影像、消息、物品或电磁纪录”的行为，设置较其他地区实施相应行为更重的处罚，可处七年以上有期徒刑，得并科新台币5000万元以上1亿元以下罚金；重点针对军公教及公营机关（构）人员，于现职（役）或退休（职、伍）后犯“内乱、外患罪，经判刑确定”以及犯“陆海空军刑法违反效忠国家职责罪章、国家机密保护法第32条至第34条、国家情报工作法第30条至第31

条之罪，经判处有期徒刑以上之刑确定”的行为，明确将丧失其请领退休（职、伍）给与之权利，并追缴其已支领部分。

综上，蔡英文当局通过拼凑法条和加重处罚、扩大打击面的“修法”方式，大搞所谓各类“防泄密”“反渗透”的“严刑峻法”，强化情治部门权限，企图营造人人惧怕被“抹红”而回避两岸正常交流的社会氛围，对冲祖国大陆为推动两岸关系和平发展而坚定不移推行的两岸融合发展战略，其实是把台湾引向封闭和孤立的危险境地，戕害台湾民众生活发展空间以及正常参与政治活动权利，是为了一己私心、一党私利实质破坏“两岸关系和平发展”的“台海现状”。这种逆时代潮流而拼凑的“恶法”，必将因违逆两岸人民根本利益而被淹没、废除。蔡英文当局也终究会因为违背民众利益而遭到“恶法”反噬。✎

超过满意度，呈现“死亡交叉”。6月23日，台湾民意基金会民调显示，蔡英文的声望仅有43%，创2020年5月以来新低；民进党支持度22.6%，为5年来新低。民进党一党独大、专断独裁，腐败无能，岛内民众对此怨声载道。据岛内媒体分析，比起2018年，民进党2022年县市长选举成绩恐难以实现突破，大概率维持原来席次。面对岛内民众不满情绪持续发酵和2022年县市长选举压力，不排除民进党当局会再度利用全国人大通过的《关于完善香港特别行政区选举制度的决定》，大打悲情牌，进一步炒作催票，对岛内“泛绿”选票产生“吸催效应”。

二是意在充当“马前卒”，培植“乱港反中”势力。2020年6月香港国家安全法正式出台后，“港独”分子慌如惊弓之鸟。乱港头目香港前政务司司长陈方安生退出政坛，“香港众志”成员黄之锋、罗冠聪之流宣布解散“港独”团体。正当“港独”分子陷入进退维谷之际，蔡英文当局反应强烈，一度声称抵制香港国家安全法，甚至扬言修改“港澳条例”和“考虑反制措施”。台湾大陆事务主管陈明通大言不惭表示，“这不但是香港和台湾，更是全世界都必须关注的法律，是‘天朝帝国’对世界子民发出的律令”。同时，台湾大陆事务主管部门更是直接威胁台湾民众要慎重前往中国大陆及港澳地区。

为反制香港国家安全法及其带来的影响，民进党当局成立了“香港人道援助关怀行动项目”“台港服务交流办公室”，并透过大陆事务主管部门跨部门协调，编列特别预算经费，加强所谓“人文关怀”，声称“以制度化作为提供香港人民必要的人道协助”。“港独”组织头目窜台期间，与民进党高层卓荣泰、罗文嘉、林飞帆等人就港台之间谋求独立的学运、社运和政党派别之间的串连进行沟通协商。蔡英文当局更是纵容其与民进党、“时代力量”等“台独”势力勾连，不断污蔑“一国两制”，企图强化对“港独”势力的掌控，为岛内“台独”势力充当“乱港反中”马前卒，培植“乱港反中”势力。

三是意在谋“独”，博取外国反华势力的信任。民进党当局一味“反中仇中”，民进党上台执政以来，单方面破坏两岸现状，拒不接受“九二共识”，不仅没有答一张“未完成的试卷”，而且将“试卷”撕毁。依据所谓“国安五法”和“反渗透法”，不断恐吓台湾民众，制造两岸民众对立。新冠肺炎疫情发生以来，民进党当局不仅未展现任何善意姿态，反而借机恶化两岸关系，伤害两岸同胞感情。2021年5月后，台湾疫情严重失控，民进党当局反诬祖国大陆利用疫情操作“统战”，谎称让台湾面临“政治疫情”与“病毒疫情”双重压力。台美关系是台湾对外工作的重中之重，民

进党当局对外主打“亲美”，想当然认为他们找到了谋“独”的“机遇”和“仇中”的靠山。比如，蔡英文以安全考虑与维护台美关系为由，不断增加军事预算，争取对美军购。8月5日，美国政府批准对台湾出售40台155毫米M109A6“帕拉丁中型自行榴弹炮系统”和相关设备，估价7.5亿美元，这是拜登政府的首次对台军售。在美台双方政治安全经济等利益驱使下，美国对台军售的数量、质量、频率有进一步扩大与升级态势。民进党等“台独”势力试图通过与“港独”势力合流，一心一意污蔑祸害搞乱斗臭香港，在国际社会刻意营造与美国利益紧密相互捆绑，以及美国绝对“盟友”的错觉，企图博取美国主子的美誉信任，其主要目的还是在于摆脱“台独”所谓“国际孤儿”的“外交困境”，提升台湾的“曝光度”以及“台独”的国际生存空间。

“港独”和“台独”势力相互勾结，进行颠覆、分裂国家的阴谋，其真实含义是缔结“抗中同盟”，旨在引狼入室、分裂国家，祸国殃民、祸乱港台，必将受到历史的审判。祖国大陆不可能坐视民进党当局干涉香港事务，对“反中乱港”活动推波助澜，特别是香港国家安全法出台后，有力震慑了“港独”“台独”分裂分子，让他们无所遁形。“港独”“台独”势力逆流而动，倒行逆施，终究是死路一条。🇨🇳

民进党新冠肺炎防疫政策中的政治逻辑

■ 能武

自台湾疫情爆发以来，民进党当局一直奉“以政治凌驾于科学”为全台湾防疫指导思想，从桃园机场破口，到疫苗分配乱象，再到对台产“高端”疫苗质疑，民进党的防疫政策已经认定“科学防疫”无足轻重，更在乎防疫过程中如何玩弄政治权术、如何趁此积攒选举经费。而近来在新北市发生的德尔塔病毒幼童群聚事件，更是让民进党防疫能力超群的谎言再次破功。2020年2月，台湾首例新冠肺炎确诊，此后一年多时间里，民进党当局的防疫已经成为了“Taiwan need help”。

当疫情科学防治沦为被政治凌驾后，往往执政当局会“觉今是而昨非”，“今天的陈时中打脸昨天的陈时中”频频发生。民进党如何圆谎？“甩锅”与“硬拗”成为民进党人辩护的必备技能。当新冠肺炎疫情防控已经遭到包括年轻人在内大部分族群质疑时，民进党当局不但不纠正既有错误决策，还换着花样用权力影响政策，“讨好”他们自认为选民中的“自己人”。

甩锅：这怎么怨我们？都是他们的错！

新冠肺炎疫情全球持续蔓延，德尔塔毒株造成新一波疫情时，大规模接种新冠肺炎疫苗成为目前防疫的“不二”选择。当祖国大陆已经进行新冠肺炎疫苗大规模施打，反观台湾却陷入无疫苗可打的窘境。信誓旦旦地说可以输出台湾防疫经验的民进党人，这时候哑口无言了，沉默了。随着台湾疫情加剧，民众却无法施打任何疫苗，对民进党当局防疫政策产生不满。为缓解民怨，民进党相关人士只好私下透过管道争取少量他国民众并不看好的阿斯利康疫苗、莫德纳疫苗输台。却怎料，这些疫苗输台后引发更多不满的声音。一来，百姓不满疫苗施打顺位分配，在普罗大众无法接打输台疫苗之时，有

的个人、行政单位成员却顺利施打；二来，百姓强烈不满民进党当局无法提供口碑更好的德国 BioNTech 疫苗。

台湾疫情在“政治防疫”下日趋严重，百姓对疫苗、对心中信任的疫苗需求呼声更高。越来越多社会民间声音希望民进党当局能引进德国 BioNTech 疫苗，但无一例外遭到了民进党当局各种理由百般阻挠而无法入台。

其实，早在2020年3月，德国 BioNTech 公司和上海复星医药就签订协议，BioNTech 疫苗在大中华地区（中国大陆、香港、澳门、台湾）由上海复星医药代理，称为“复必泰”疫苗。换言之，根据国际贸易相关规则，代理商已经与生产商签订代理协议后，为保障代理公司权益，所签协议中代理地区的该产品销售都必须经由该代理公司。这意味着台湾若想引进 BioNTech 疫苗，只能通过上海复星医药公司。但是，民进党当局一方面想为与其有千丝万缕联系的台产“高端”新冠肺炎疫苗上市拖延时间，另一方面也不想让台湾民众认为民进党始终绕不开中国大陆。所以，民进党人惯性操作，将 BioNTech 疫苗无法入台的原因立即“甩锅”祖国大陆，借此引导台湾舆论认为是因祖国大陆的政治打压，BioNTech 疫苗才无法入台。

新冠肺炎疫情已经持续一年多，民进党当局从不自我反省，遇到防疫困境不仅惯性“甩锅”对岸，也喜欢把锅直接甩去台湾政坛其他阵营。台湾当局防疫部门制定了新冠肺炎疫苗不同人群接种顺序名单，规定了所谓合情合理的接种顺序。根据最新规定，其中的第二类“‘中央’及地方政府防疫人员”接种人群不断膨胀，具体分类已经高达七类，其中又不乏模棱两可的规定，因此引发台湾社会舆论对

“特权”疫苗的强烈质疑。面对质疑，民进党当局“甩锅”戏码再次上演。随即就有民进党人指出，县市政府提报的第二类造册人数前4名都是国民党执政县市，包括彰化、云林、南投和嘉义。根据民进党人所公布信息可以知道，第二类施打人群多达27万人，而蓝营4县市列入第二类的仅2万人，约占8%，而民进党人只提出第二类中的“维持防疫体系运作官员”项目名单，指控国民党占了7成。民进党选择性公布接种信息“甩锅”蓝营，就是意图掩饰民众抢种疫苗的根本原因就是极度缺乏疫苗。

硬拗：台产“高端”疫苗是可靠的！

“硬拗”在台湾社会文化中指：硬是将不能成立的事情说得头头是道，类似于硬掰的意思。

从最早传出消息，台湾本土“高端”疫苗公司准备生产台湾自产新冠肺炎疫苗，到通过临时许可开放给台湾百姓施打，“高端”疫苗的争议就一直不断。台湾“高端”疫苗公司老板陈灿坚在之前其经营地产期间的违建、违法占用河川、涉嫌欺骗俱乐部会费等极为不诚信的行为被记者纷纷起底。陈灿坚20年后摇身一变为生技新贵，做起新冠肺炎疫苗。

早前，“高端”疫苗公司在民进党当局诸位高官一唱一和的配合下，适时给市场透露出风声，股价应声飞涨，屡创新高。对民进党人趁机炒高股价赚取选举经费的质疑不胫而走，进而引发台湾社会舆论对民进党内新派系“生技帮”的热议。在诸多质疑声浪中，“高端”疫苗有三个主要争议：“没有通过国际认证”“没有进行三期临床试验”“仅通过紧急授权”。尤其是“高端”疫苗并未进行三期临床试验，民进党当局就紧急通过授权，一来根本无法确认疫苗实际的保护力，二来也无法确认到底有哪些副作用、不良反应。已经有很多案例表明，药物二期试验效果不错，但是到第三期试验效果却很不好。


即便如此，民进党上下同心，用最大力气去“硬拗”“高端”疫苗的可靠性。甚至蔡英文、赖清德等民进党人士纷纷背书，在接种“高端”疫苗时大肆做秀，希望借此提高台湾百姓施打“高端”疫苗的意愿。但是，事实往往比民进党当局想象得更无情。

在台湾民间热心人士推动下，民进党当局敌不过台湾社会民意的反弹，最终同意了有中文“复必泰”标识的 BioNTech 疫苗输台。当台湾陆续收到印有“复必泰”标签的 BioNTech 疫苗时，台湾当局疫苗施打预约系统中对 BioNTech 疫苗的预约暴增，说明民进党当局对“高端”疫苗的硬拗是无效的。

讨好：花别人的钞票讨好“首投族”

由台湾慈善组织慈济与台湾民间企业采购的首批 BioNTech 疫苗抵台后，台湾防疫部门称，为因应开学之需，故开放18到22岁大学生施打。稍早前，台湾防疫部门负责人陈时中仍对大学生施打 BioNTech 疫苗态度强硬，甚至一度排除大学生施打进口新冠肺炎疫苗。民进党当局的突然转弯，让一度无进口疫苗可打的大学生可以顺利施打他们认为好的 BioNTech 疫苗。显而易见，就是讨好年轻人的政治操作。民进党支持者中不乏年轻人，民进党当局开放年轻人施打 BioNTech 疫苗后，再配合民进党铺天盖地的网络文宣，必定会获得年轻人的支持。早前的强硬态度已经得罪了很多大学生，现在开放施打 BioNTech 疫苗，年轻人也仅觉得是应该的，民进党不会获得加分。

从相关数据统计看，台湾18到22岁年轻人有100多万。按台湾现行法律规定，20岁获得投票权。也就是说，这批可以施打 BioNTech 疫苗的年轻人可以在2022年或者2024年选举中投票，是所谓“首投族”。而“首投族”通常会因为参与政治社会化时间较短而缺少全局思考能力，首次投票倾向会影响以后政治认同，所以，民进党疫苗施打政策突然转向，正是基于“讨好”首投族的政治思考。

民进党当局一年多来的防疫政策可谓荒腔走板，完全不顾及民众生命安全，还大肆敛财，使政治逻辑充斥整个防疫政策的制定与执行过程。民进党当局自始至终将“政治凌驾科学”奉为圭臬，从“甩锅”到“硬拗”再到讨好特定族群，无不是用政治逻辑防疫。民进党人常以“关关难过关关过”心态执政，恐怕接下来是“莫言下岭便无难，赚得行人空喜欢”。

“台独”势力再度炒作“奥运正名公投” 原因及影响分析

■ 程光

在刚刚闭幕的东京奥运会上，中华台北体育代表团创下佳绩，给岛内正陷入疫苗荒的民众带来鼓舞和安慰。殊不知，3年前“独”派热炒的“东京奥运台湾正名公投”差点让中华台北队参加奥运的梦想破灭。当他们在场上绽放光芒时，“正名”运动的幽灵却再度被政客召唤而来，煽动台湾民众在“中华台北”与“台湾”间选边，也让选手再次面临失去奥运舞台的危险。

一、“独”派再度炒作“奥运正名公投”原因

“独”派以“正名”谋“独”之心不死。新世纪以来，岛内“独”派提出形形色色的“正名”主张，其目的在于以“公投”“正名”的形式搞分裂活动。2016年民进党执政后，对“独”派借“正名”名义的分裂活动推波助澜。2016年里约奥运会后，“时代力量”“台湾北社”“台湾教授协会”等“独”派党团因不满台湾运动员以“中华台北”名义参赛并升中华奥委会旗帜，提出了“‘台湾’进军2020东京奥运会”的所谓“正名主张”，并征选“台湾奥运旗”。在日本右翼势力支持下，2018年2月，“李登辉民主协会”“台湾联合国协进会”“台独建国联盟”“台湾国家联盟”，以及民进党、“时代力量”、“基进党”等“台独”势力的“东京奥运正名公投”正式登场。“独”派希望借推动“东京奥运台湾正名公投”，将会籍由“中华台北”改名为“台湾”。当时国际奥委会曾三度函告台湾“不会核准”，并告知若有任何施压干预，将“撤回会籍”。蔡英文当局原不想阻挠“东京奥运台湾正名公投”，但从美国得知事不可为后便不再出面支持，“东京奥运台湾正名公投”遂以失败告终。但“独”派借“正名”谋“独”之心不死。东京奥运会开幕前，绿营网军攻击台湾艺人瑞

莎为中华台北队奥运选手助威所作的“中华队加油”大头贴，逼她改用“台湾加油”。绿营民意代表声称，“Chinese Taipei”是殖民地用法，会被国际认为是中国台北，等于“污蔑选手”。绿营民意代表还质疑岛内媒体，为何自称“中华台北”，要求直呼“台湾队”。

蔡英文当局近年频频在国际场合打“正名”擦边球。蔡英文当局上台后，除了在岛内挑起“正名”“改名”议题，在国际场合也频频行销“台湾”。如蔡英文在国外窜访期间，在当地明目张胆地签名“President of Taiwan”（“台湾总统”）。去年疫情爆发时，台湾当局借对外援助防疫物资为由，打出“Taiwan Can Help”口号，在国际上刷存在感。蔡英文当局意图在国际上行销台湾以达到“去中华民国化”和“去中国化”的目的。

境外反华势力推波助澜。随着中国的发展，以美国为代表的西方国家对华采取了围堵打压的政策，境外反华势力利用“台独”“港独”“三股势力”分裂中国的力道不断加强。去年5月，“美国在台协会”（AIT）处长酆英杰到桃园棒球场考察“中华职棒”防疫工作，看似无心实则有意地向桃园市市长郑文灿建议“中华职棒”改名为“台湾职棒”。在东京奥运会上，也出现了一些不和谐的声音。如在开幕式中，组委会刻意安排“中华台北”队在“夕(ta)”字母开头队列进场，而非中国及“中华台北”开头的字母“ち(chi)”。此举立刻激起“独”派的亢奋，重新要求朝野表态支持“正名”。蔡英文发文称“感谢日本将一切化为可能”，台湾行政部门、立法机构齐称代表团为“台湾队”，绿媒也集体内宣称“国际替台湾正名”。无独有偶，美国全国广播公司转播过程中在中国队出场时展示了一幅不包括台湾的中国地

图。奥运期间，美国联邦众议员贝肯 (Don Bacon) 建议，台湾应该使用自己的“国旗”和“国歌”参与国际赛事，在日美国人也联署希望“让台湾成为台湾”。美国、日本的做法让岛内“独”派见猎心喜，认为“正名”时机已到，便决定继续筹划“2024巴黎奥运正名公投”。

“独”派评估“2024巴黎奥运正名公投”有望获得通过。岛内“独”派认为，2018年11月“九合一”选举中，在受“韩(国瑜)流”冲击，民进党和“独”派嚣张气焰受到严重压制情况下，“东京奥运正名公投”虽然没有过关，但反对票比赞成票多不了多少。更重要的是，在几个遭到否决的“公投案”中，“东京奥运台湾正名公投”的反对票率是最低的。因此，“独”派认为，在近两年民进党和蔡英文不断炒作“芒果干”，在岛内成功营造“恐中反中抗中”的政治氛围后，“2024巴黎奥运正名公投”获得通过的机率将会大大提高。

二、“独”派再度炒作“奥运正名”的影响

造成两岸网络言语冲突。东京奥运会，台湾当局和绿媒大量宣传“台湾”选手在奥运会上的表现，利用奥运赛事大力宣传政治。奥运期间，从蔡英文到民进党政治人物借奥运议题凝聚支持者，特别是迎合年轻人，同时借奥运比赛打“正名牌”“反中牌”。在奥运会男子射箭团体赛中，祖国大陆男子团体射箭队1比5不敌中华台北男子团体射箭队；羽毛球男双决赛，祖国大陆选手输给台北选手，绿营对此欣喜若狂，不断炒作“拿下中国队就是爽”，把政治上的“反中”风向带到体育竞技场上，引起祖国大陆网民强烈不满，造成两岸网络言语冲突。

挑战祖国大陆对台政策底线。台湾当局立法机构负责人游锡堃声称，“台湾正名”一直是民进党的“政治理想”及“长远目标”。除了奥运“正名”外，台湾地区也要在许多领域推动“正名”，包括旅游证件、驻外代表处“正名”等。这意味着“台湾正名”是长远目标，奥运“正名”只是起步。尤其适逢台湾立法机构已组成“修宪委员会”，激进“台独”势力又倡议台湾“正名运动”，妄图通过所谓“民间力量”

达到推动实质性“台独”的目的。在全面下修的“公投法”之下，假如真的通过了所谓“公投”，无异于公开挑战祖国大陆对台政策底线。

在国际上造成恶劣影响。近年来，在民进党当局四处活动下，一些国家的“一中”政策有松动迹象，台湾当局借机推动其驻外机构“正名”。不久前，立陶宛政府不顾中国反复交涉、晓以利害，宣布允许台湾当局以“台湾”名义设立“代表处”。立陶宛政府这一公然违背两国建交公报精神、严重损害中国主权和领土完整的举动，不仅在国际上造成恶劣影响，还有可能让民进党当局和“台独”势力更不遗余力地推动台湾驻外机构“正名”，企图在国际上制造“一中一台”的既成事实。

再度升高岛内“反中抗中”声浪。新世纪以来，“台独”分子在岛内外制造事端，推动形形色色的所谓“正名”活动，公然挑战“一个中国”底线，却把锅甩给中国大陆，一再声称中国大陆“打压台湾”，不断塑造一轮又一轮被“打压”的悲情气氛。“台独”分子甚至将运动场变成了“台独”闹场。2017年台北举办世界大学生运动会期间，“台独”势力可谓铺天盖地，将体育盛会变成政治角斗场。这几年，台湾的“反中抗中”氛围更是日益强烈，这一点由台湾民众对祖国大陆印象变差的程度即可见其端倪。根据《远见》杂志去年9月民调，2018年至2020年，台湾民众对祖国大陆印象差的比例，从28.4%、44.2%上升到66.5%。推动“2024巴黎奥运正名公投”，势必再一次升高岛内“反中”声浪，让两岸关系雪上加霜。

民进党“火中取栗”成大赢家。其实对于“2024巴黎奥运台湾正名”，民进党内意见也不一致，如立法机构党团召集人罗致政声称，“正名公投不是主要议题”。但民进党采取了“正名”与“不正名”主张的双向操作，形成民进党“分进合击”的舆论效应，企图把支持与不支持“正名”的民意全部囊括在自己的票仓中。因此，“奥运正名”不论最后成功与否，被愚弄的还是继续支持民进党“台湾牌”的台湾民众。🇺🇸

当前台湾问题“国际化”情势日益严峻的原因、危害

■ 陈文杰

近期，台湾问题受到国际社会越来越多关注，一些外部势力不断加大操弄和介入台湾问题的力度。台湾问题“国际化”情势日益严峻，已经严重干扰中国大陆对台工作的开展，危害两岸关系和平发展与祖国和平统一进程。中国大陆应积极对此情势加大研判力度，并及时作出应对。

一、当前台湾问题“国际化”情势日益严峻

民进党当局不断利用疫情疫苗问题在国际社会刷“存在感”。自从新冠肺炎疫情爆发以来，民进党当局先是以“口罩外交”不断在国际社会蹿动，接着又自诩“防疫优等生”在国际社会四处呐喊“TAIWAN CAN HELP”。岛内本土疫情失控后，又频频操弄和炒作“国际社会捐赠台湾疫苗”，不断利用疫情疫苗问题在国际社会刷取“存在感”。

民进党当局与美国、日本加紧互动炒作台湾问题。近年来，民进党当局不断加大与美国、日本的勾连程度，在各领域多个议题与美国、日本紧密配合。美国和日本则积极在各种国际场合和重要声明中提及并炒作台湾问题。

台湾问题在美国、日本不断推波助澜之下愈加频繁受到国际社会关注。

民进党当局接连在一些国家设立“代表处”。蔡英文当局第二任期以来，先后在索马里兰、法国、关岛等国家和地区顺利设立了“代表处”，日前又再次宣布将在欧洲国家立陶宛新设立“驻立陶宛台湾代表处”。民进党当局积极以这种方式，推动台湾问题的“国际化”情势。

越来越多国家议会、政客以及外媒、智库等介入台湾问题。去年以来，包括欧洲议会通过挺台提案、捷克参议长访问台湾公开把台湾称作是一个国家、印度媒体刊文庆祝台湾所谓“国庆日”、立陶宛外交部副部长扬言支持台湾不用害怕，等等。越来越多国际议会、政客以及外国报刊、智库等团体机构不断介入台湾问题，让台湾问题持续成为国际社会关注焦点。

二、当前台湾问题“国际化”情势日益严峻的原因

美国、日本持续介入台湾问题负面效应扩散。美国、日本持续介入台湾问题，是当前台湾问

题“国际化”情势日益严峻的重要原因。近来，美国、日本系列涉台劣行包括“美日联合声明提及台湾问题”“G7峰会联合公报点名台湾”“台美日联合举办首届国会论坛”等，一方面直接促使台湾问题“国际化”，另一方面美国、日本这些系列涉台劣行的负面效应正持续扩散。在美国、日本系列涉台劣行带动下，国际社会一些势力蠢蠢欲动，意欲效仿，加剧了台湾问题“国际化”。

民进党当局不断加大在国际社会的“外交运作”。当前台湾问题“国际化”情势与民进党当局长期以来在国际社会进行“外交运作”有着密切关系。为推进台湾问题“国际化”，民进党当局目前正持续透过收买国际投机政客、亲台媒体和智库等机构团体，不断对国际社会进行政治渗透，同时积极布局“口罩外交”“疫苗外交”，借由疫情疫苗问题强推台湾问题“国际化”。

民进党当局不断恶意炒作和碰瓷国际热点。恶意炒作和碰瓷国际热点是民进党当局推进台湾问题“国际化”情势惯用手法。包括“每年上演的参与世界卫生

大会闹剧”“政治操弄东京奥运议题”“以疫情疫苗问题骗取国际关注”，等等，都是民进党当局以恶意炒作和碰瓷国际热点，谋求台湾问题“国际化”的体现。

一些国际政治势力捞取自身利益的需要。当前，一些国际政治势力在台湾问题“国际化”情势中看到了捞取自身利益的巨大机遇，台湾问题愈加“国际化”，这些国际政治势力就愈能利用台湾问题捞取更多的自身利益。因此，在台湾问题的“国际化”发展情势中，这些国际政治势力不仅乐于配合美国、日本推进台湾问题“国际化”，还持续为台湾问题的“国际化”提供便利和支持。

三、台湾问题“国际化”情势日益严峻的危害

干扰中国大陆对台工作的开展。当前台湾问题日益“国际化”的情势，将使台湾问题更加复杂化，给中国大陆开展对台工作带来更多新的挑战 and 难题。尤其是在开展对台工作中将面临更加恶劣的国际环境和更多层面的国际压力，直接影响和干扰中国大陆对台工作的开展。

台湾对外实质关系随台湾问题“国际化”而扩大。台湾问题“国际化”情势发展，往往伴随着民进党当局与外部势力勾连程度不断加深过程。在这一勾连过程中，民进党当局以各种借口，采取各种“打擦边球”方式，与国际社会开展越来越多实质性“外交互动”，从而不断打开所谓

“国际活动空间”，扩大台湾“对外实质关系”。

台湾问题国际敏感性遭到弱化。台湾问题的“国际化”，让台湾问题一再成为国际社会聚焦点，台湾问题在国际社会的政治敏感性因此遭到严重弱化，并导致越来越多外部势力加入操弄台湾问题的阵营。在美国、日本带动下，随着国际社会加大对台湾问题的关注、讨论和干涉，将不可避免地冲击国际社会的“一中共识”。

岛内“台独”民意基础进一步扩大，“台独”势力气焰更加嚣张。台湾问题“国际化”情势给了民进党当局对内开展“大内宣”的绝佳机会，在民进党当局政治操弄台湾问题“国际化”情势下，岛内“台独”民意基础将进一步扩大。而岛内“台独”势力在“国际社会力挺台湾”的政治错觉煽动下，其“台独”气焰也将更加嚣张。

台湾问题沦为外部势力侵蚀中国利益的重要支点。美国近年来不断将台湾作为遏制中国大陆的重要棋子，通过利用台湾问题反复测试中国大陆的底线，以增加美国在各方面与中国大陆谈判的筹码。今年以来，日本在台湾问题上的态度上也产生了明显变化，加速向美国靠拢，积极介入台湾问题。而其他一些国家则从美国、日本恶劣的涉台行径中看到了挑衅中国的机会和切入口，包括加拿大、捷克、印度、立陶宛、英国、澳大利亚等国家也表

现出对台湾问题的极大兴趣，蠢蠢欲动。台湾问题“国际化”情势的发展将为这些外部势力以台湾问题制约中国提供更大便利和空间，导致台湾问题进一步沦为外部势力用以侵蚀中国大陆利益的重要支点。

两岸关系将愈加对立和危险。台湾问题“国际化”情势的发展，往往伴随着两岸关系对立对抗。随着国际社会频频发送错误信号，“台独”势力的气焰必然更加嚣张，其未来极有可能进一步在岛内外做出更加危险和更具挑衅性的“台独”举动，进而导致两岸关系走入愈加对立和危险的境地。

祖国大陆必须对台湾问题“国际化”有所准备。一是提前做好应对“台独”动作进一步升级的准备。台湾问题“国际化”情势的发展大大提升了岛内外“台独”势力升级“台独”动作的可能，应及时根据最新情势，组织力量研判下一步岛内外“台独”势力可能开展的“台独”动作、“台独”方向和“台独”形式。提前做好充分准备，牢牢把控台海局势的主动权、主导权，尽力确保台海和平稳定。二是着手打击岛内“台独”势力嚣张气焰。岛内“台独”势力的嚣张气焰将持续引发两岸关系的不稳定因素，应密切关注岛内“台独”势力举动，尽早着手采取应对措施，包括发布岛内“台独”势力“惩治清单”、研究推进所谓“邦交国”与

武夷岩茶与台湾乌龙茶的渊源

■ 杨瑞荣

武夷岩茶生长在风景秀丽、挺拔奇伟的闽北武夷山，这里海拔大都在几百米，有的达两千多米，山中云雾缭绕，日照很短，属丹霞地质地貌，土系沙质，给奇茗生长创造了得天独厚的自然环境。岩茶加工非常精致，要经采、晒、捻、焙、剔等繁多工序，这些工序要掌握得恰到好处，不允许有丝毫马虎。

武夷岩茶历史悠久，据记载，早在唐朝元和年间，就有采制武夷岩茶之说，至今已有一千多年历史。古代许多方士游臣、文人墨客都把品尝武夷岩茶作为一件赏心乐事，不少文人还吟诗作赋。明朝万历年间，荷兰人就运输武夷岩茶经爪哇转销欧洲各地。不久，美国人也到福州、厦门采购武夷岩茶。此后，武夷岩茶便在美国、北非等国际市场上销售。


自古以来武夷岩茶就作为佳品，深受朝野的珍重。元朝皇家宫廷对它十分赏识，列为御茶，并在武夷九曲满溪畔的四曲建造御茶园，设了“焙局”。民间对武夷岩茶更是视若珍宝，至今在武夷山茶区

流传下许多名茶、名丛的摩崖石刻，如：大红袍、半天腰等。据史料记载，武夷岩茶的品种多达360多种，福建闽南、广东等地及港澳台同胞，都把品尝武夷岩茶作为一种雅兴和享受，不少老华侨谈起武夷岩茶更是津津乐道。

饮品武夷岩茶是很讲究茶具的，泡茶用的茶壶一般都小如香椽、茶杯如胡桃，壶小泡出茶汤来，既浓又少，把杯上口，不忍一饮而尽，只好细细品尝，芳醇扑鼻，舌有余甘，这样才能品尝出武夷岩茶的韵味。武夷岩茶品种甚多，经茶师开导和反复品尝才能略辨不同味道，初入口时，虽觉苦涩，但亦有清浊之分，深淡之别。奇种茶苦涩，较清淡、柔和，随之而来的甘甜也较清淡；水仙茶却浓烈，而后亦不觉苦烈爽口；肉桂茶则介乎两者之间，似乎有一种恰到好处的感觉。武夷山的茶农说，奇种茶略带草香，水仙茶香味馥郁，肉桂茶则清芬缠绵。不过奇种的草香，不是仲夏原那种浓郁的草香，而是暮秋草籽清香，香中隐杂着一股淡淡的艾蒿香味。

台湾“断交”、督促国际社会重申“一中原则”等措施警告岛内“台独”势力，打击其日益嚣张的“台独”气焰。三是明确并提高外部势力介入台湾问题的代价。长期以来，外部势力介入台湾问题将付出何种代价并不十分清楚，导致一些外部势力对插手台湾问题“跃跃欲试”。因此，应及时明确和提高外部势力介入台湾问题将立即付出的直接代价，并适时

以“反制清单”方式在外交场合正式宣示，明确向国际社会传达介入台湾问题将遭受的严重后果。四是遏止民进党当局“外交运作”的不断扩大。近年来，民进党当局为推进台湾问题“国际化”，持续通过“投书国际报刊媒体，鼓吹‘台独’言论”“强化与他国国会关系，建立台湾连线”“收买外国政客，上演涉台闹剧”“游说国际智库，为台湾发声”等方式

不断扩大“外交运作”。对此，应有针对性地在国际社会开展反制工作，通过加强与有关国家和国际组织的沟通联系，强化对各国政府和议会的影响力，加大与国际主流智库、媒体的接触和交流，强化在台湾问题上的沟通，提升国际社会对台湾问题的警惕性和敏感性，从根本上压缩和遏制民进党当局开展“外交运作”的“国际活动空间”。

水仙浓烈馥郁的香味果，总感到透出一股茉莉扑鼻的芬芳。相比之下，肉桂则显得清幽极了，这清芬的香味让人难以捉摸，有时觉得清淡、淡若兰花样的幽香；有时觉得浓郁，浓似一掬盛开的玉兰。肉桂之上的“大红袍”，更是身价百倍。宋代著名文学家范仲淹用：“长安酒价减千万，成都药市无光辉”推崇大红袍的身份。他品尝了大红袍后，“两袖清风起，我欲上蓬莱”，简直飘飘欲仙。由于大红袍不同凡品，为数甚少，在国际市场上一两大红袍的价格比十斤普通武夷岩茶还要高，享有极高声誉。

美味芳香的武夷岩茶，曾陶醉过每位走访武夷的游人。1985年，日本女作家左能典代首次到武夷山观光，发觉武夷山山美、水美、武夷岩茶味更美，回国后经过两年多酝酿筹备，于1988年1月15日在日本东京都创办了日中文化交流沙龙——岩茶房。顾名思义，透过灵草之岩茶，致力于学习日中文化，加深两国人民的互相信赖和理解。身为小说家的左能典代自从与武夷岩茶结下不解之缘后，写作之余还一门心思钻研岩茶。为了让日本人品尝到新鲜的岩茶，她曾不辞劳苦，多次远涉重洋，到武夷山采购武夷岩茶，一箱箱运回日本。她刻苦学习有关武夷岩茶的知识，成了日本的中国茶通。1989年开始，她连续三次组织带领日本茶道旅游团，专程造访武夷茶观并交流两国茶文化，在武夷山品岩茶、论茶道，交流中日两国人民之间早就存在的“茶道”。

福建的茶叶生产历史悠久，而武夷山又是福建茶的故乡，早在清朝嘉庆年间，随着祖国大陆汉族同胞向台湾移民的增多，种茶技术、制作技术也从福建传到了台湾。在台北县文山种植后，又随移民向南发展而逐渐扩大，分布至桃园、新竹、苗栗、南投一带。最盛的1960年，台湾茶叶栽培面积达4.8432万公顷，全省茶农约2.7万余户，亩产约65公斤，70%-80%外销，其乌龙茶最著名的“冻顶乌龙茶”被视为茗中极品。

据台湾《联合报》1984年9月17日报道，台湾前副领导人谢东闵6月16日在探望新任“台湾省主席”邱创焕时，曾畅谈台湾的茶叶史。谢东闵说：

“台湾闻名的冻顶乌龙茶及文山包种茶，都是从大陆跨海移植台湾的。一部台湾的茶叶史，也就是台湾与大陆血肉相连的见证。”谢东闵又说：“当时读书人、秀才在台北应试，举人则赴福建福州应考。有人自福州考试回来，便顺手带回名闻天下的武夷茶，这是台湾茶叶的根，也是民族的根。”

冻顶山在台湾南投县鹿谷乡东面，为凤凰山脉，蜿蜒数十公里，目前所称的“冻顶乌龙茶”产地，包括属于鹿谷乡的彰雅村、永隆村、凤凰村、广兴村等。

冻顶山虽名冻顶而四季如春，年平均温度20摄氏度，常年多雾，日照较短，土质为红土，最宜茶树生长，其天然环境与福建武夷山可相媲美。

冻顶茶是120年前从福建武夷山移植过去的。据记载，清咸丰乙卯年（公元1855年），鹿谷乡有一位林凤池先生，自幼聪慧，勤学不倦，由当地父老资助，到福建参加乡试，中了举人。当他衣锦还乡时，福建林氏宗亲设宴庆贺，并邀请他到武夷山游览。林凤池看到武夷山碧水丹山，风景秀丽，听闻武夷山“乌龙茶”驰名中外，便乘兴到武夷山开心永乐禅寺小憩，拜访方丈，说明自己是台湾鹿谷乡人，想购买武夷茶苗返乡赠与乡亲，以报故乡父老养育之恩。林凤池诚挚的话语感动了方丈，随之赠送武夷“青心乌龙茶种”茶苗36株，并嘱咐说：“此为夷陵乌龙茶佳种，望悉心照顾，如能分栽广植，则子孙享用不尽。”回乡之后，林凤池将携回的茶苗24株分送给竹林村等地种植，但未获成功。另12株送给冻顶山林三显种植成功，其后逐渐繁殖成园。因其品种优良，加之精心栽培，附近农民均向林三显移苗广植，成为今日冻顶名茶产区。

后来，林凤池奉旨晋京，将加工好的乌龙茶献给道光皇帝，皇帝一尝，感到十分清香可口，连声称赞“好茶、好茶”，并问这茶是哪来的。林凤池奏明来自祖家福建武夷山，移植在台湾冻顶山上。道光皇帝说：“好吧，这茶就叫冻顶茶。”从此，台湾乌龙茶也叫冻顶茶。这一民间传说至今仍在台湾广为流传。❀

2021年8—9月 海峡两岸大事记

8月

3日,福建省交通运输厅联合福建省发改委印发《福建省交通强国先行区建设实施方案》

提出到2025年,初步形成“三纵六横两联”综合立体交通网主骨架和福建“211”交通圈,同时深化闽台交通融合发展。

4日,美国国防部安全合作局宣布批准向台湾出售价值约7.5亿美元武器计划。外交部发言人回答记者相关提问时说,中方敦促美方重信守诺,切实恪守一个中国原则和中美三个联合公报规定,停止售台武器和美台军事联系,立即撤销有关对台军售计划,以免进一步损害中美关系和台海和平稳定。中方将根据形势发展坚决采取正当、必要反制措施

5日,国台办发言应询指出,我们坚决反对美国向中国台湾地区出售武器。我们敦促美方切实恪守一个中国原则和中美三个联合公报特别是“八·一七”公报规定,停止一切对台售武,不要向“台独”分裂势力发出错误信号,不要危害台海和平稳定,不要损害两岸同胞福祉。民进党当局企图“倚美谋独”“以武拒统”,只会把台湾民众推向灾难

6日,国防部新闻发言人就美国国务院批准售台武器回答记者提问。发言人说,中国人民解放军有决心、意志和能力,坚决挫败任何形式的外部势力干涉和“台独”分裂图谋,将采取一切必要措施,坚定捍卫国家主权和领土完整

7日,24名台湾青年参加了为期一周的“在陆台湾青年重庆行”活动

深入走访了解重庆的红色文化、抗战文化、都市文化、乡村振兴文化及重庆经济社会发展成果,寻找就业、创业空间与机遇。

9日,台湾当局财政事务主管部门数据显示,受电子零部件出货畅旺影响,台湾7月对大陆(含香港)出口155.8亿美元,同比增长23.8%,占台湾总出口的41%。大陆持续位列台湾地区最大出口市场

10日,外交部发言人就中方决定召回驻立陶宛大使发表谈话时指出,我们敦促立方立即纠正错误决定,采取切实措施,消除恶劣影响,不要在错误的道路上越走越远。我们也正告台湾当局,“台独”是死路一条,图谋在国际上搞分裂活动绝对不会得逞

10日,台湾当局行政管理机构“主计总处”数据显示,6月台湾工业及服务业受雇员工人数为802.4万人,较上月下降9.3万人,出现历年同期最大减幅

11日,外交部发言人就中方召回驻立陶宛大使答记者问。一个中国原则的含义不容歪曲。对于嘴上说坚持一个中国原则,实际上却公然同台湾当局搞官方往来,甚至为“台独”势力站台的行径,中国人民绝不答应

12日,外交部发言人就美国国会参议院通过涉台参与世界卫生组织议案答记者问。我们敦促美国国会充分认清台湾问题的高度敏感性,恪守一个中国原则和中美三个联合公报规定,遵守国际法和国际关系基本准则,不助台拓展所谓“国际空间”,不要向“台独”势力发出任何错误信号

12日,中国驻美国大使秦刚会见美国常务副国务卿舍曼。秦刚强调,台湾问题是中美关系中最重要、最敏感的问题,他向舍曼明确阐述了中方立场

16日,台湾当局货币政策主管机关公布,截至

7月底,台湾地区人民币存款余额(含可转让定期存单)2420.05亿元,较6月增长7.68亿元,为3月以来新高

17日,外交部发言人就中美“八·一七”公报发表39周年答记者问时表示,中方敦促美方认清美售台武器问题的高度敏感性和严重危害性,采取实际行动遵守一个中国原则和中美三个联合公报规定,停止美台官方往来,停止美台军事联系和售台武器,反对“台独”及其分裂活动,以免给中美关系和台海和平稳定造成进一步损害

19日,21时55分许,著名导演、台湾两岸电影交流委员会主任委员李行先生因心肺衰竭病逝于台北,享年91岁

30日,祖国大陆赠台大熊猫“团团”“圆圆”迎来17岁生日

31日,台湾当局行政管理机构“主计总处”公布最新人口及住宅普查结果显示,2020年台湾地区常住人口2383.4万人,近10年平均年增长率降至0.3%,人口增长持续趋缓,正快速进入老龄化社会

9月

1日,根据国务院联防联控机制部署,上海市启动12岁至17岁在沪港澳台同胞新冠疫苗登记预约接种

1日,上海复星医药集团供应台湾地区第一批93.2万剂mRNA新冠疫苗复必泰在卢森堡机场启运,2日早运达台北

1日,中国驻欧盟使团表示,强烈反对欧洲议会外交委员会通过的“欧盟-台湾政治关系与合作”报告,报告严重违背一个中国原则

2日,针对欧洲议会外委会通过所谓“欧盟-台湾政治关系与合作”报告,全国人大外事委员会发表声明指出,报告内容远远超出欧盟对台开展非官方交流合作的范畴,严重违反一个中国原则,损害中欧互信与

合作。中国全国人大对此表示坚决反对

2日,针对欧洲议会外委会通过所谓“欧盟-台湾政治关系与合作”报告,全国政协外事委员会发表声明指出,希望欧方从中欧关系大局出发,切实恪守一个中国原则,慎重、妥善处理涉台问题,多做有利于增进中欧互信与合作的事,确保中欧关系沿着正确轨道健康稳定向前发展

3日,纪念辛亥革命110周年两岸书画交流展亮相北京台湾会馆

3日,中国人民抗日战争胜利76周年纪念日。湖北省人民政府台湾事务办公室主办、台湾辜金良文化基金会董事长蓝博洲策划的“反殖民与台湾光复——日据时期台湾历史图文展”,在湖北省图书馆开幕,全方位展现台湾同胞在被日本殖民统治50年间的爱国主义光荣历史

3日,以“志愿服务中的青年担当”为主题的苏台青年“云”分享活动在江苏无锡举行

4日,第十二届两岸电影展台北场开幕
《东北虎》《侍神令》等多部祖国大陆影片参展。

7日,外交部发言人在例行记者会上就洪都拉斯有关动向回答记者提问时表示,世界上只有一个中国,台湾是中国领土不可分割的一部分。一个中国原则是公认的国际关系准则和国际社会普遍共识,坚持一个中国原则是人心所向、大势所趋。中方欢迎一切认同支持一个中国原则的言行

9日,外交部发言人在例行记者会上说,在台湾问题上,日方应谨言慎行,立即停止干涉中国内政,不得以任何形式损害中国主权,不得以任何形式向“台独”势力发出错误信号

10日,主题为“两岸工业互联网平台创新发展”的2021两岸工业互联网融合发展研讨会在福建福州举行

11日,继福州、厦门巡展后,第十二届海峡两岸少儿美术大展在北京台湾会馆举行

展出两岸暨港澳、海外地区200余幅少儿美术作品。

13日,全国台湾同胞投资企业联谊会主办的“新格局下的两岸经贸合作与台湾经济发展研讨会”在北京举行

15日,国台办发言人应询表示,截至9月13日,大陆接种新冠病毒疫苗超过21.52亿剂次。截至8月31日,有15.6万余名在大陆台胞接种疫苗,累计接种逾29万剂次。一些地方根据当地疫苗接种统一安排,已开始为12至17岁的在大陆台湾学生接种疫苗

15日,为促进两岸民众交流,共同传承中华文化,以“中秋月圆 双城情谊”为主题的2021年襄阳与苗栗云端交流活动以视频连线方式在湖北襄阳和台湾苗栗同时举行

16日,2021海峡两岸(昆山)中秋灯会在“中国第一水乡”周庄和昆山开发区慧聚广场同步点亮,两岸民众观灯赏月,遥寄相思,共叙深情

16日,2021昆山市台资重大项目签约开工活动举行,36个台资重大项目签约开工,总投资额516亿元

17日,国台办发言人应询表示,斯洛文尼亚应切实履行其与中方建交时就台湾问题所作严肃承诺,恪守一个中国原则,谨慎处理涉台问题。民进党当局妄图倚仗外部势力谋“独”难逃失败下场

17日,国台办发言人应询表示,把中国台湾地区纳入美英澳所谓“印太战略”,严重干涉中国内政,严重违背一个中国原则和国际关系基本准则,给台海和平稳定带来损害

17日,台盟中央主办的2021年中秋台胞联谊活动,通过视频连线方式在两岸多地同时举行,数百名嘉宾相约云端,情牵彼此,畅叙乡情,共迎中秋佳节

18日,欧洲议会近日通过“新欧中战略报告”,包含消极涉台内容,民进党当局表示感谢。国台办发言人应询指出,世界上只有一个中国,台湾是中国的一部分。台湾问题纯属中国内政,不容任何外来干涉。敦促欧洲议会及有关委员会在涉台问题上谨言慎行

17日,第三届“七彩云南·相约台湾”文化交流主题日活动暨“两岸一家亲·七彩云相思”中秋茶话会联谊活动在云南昆明和台湾台北同步举行

两地会场200余名同胞以视频连线方式欢聚一堂,共叙两岸情谊,喜迎中秋佳节。

18日,第八届两岸文化发展论坛在福建福州开幕论坛采取线上方式,围绕“两岸文化交流合作的赓续与创新”主题展开,并设立“两岸文学研究”“两岸教育与艺术”“两岸历史与文化”三个分论坛。

22日,国台办发言人应询表示,大陆暂停台湾地区番荔枝和莲雾输入,是为了保护农业生产和生态安全、保护民众的切身利益,是科学合理、完全正当的。海关总署已通过《海峡两岸农产品检验检疫合作协议》联系渠道向台方进行了相应通报

22日,“文澜重光”——《文澜阁四库全书》(影印本)云赠送仪式在杭州、台北两地连线举办

22—26日,第五届“台湾青年看武汉——魅力江城随手拍”主题活动在湖北武汉举行

近30名在祖国大陆学习、工作和生活的台湾青年深入武汉三镇,领略这座英雄城市疫后新面貌,感受这座青春活力之城的魅力。

23日,针对台湾当局宣布申请加入《全面与进步跨太平洋伙伴关系协定》,外交部发言人在例行记者会上回答提问时表示,坚决反对台湾地区加入任何官方性质的协议和组织

23日,国台办发言人应询表示,中国台湾地区参与区域经济合作,必须以一个中国原则为前提。我们反对民进党当局以经贸为由拓展所谓“国际空间”、进

行谋“独”活动。希望有关国家妥善处理涉台问题,不为“台独”行径提供任何便利和平台

23日,香港各界纪念辛亥革命110周年大会在香港会议展览中心举行

中共中央台办、国务院台办主任刘结一以视频方式致辞。

23日,“2021海峡两岸新媒体产业发展研讨会”在上海和台北通过同步视频连线方式举行

24日,以“山水相亲 共兴两湖”为主题的第十三届“西湖·日月潭”两湖论坛以视频连线方式在浙江杭州与台湾南投同步举行

论坛围绕乡村环境治理、迈向优质专业幼儿教育、贸易数字化跨境新蓝海等两地民众关心的议题,开展交流研讨,分享智慧经验,探寻融合发展途径。

24日,第八届台湾青年岭南行活动在广东广州孙中山大元帅府纪念馆启动

25日,中国国民党举行党主席选举,候选人朱立伦获得85164票,得票率45.78%,当选党主席

26日,中共中央总书记习近平致电朱立伦,祝贺其当选中国国民党主席

电文指出,过去一个时期两党在坚持“九二共识”、反对“台独”共同政治基础上良性互动,推动两岸关系和平发展,造福两岸同胞,成效有目共睹。期望两党登高望远,坚持共同政治基础,坚守民族大义勠力合作,为同胞谋福祉,为台海谋和平,为国家谋统一,为民族谋复兴。

同日,新当选的中国国民党主席朱立伦复电,对习近平总书记表示感谢。

26日,全国台联成立40周年纪念大会暨第五届台胞社团论坛开幕式在北京举行

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全国政协主席汪洋出席并讲话。

26日,以“探两岸融合发展新路·享新发展格局

机遇”为主题的第四届两岸融合发展(重庆)论坛在重庆举办

海峡两岸31名学者通过线上线下方式围绕“探索海峡两岸融合发展新路”“台商台胞融入大陆新发展格局路径”“深化渝台融合发展路径与措施”等3个场次主题发表主旨演讲。

27日,第五届台胞社团论坛主论坛在北京举办

祖国大陆、台湾、香港、澳门和海外300余名台胞参加论坛,围绕“推动融合发展,造福两岸同胞”“促进民间交流,实现心灵契合”“引领两岸青年,扛起时代责任”等议题进行交流。

27日,第十三届“重庆·台湾周”在重庆开幕

27日,全国台联主办的“我与台湾民情研究40年”座谈会在北京举办

27日,台湾沈春池文教基金会参与承办的2021“月亮城杯”扬州·台湾文创设计大赛启动

29日,国台办举行例行新闻发布会。发言人在答问中表示,我们愿与中国国民党在坚持一个中国原则和“九二共识”、反对“台独”的共同政治基础上,保持良性互动,加强交流合作,就攸关台湾民众安全与利益福祉的议题进行沟通对话,共同推动两党关系和两岸关系向前发展,维护台海和平稳定,造福两岸同胞

29日,国台办发言人应询表示,世界上只有一个中国,台湾是中国不可分割的一部分,中国台湾地区参与区域经济合作,必须以一个中国原则为前提,我们反对台湾地区参与任何有官方性质的自贸安排或签署有官方性质的自贸协议

29日,国台办发言人应询指出,我们坚决反对美国国会推动、审议含有涉台内容的议案,台湾是中国的一部分,台湾问题是中国的内政,美国政府和美国国会无权干涉。民进党当局切勿误判形势,任何企图依靠外部势力谋“独”的行径终将失败。我们遏制“台独”,遏制台美勾连的决心绝不是嘴上说说的(吴亚明)

疫情背景下两岸关系的危机与转机

■ 台湾 刘奕伶

自2016年5月民进党蔡英文在台湾上台以来，两岸关系快速冷却，从过去国民党马英九执政时期的“前所未有的好”，转变为国际公认最危险的地区热点之一。然而，正当人们开始担心两岸随时会擦枪点火，引爆两岸热战之际，百年未有的惊人疫情爆发了。2020年年初开始的新冠肺炎疫情，快速在几个月内席卷全世界，改变了世界格局，也在两岸关系中注入新的变数。在两岸关系范畴，新冠疫情的作用力有负也有正。

一、疫情背景下两岸关系的危机

(一) 民进党坚持不承认“九二共识”，两岸关系持续冻结

2016年民进党重新执政后，除了重拾陈水扁时代的“去中国化”政策外，还从根本上否定了马英九时期两岸关系正面发展最重要的基础——“九二共识”。“九二共识”本身虽然是为了解决两岸事务性议题产生，但由于历史偶然性与现实局势发展，成为两岸所共同接受的最大公约数，也造就了2008年至2016年初被国外媒体赞誉的两岸关系最好时期。然而，当2016年5月20

日蔡英文就职演说，以“1992年两岸‘两会’会谈的历史事实与求同存异的共同认知，这是历史事实”，淡化“九二共识”中两岸共同承认同属“一个中国”政治基础的论述方式，直接在海峡两岸和平发展道路上投下了震撼弹。更甚者，其后蔡英文与执政团队要员多次公开指出始终未接受“九二共识”，导致两岸过去8年小心翼翼所积累的互信一夕崩解。虽然今年2月台湾新任大陆事务主管邱太三履新时指出，期待两岸交流恢复，两岸未来能春暖花开，但随后国台办发言人回以“九二共识”就是两岸春暖花开的“东风雨露”。然而邱太三对于是否接受“九二共识”态度犹豫，且民进党当局仍持续批评“九二共识”，所以两岸关系至今仍寒风刺骨，直接沟通的渠道——海协会、海基会更是没有沟通。

(二) 民进党防疫政策对祖国大陆的“不友善”激怒祖国大陆民众

2020年1月，当祖国大陆因疫情快速蔓延而苦于防疫物资不足时，海峡另一边的台湾，身为同胞本应伸出援手，却下令暂

停出口医疗外科口罩和N95口罩，宣称是为了确保台湾地区民众都能够有口罩可用。虽然是禁止全面出口，并未指明地区，但明眼人都清楚，这个严格的禁令针对的就是正苦于没有口罩可用，且疫情蔓延的祖国大陆。台湾当局直接寒了祖国大陆民众的心。特别是当各国纷纷对中国大陆施以援手，如日本、韩国、俄罗斯、巴基斯坦、英国、法国、欧盟等均赶在2020年1月底2月初以各种物资支援中国大陆抗疫时，台湾当局的冷眼旁观经过媒体报导后，引起祖国大陆民意沸腾，一时之间对于台湾的好感直落。

(三) 民进党为转移防疫不力焦点，强调大陆军事威胁，两岸关系雪上加霜

根据台湾有关网站统计，截至9月11日，岛内确诊数共计16074例，累计死亡839人，死亡率5.22%，死亡率远高于世界平均数的2.3%。不仅如此，5月11日起，台湾从所谓防疫“优等生”直接跌落至防疫“问题生”。以彭博社为例，该机构去年起制作“全球防疫韧性排名”(Covid Resilience Ranking)，每月底更新排名结果，台湾由4月底时在53个

主要经济体中排名第5名，5月由于疫情爆发退至第15名，6月排名惨跌至第44名，7月排名上升到40名，8月排名再次下滑至41名，一直处在后段班位置。无独有偶，根据7月英国《经济学人》(The Economist) 针对疫情提出“正常状态指数”(normalcy index)，以群众行为因疫情所产生的变化为参考依据，通过8项指标(运输与旅游、休闲娱乐、零售及工作等)进行排名。结果台湾总体正常指数43.7，在全球50大经济体中排第49名，倒数第2，仅高于马来西亚。上述数据再次印证台湾民进党当局的防疫不力。而各项台湾内部民调数据也显示，在防疫不力的事实下，无论是蔡英文或是防疫指挥中心指挥官陈时中的民意支持度均大幅滑落。其中，曾经被捧为防疫之神的陈时中，台湾民众对他处理疫情的满意度更是从最高91%，跌至49%(根据TVBS民调)。

民进党向来擅长操弄台湾民意，有鉴于当前民意支持率低迷，因此再次发挥其擅长的渲染情绪能力，开始强调祖国大陆军事威胁，增强台湾民众对于祖国大陆的恐惧与不信赖感，以转移民众对于防疫不力而累积的民怨。

台湾外事部门负责人吴钊燮就曾在6月23日接受美国有线电视新闻网(CNN)专访时，以唯恐天下不乱的态度表示，“中国不断发展军力，对台湾‘军事恐吓’持续升级，台湾必须做好跟中国

军事冲突的准备”。吴钊燮此举除了挑衅祖国大陆与误导国际社会，企图让美国等西方国家“保护”台湾外，更多的恐怕就是因为目前防疫不力，岛内疫情一发不可收拾，为转移焦点采取的狡诈操作。而祖国大陆对于解放军飞机不断进入台湾所谓“西南防空识别区”(ADIZ)一事做过正面解释。国台办发言人指出，此举是针对民进党当局与“台独”分裂势力加紧勾连外部势力，不断进行谋“独”挑衅所采取的有力回击，是为捍卫国家主权和领土完整、维护台海和平稳定、维护中华民族整体和根本利益、维护两岸同胞共同利益的正当之举。总之，吴钊燮此前的发言乃倒果为因、颠倒是非。不幸的是，岛内民众对于祖国大陆是否进行武统的议题，反应极为敏感且易受煽动。因此就在民进党当局不断叫嚣“台海战争”的刻意操作下，台湾民众很容易被激起所谓“亡国感”，加深对祖国大陆的负面情绪，并且在民进党引导下，将此情绪凝聚为支持主张“台独”民进党的政治力量，最终成功地让蔡英文当局转移防疫不力焦点。

二、疫情背景下两岸关系的转机

(一) 台湾防疫不力，祖国大陆防疫给力，台湾民意发生变化

回顾2020年年初至2021年5月上旬岛内疫情爆发后各项民意调查，民进党当局因为防疫

政策失误、疫苗严重短缺等问题，导致民调大幅下滑。以台湾民意基金会公布数据为例，5月民进党支持度降至23.2%，环比暴跌10个百分点，而6月公布的数字22.6%则再次下跌0.6个百分点，创下民进党5年来最低声望纪录。然而，这并不代表最大在野党国民党支持率增加。国民党5月支持度21.2%仅增加1.2个百分点，而中性选民则大幅上升至37.9%；到了6月，理应可以趁势追打民进党防疫不力的国民党支持率竟然反而下降2.8个百分点，以柯文哲为首的民众党则上升7.1个百分点，获得15.6%这个创党以来最高支持度。不过，随着台湾疫情趋缓，以及各国疫苗陆续抵台，民进党支持率略有回升，8月支持率27.8%。但相对于过去民进党长期支持率仍处于相对低位。值得注意的是，8月岛内民众对即将进行党主席选举的国民党支持度，并没有因为候选人强调两岸政策而有所改善，支持度仍维持在二成(20.2%)，而中性选民再次上升至36.0%。

若将视野扩展至台湾民众对两岸三个主要政党的好感度，则出现一个值得关注的现象，台湾民众在对台湾两大政党好感度下滑的同时，对中国共产党的好感度增幅明显。台湾民意基金会6月中民调显示，岛内民众对中国共产党的好感度增加4个百分点，反感度降低16个百分点。《美丽岛电子报》同期民调亦显示，岛内民


众对中国共产党好感度增加，较上月提升3.8个百分点，反感度则降低6.7个百分点。上述民调均显示台湾民众对祖国大陆的观感有微幅提高现象。当然，这暂时还无法推断为台湾民众已对祖国大陆观感发生彻底翻转，毕竟从国民党执政到民进党执政，“反共”意识依旧深植许多台湾民众内心，且好感与恶感度数字仍悬殊，因此，较可能的推论是因为台湾两大政党在疫情处理上都令人失望，包含台湾入境检疫的疏漏、当局对防疫的懈怠、检测与疫苗的紧缺、地方防疫失能等众多问题。而隔着台湾海峡的对岸，祖国大陆同胞却已经享受到几乎是无限量供应并经世界卫生组织认证的国产新冠疫苗，以及在极为严格防疫政策把关下，差不多完全恢复疫情前的正常生活。两相比较，岛内民众自然会出现情绪性反应，开始羡慕起祖国大陆民众，开始涌出或许“共产党比蓝绿两党强”的念头。而这样的情绪已经慢慢在岛内蔓延，特别是在互联网的影响下，许多岛内民众看到自己在祖国大陆发展的亲友已经接种完整的疫苗剂数，基本上可以在祖国大陆正常出行、甚至是外出旅游时，羡慕之意油然而起。这一开始或许只是一时倾羡情绪，但伴随时间的推移，“滴水穿石”效应下，不排除会慢慢扭转岛内民众对中国共产党的态度，最终发生观感上的翻转。

（二）疫情加速网络通讯软硬件优化，“视讯”跃升为两岸交流主要渠道

新冠病毒肆虐全球，带给全世界较大影响，除了各地疫情管控造成交通上的倒退，以及全世界经济发展逆流等负面影响外，最正面的影响大约首推加速网络教学、视讯会议等通讯科技的进步。在2020年疫情爆发之前，正式会议鲜少使用视讯方式进行，而主流授课模式也是以线下交流为主，线上授课与会议虽然被人们所接受，但是并未被列为主要形式。然而，一场出乎世人认知的大型流行病的爆发，促使人类对于使用互联网进行“上课”“开会”等沟通模式，有了全新认知与定义。目前大到国家领袖间的会谈，各种国际会议，小到一般公司开会、老师日常授课等，线上会议已经成为非常普遍的沟通形式。在世界普遍接受线上会议的环境背景下，两岸关系也因此受益。

疫情爆发初期，两岸因为出入境管制往来严重受阻，所有两岸线下交流活动几乎全部停办，两岸商务人士、老师、学生等均滞留原地，无法进行正常工作与学习。但由于疫情比预期来得严重且持续时间长，最终两岸与世界其他地区一样，开始向网络科技倾斜，在最短时间内将资源注入线上会议软硬件，并且大力提倡进行这种非接触的教学、会议交流模式。以高

校为例，“停课不停课”是疫情期间两岸教育界强调的重点；学术单位则将线上+线下会议列为常态模式；至于两岸各机构团体所组织的各种交流活动，则纷纷改成线上+线下会议，让各界习惯于使用视讯软件开会，进行意见交流。经过超过一年半时间的运行，两岸各界均已日益习惯虚拟接触的交流模式。这样的新型态，使得政治领袖们更有机会进行“面谈”，为未来两岸高层次交流增添了新的可能性。而过去常被诟病的两岸民间交流参会人员来源单一且重复率高的问题，也因活动信息开始走上网络而拓宽了报名参会者来源，使得更多没有到访过对岸或是没有参与过两岸活动的民众，能够有机会先以虚拟方式见面与互动，有助于扩大两岸民间交流，对两岸关系和平发展具有正面作用。

一场突如其来的全球流行病灾难，改变了人类既有的社会秩序与生活形态。对于两岸而言，则是为2016年起快速降温的关系，带来了新的希望。虽然民进党当局的各种政策直接或间接伤害了两岸所积累的互信与好感，但疫情也如照妖镜般，让两岸防疫与施政能力见真章。希冀能借由疫情期间两岸的各项新变化，迫使民进党当局调整两岸政策，承认“九二共识”，让两岸关系迎接春风雨露，再见春暖花开！

从反“独”促统历史中汲取智慧和力量(下)

——反“独”促统运动50年历程简述

■ 权伟东

三、台湾政局变化与全球反“独”促统运动的蓬勃发展

进入世纪之交，台湾政局发生重大变化。1999年7月，李登辉接受“德国之声”采访时，妄称将两岸关系定位为“国家与国家，至少是特殊的国与国关系”，即“两国论”，引发海峡两岸和国际社会震惊。2000年3月，民进党籍候选人陈水扁在台湾地区领导人选举中获胜，台湾政局首次出现政党轮替，“台独”势力开始在台湾地区执政。陈水扁上台后，顽固坚持“台独”立场，拒不接受一个中国原则，否认“九二共识”，以“一边一国”定位两岸关系，企图利用宪政谋求“法理台独”。岛内日益猖狂的“台独”分裂活动将两岸关系推向危险境地，“台独”一跃成为阻碍两岸关系和平发展和祖国统一的首要危险，反对“台独”分裂成为维护台海和平稳定的当务之急。海内外同胞同仇敌忾，纷纷自发开展各种形式的斗争活动，将“反‘台独’、促统一”的声音传播到世界各地，中国统一运动由此进入反“独”促统运动新阶段。

反“独”促统运动新阶段开始的标志是2000年4月在深圳召开的“反‘台独’、促统一”研讨会。会议由中国和平统一促进会等海内外爱国团体共同举办，来自祖国大陆、香港、澳门、台湾和海外200多名代表参加，具有广泛代表性。会议发表《反“台独”、保和平、促统一共同声明》，呼吁两岸同胞团结起来，共同反对和制止“台独”势力分裂祖国的图谋，争取两岸和平发展前景，推进祖国和平统一进程。会议突出反“台独”主题，将反“台独”与促统一相提并论，首次完整提出了反“独”促统概念，形成了反“独”促统新共识，体现了海内外同胞的共同意志。

深圳会议后，反“独”促统成为海内外同胞捍卫祖国核心利益的共同心声和正义行动，反“独”促统运动在全球范围内风起云涌、蓬勃发展，出现了前所未有的活跃局面。2000年8月，“全球华侨华人推进中国和平统一大会”在德国柏林成功举办，实现了祖国大陆同胞、港澳同胞、台湾同胞和海外侨胞的广泛团结联合，反“独”促统运动在

全球范围掀起新的浪潮。自此，全球性反“独”促统大会每年举办，一批洲际性、区域性反“独”促统平台纷纷创立并持续举办大会、年会，成为海内外同胞沟通交流、凝聚共识的重要平台。统促会以其旗帜鲜明的特点，迅速发展成为反“独”促统的主要组织形式。新的统促会组织在世界各地喷薄涌现，联合性统促会联盟纷纷建立，成为凝聚各界爱国力量、共同开展反“独”促统活动的主要阵地。据统计，世界各地的统促会组织，2000年之前只有10余个，2000年当年增加到50余个，截至2008年已有160余个，遍布80多个国家和地区。

以统促会为代表的各类爱国团体广泛团结海内外同胞，通过举办会议、论坛，发表声明、文章，举办主题展览，集会抗议示威等方式，积极为促进祖国统一坚定发声，深入揭批陈水扁当局的“台独”分裂行径，大力宣传一个中国原则及“和平统一、一国两制”方针，积极争取国际社会对中国人民追求国家统一、反对民族分裂的理解和支持，在世界范围内形成了反“独”遏“独”

的强大舆论声势，有力打击和遏制了“台独”分裂活动，产生了广泛影响。陈水扁当局迫于压力，制定专门文件，要求海外亲台侨胞采取“不参与、不支持、不附和”立场，企图对抗反“独”促统运动发展，不过海内外同胞的人心所向和祖国统一的历史潮流岂容阻挡。

2008年5月，岛内政局出现重大积极变化，国民党东山再起，马英九担任台湾地区领导人，并主张在“九二共识”基础上推动两岸协商与交流。以胡锦涛为总书记的党中央总揽全局，作出开创两岸关系和平发展新局面的战略决策，推动两岸关系实现历史性转折，两岸关系迈入“大交流、大合作、大发展”阶段。特别是党的十八大后，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把对台工作摆在治国理政重要位置，继续推进两岸关系沿着和平发展道路稳步前行，实现两岸领导人历史性会晤，建立官方常态化联系机制，两岸经贸往来加速发展，两岸政治、经济、文化等各领域互动达到新高度。

顺应两岸关系和平发展新形势，以统促会为代表的海内外爱国团体深入学习领会党中央精神，及时将工作重心由以反“独”遏“独”为主调整为以促进两岸关系和平发展为主，反“独”促统运动实现持续深入发展。包括岛内统派组织在内的爱国团体深入践行“两岸一家亲”“两岸命

运共同体”理念，积极开展两岸民间各领域交流交往，推动两岸经济社会融合发展；共同弘扬中华文化，增进两岸同胞亲情，促进同胞心灵契合；传播一个中国声音，争取国际社会理解和支持，维护国际社会普遍认同一个中国格局。同时，对“台独”势力及其动向保持高度警惕，对各种分裂言论及其行径进行坚决斗争。

这一时期，反“独”促统运动的内容有了新的拓展。在2008年西藏拉萨“3·14”事件、2009年新疆乌鲁木齐“7·5”事件及2014年香港非法“占中”事件发生后，以统促会为代表的海内外爱国团体纷纷通过接受采访、撰写文章、发表声明、举办展览、召开座谈会研讨会等方式，揭露达赖集团、“东突”势力及西方支持下的香港反对派企图分裂国家的本质，向海内外同胞和国际社会宣传介绍西藏、新疆的历史与现状，介绍中央关于西藏、新疆的方针政策，介绍中央对香港的基本方针政策，为引导海内外同胞认清分裂势力真实面目、自觉抵制思想渗透发挥了积极作用。由此，反“台独”、促统一之外，反对“藏独”“东突”“港独”等其他分裂势力、维护祖国统一也成为反“独”促统重要工作内容，反“独”促统运动被赋予新的内涵。

2016年5月，台湾政局再度发生重大变化。民进党再次上台执政，蔡英文当局拒不放弃“台

独”立场，放任纵容“去中国化”“渐进台独”，阻挠限制两岸交流合作，打压迫害岛内爱国统一力量，蓄意煽动两岸敌意对抗，两岸关系风险挑战加大。面对复杂严峻的台海形势，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牢牢把握正确方向，以高度的战略自信和定力，坚定不移推动两岸关系和平发展和祖国统一。2019年1月2日，习近平总书记在《告台湾同胞书》发表40周年纪念会上的重要讲话，全面阐述新时代在民族复兴伟大征程中推进祖国和平统一的重大政策主张，为做好新时代反“独”促统工作提供了根本遵循和行动指南。

以统促会为代表的海内外爱国团体认真学习领会习近平总书记关于对台工作的重要论述，高举爱国主义旗帜，坚持反“独”与促统并重，努力推动两岸关系和平发展和祖国统一，反“独”促统运动始终保持活跃态势。海内外同胞反“独”促统活动形式更加多样，内容更加丰富。特别是在重要节点、重大事件上，集中联合开展反“独”斗争，形成同声共气、内外呼应、全球联动的舆论声势，给各种分裂势力以强大震慑，有力彰显了正义的声音和力量。反“独”促统理念不断深入人心，力量持续壮大，活力更加凸显，在海内外同胞中的凝聚力、感召力、影响力持续增强。

进入新世纪以来，反“独”

促统运动在全球范围内蓬勃发展、浪潮迭起，并在主旨、理念、组织、行动等方面不断走向成熟，呈现出全面发展的新格局。范围上看，统促会成为主要组织形式，目前已遍布世界110多个国家和地区，反“独”促统运动的组织力与广泛性大为增强。共同的理念和追求，让海内外同胞更加紧密地团结联合在一起。海内外同胞的广泛参与，让反“独”促统影响波及到世界各地。反“独”促统运动已成为具有全球意义的海内外同胞广泛参与的爱国运动。内容上看，反“独”促统运动的内涵在实践中不断丰富和发展，以爱国主义为核心，由“反‘台独’、促统一”发展为“反对一切分裂行径、促进和维护祖国统一”，体现了运动与时俱进的生命力，凝聚了海内外同胞完成祖国统一的愿望和实现民族复兴的梦想。趋势上看，反“独”促统运动整体保持上扬态势，但区域间不平衡性明显，海外是增量的主要贡献者，岛内爱国统一力量在台湾当局的打压下则逐步陷入困境，反“独”促统运动一定程度呈现出海外高涨、岛内低潮的局面。

四、反“独”促统运动发展历程的重要启示

述往思来，向史而新。回首走过的路，一个个清晰足迹照亮前行方向，深刻昭示着反“独”促统运动从何处来、到何处去。50载奋斗历程有力证明：

反“独”促统运动实质上是近代以来中国人民同帝国主义侵略势力分裂中国图谋斗争的继续，它应时而生、因势而动，始终紧扣时代脉搏和发展主流，是顺应历史大势、符合民心所向、事关民族根本利益的崇高、正义、光荣事业。反“独”促统运动50年的发展，就是一部海内外同胞自发团结在党的旗帜下，致力于祖国统一和民族复兴的奋斗史，就是一部海内外中华儿女共担民族大义、维护民族根本利益的爱国史。以史为鉴、以史为师，掌握基本规律、汲取宝贵经验、发扬优良传统，对我们在奋进新征程中推进工作高质量发展具有重要意义。

第一，党的基本理论、基本路线、基本方略是反“独”促统运动发展的根本指针，必须始终坚持正确发展方向。中国共产党的领导是历史和人民的选择，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最本质的特征，也是反“独”促统运动最鲜明的特质。中国统一运动的发起，就是从港澳同胞、台湾同胞和海外侨胞选择支持和拥护中国共产党开始的。保钓运动的挫折让人们深刻认识到，只有中国共产党才能肩负起实现祖国统一和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历史使命，因而思想意识觉醒，开始心向祖国大陆、心向中国共产党。从那时起，海内外同胞就自觉选择以党的旗帜为旗帜、党的方向为方向、党的主张为主张，并将其贯

穿于整个奋斗历程，反“独”促统运动从此有了正确方向、蓬勃生机和不竭动力。海内外同胞选择听党话、跟党走，根本在于党的基本理论、基本路线、基本方略是先进、科学、正确的思想理论武器，具有强大的真理力量。立足新的历史方位和发展阶段，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坚持把祖国统一问题放在中华民族伟大复兴战略全局中考量和谋划，作出一系列新论述新部署新要求，为做好新时代反“独”促统工作提供了根本遵循。新时代反“独”促统运动要持续深入健康发展，就必须坚定不移支持和拥护党的领导，坚持正确发展方向，坚决贯彻落实党的基本理论、基本路线、基本方略，坚决贯彻落实党中央关于反“独”促统工作的决策部署。

第二，促进祖国和平统一和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是反“独”促统运动的初心所在，必须坚持共同思想政治基础。爱国主义是深深融入中华民族血脉的精神基因，是维系海内外同胞团结统一的最深层、最持久动力，也是反“独”促统运动永恒的精神底色和价值内核。拥护祖国统一和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是爱国主义的核心内容，是海内外同胞的最大公约数，也是反“独”促统运动的出发点和落脚点。“和平统一、一国两制”是党中央解决台湾问题的一贯方针，是实现祖国统一的最佳方式，也是

海内外同胞广泛支持和认同的统一方式。《国民经济和社会发展规划第十四个五年规划和二〇三五年远景目标纲要》中指出：“坚持一个中国原则和‘九二共识’，以两岸同胞福祉为依归，推动两岸关系和平发展、融合发展，高度警惕和坚决遏制‘台独’分裂活动。”新时代反“独”促统运动要持续深入健康发展，就必须不断凝聚思想政治共识，学懂弄通做实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厚植爱国主义情怀，强化“根魂梦”联结，坚持和平统一方针，坚决反对“台独”等一切分裂势力，筑牢海内外同胞反“独”促统的共同思想政治基础。

第三，海内外同胞是反“独”促统运动的力量之源，必须坚持最广泛的团结联合。人民是历史的创造者，是真正的英雄。50多年前，在美国、日本对中国领土钓鱼岛私相授受、抛出联合国“双重代表权”案企图分裂中国的关键时刻，是来自台湾和港澳地区的爱国同胞义无反顾地站了出来，坚决维护祖国统一和国家主权领土完整，先后发起了保钓运动和中国统一运动。30多年前，在两岸打破隔绝状态、开放交流的重要时刻，是海峡两岸爱国同胞积极投身两岸民间交流和往来，共同推动两岸关系和平发展，推进了中国统一运动进程。20多年前，在“台独”政党上台执政、祖国统一遭受重大

威胁的危险时刻，是广大海内外爱国同胞自发行动起来，将“反‘台独’、促统一”的声音传播到世界各地，开创了全球反“独”促统运动新格局。海内外同胞共同创造了反“独”促统历史，始终是运动发展的参与者、实践者、推动者、贡献者。习近平总书记在庆祝中国共产党成立100周年紀念大会上的重要讲话深刻指出：“以史为鉴、开创未来，必须加强中华儿女大团结。”新时代反“独”促统运动要持续深入健康发展，就必须坚持大团结大联合，坚持一致性和多样性的统一，团结一切可以团结的力量、调动一切可以调动的积极因素，特别是团结调动广大台湾同胞的力量，努力形成海内外同胞心往一处想、劲往一处使的生动局面，不断壮大反“独”促统共同奋斗力量。

第四，组织起来、发挥作用是反“独”促统运动发展的基本途径，必须坚持加强和改进统促会组织建设。组织起来才有力量，有组织力才有战斗力，这是保证事业成功的一条基本经验。毛泽东同志1943年11月在党中央招待陕甘宁边区劳动英雄大会上，就以“组织起来”为题对此进行过深刻阐述。反“独”促统历史也清楚表明，运动发展进程与组织建设状况有直接关系，统促会组织是反“独”促统运动发展的坚实基础和可靠保障。在中国统一运动初期，只成立了少数

几个组织，所以反“独”促统在海内外同胞中影响很有限，运动发展就比较缓慢。进入反“独”促统运动阶段后，随着统促会组织的大量建立和组织建设的不断完善，反“独”促统在海内外同胞中的影响力大为提升，运动面貌焕然一新。目前，统促会组织已发展到200多个。随着中国特色社会主义进入新发展阶段，“高质量发展”已成为具有时代特征的新命题、新要求、新任务。新时代反“独”促统运动要持续深入健康发展，就必须坚持高质量发展要求，将组织的重点由量的增长转变为质的提升，贯彻新发展理念，以规范化、功能化、年轻化为方向，完善内部运行机制，秉持主旨突出特色，优化结构增强活力，公开合法开展活动，不断提升统促会组织的凝聚力、战斗力、感召力、影响力，奠定反“独”促统坚实组织基础。

不忘来时路，奋进新征程。反“独”促统是一项具有长期性、复杂性、艰巨性的历史使命和重大责任，必须对此有深刻认识和充足准备。当前，在“两个大局”下，反“独”促统运动迎来新的机遇和挑战。必须聚焦主旨，坚持历史思维、创新思维、底线思维，准确识变、科学应变、主动求变，认清历史大势、把握历史规律、掌握历史主动，努力在守正创新中开创反“独”促统工作崭新局面。✎

古尔邦节(又称宰牲节)是伊斯兰教主要节日之一,7月20日,在新冠病毒大流行下,世界各地穆斯林庆祝节日,部分亚洲地区穆斯林国家统促会组织也以不同方式与当地民众共同度过了古尔邦节。本期抗疫访谈录反映他们在当地的工作生活情况。

抗疫访谈录

■ 宋磊

受访人:



任道伟 吉尔吉斯斯坦中国和平统一促进会会长



陈伟 土耳其中国和平统一促进会会长



蔡春雷 孟加拉国中国和平统一促进会执行会长

一、正值伊斯兰教传统节日——古尔邦节,首先向您和贵会各位朋友致以节日的问候!疫情之下,您和各位朋友在住在国是如何庆祝节日的呢?

任道伟:感谢中国和平统一促进会对吉尔吉斯斯坦中国和平统一促进的关心和帮助,我们全体在吉统促会成员在各自的岗位上和吉尔吉斯斯坦民众一起度过了一个特别的古尔邦节,主要是在线上相互致电并祝福健康吉祥。

陈伟:古尔邦节是伊斯兰教三大节日之一,土耳其是一个世俗伊斯兰国家,自从土耳其政府宣布7月全面开放以后,古尔邦节比疫情前的节日更热闹。宰牲、走亲访友、土耳其国内度假人数比往年多出很多。在土的少数民族侨胞会在凌晨去清真寺做礼拜,之后走亲访友。汉族侨胞也会带上礼物去少数民族侨胞家中拜访,共同庆祝节日。今年,土耳其中国和平统一促进会还准备了两头牛,肉分给了土耳其当地贫困家庭。

蔡春雷:感谢中国和平统一

促进会对海外同胞的关心。目前孟加拉国正遭受新一波新冠疫情冲击,但是乐观的孟加拉人民为了迎接古尔邦节提前买羊买牛十分热闹,一些富有家庭会在7月21日分发牛羊肉等食物给贫穷家庭。在孟侨胞也准备了牛羊肉,在防疫抗疫的同时与当地民众共同庆祝古尔邦节。

二、新冠肺炎疫情已经在全球肆虐一年多,目前很多国家新冠疫情影响依然严峻,德尔塔变异毒株的出现也为疫情增添了新变数,您的住在国现在疫情总体情况如何?

任道伟:吉尔吉斯斯坦累计感染新冠肺炎13.67万例(截至7月26日),现阶段每天感染大约1000至1200人,死亡率约1.65%。

陈伟:土耳其感染人数一直居高不下。今年,民众广泛接种疫苗后逐渐有所缓和,但因邻近古尔邦节,防疫措施放松,现在每天超1万例感染病例,死亡率也有所上升,每天死亡人数60例左右。截至7月25日,累计感染560.1608万例。

蔡春雷:受德尔塔变异毒株



影响，目前孟加拉国疫情非常严峻，政府要求节日过后从7月23日到8月5日全国严格封闭。现在每天感染都在1万人以上，病亡200人左右；累计感染约110万人，病亡近2万，死亡率1.7%。

三、华侨华人在当地的工作生活状况如何？采取了哪些防疫措施？

任道伟：吉尔吉斯斯坦新冠肺炎抗疫形势仍旧比较严峻，已经先后经历了三波疫情，从开始的紧张恐惧到感染人数逐渐增多，到现在民众防疫懈怠，公共场所没有多少当地人戴口罩。侨胞一直坚持戴口罩、不握手、不拥抱、不扎堆聚会等防疫措施，严格遵守防疫规定。疫情改变了很多人的生活，华侨华人目前在当地生活比较困难，主要是物流和交通都不顺畅，人员流动受限，很多企业都处于停工状态。疫情期间，中国驻吉尔吉斯斯坦大使馆和涉侨部门一直多角度、多层

次支持在吉侨胞抗疫。希望大家在大家的关心支持下，华侨华人能尽快走出困境。

陈伟：土耳其华侨华人从4、5月开始复工复产，仍旧坚持出门戴口罩、勤洗手、与人见面尽可能保持1.5米距离。疫情期间，土耳其中国和平统一促进会一直积极配合中国驻土耳其大使馆，不定期给华侨华人发放防疫用品，如口罩、莲花清瘟胶囊、消毒湿纸巾等，让包括港澳台和少数民族侨胞在内的华侨华人感受到来自祖（籍）国的温暖。

蔡春雷：去年疫情开始在全球蔓延，侨胞的生命安全和身心健康受到威胁时，孟加拉国中国和平统一促进会配合孟加拉华侨华人联合会迅速成立了应急联络小组，及时发布安全防控通告，组织发放“心连心”健康包等防疫物资，为侨胞提供核酸检测、就医协助、疫苗接种等服务，积极解决防疫过程中遇到的实际问

题。最近受新冠疫情影响，很多孟加拉国华侨华人都已陆续回国，仍在孟加拉国的华侨华人有不少感染病例，也有个别人因感染病毒去世，但坚守的侨胞在中国驻孟加拉国大使馆和各社团关怀帮助下，严格遵守孟加拉国各项规定，积极防疫，有序开展生产生活。

四、当地少数民族侨胞多吗？疫情期间他们的状况如何？

任道伟：吉尔吉斯斯坦少数民族侨胞人数不算太多，主要有吉尔吉斯族、维吾尔族、哈萨克族、回族等，吉尔吉斯斯坦中国和平统一促进会有不少少数民族侨胞会员，疫情期间大家面对同样的形势、同样的困难，无论是汉族侨胞还是少数民族侨胞，大家团结一致，共渡难关。

陈伟：因为地缘关系，土耳其的维吾尔族和哈萨克族侨胞很多。土耳其中国和平统一促进会会员中有为数不少的维吾尔族、



哈萨克族、白族侨胞。因疫情原因，很多少数民族侨胞失去了工作，生活比较困难。土耳其中国和平统一促进会一直积极帮助他们寻找新工作，开启新生活，维护安定团结。

蔡春雷：孟加拉国少数民族侨胞很少，孟加拉国中国和平统一促进会平时和少数民族侨胞保持联系，组织活动时也会邀请少数民族侨胞参加。目前，一些来自国内的少数民族及穆斯林留学生基本回国了，因为这里的大学从去年3月底到现在一直都没有开学。

五、现在当地民众接种疫苗情况如何？华侨华人也开始顺利接种疫苗了吗？您接种疫苗了吗？

任道伟：当地民众接种疫苗从刚开始的观望到现阶段积极主动有了很大进步。中国是最早向吉尔吉斯斯坦提供抗疫援助的国家之一。7月23日，吉尔吉斯斯坦

总统扎帕罗夫接种了中国新冠疫苗。“春苗行动”在吉尔吉斯斯坦启动后，华侨华人基本于5月20日左右全部打了第二针。我本人5月18日打了第二针，感觉非常好。感谢祖国对海外华侨华人的关怀和爱护。祖国万岁，伟大的中国共产党万岁！

陈伟：土耳其民众从1月开始大规模接种新冠疫苗，主要是辉瑞-拜恩泰科、中国科兴、俄罗斯卫星V等。7月25日，土耳其一针接种率47.57%，两针接种率27.52%。华侨华人受惠于“春苗行动”，基本上都接种了科兴疫苗。我在5月完成了两剂疫苗接种。

蔡春雷：孟加拉国本地疫苗接种率非常低，当地民众很少有人接种疫苗。中国捐赠110万剂疫苗给孟加拉国政府。5月29日，“春苗行动”在孟加拉国正式启动，在中国驻孟加拉国大使馆统一部署下，孟加拉国中国和平统一促进会配合孟加拉华侨华人联合

会、中资企业协会组建了志愿者团队，奔赴8个地区11个疫苗接种点，为侨胞提供指引、登记、排队、留观等一系列服务。截至6月底，共协助2000余位侨胞顺利接种了疫苗。我担任了志愿者并接种了疫苗。

六、疫情期间统促会举办了哪些活动？

任道伟：主要工作都是围绕疫情开展的。去年初中国疫情爆发后，吉尔吉斯斯坦中国和平统一促进会第一时间联合中亚河南商会和吉尔吉斯贸易促进会，组织向河南相关医院捐款，支援祖国（籍）国抗疫。去年3月吉尔吉斯斯坦疫情爆发后，积极参与旨在为吉尔吉斯斯坦弱势群体提供社会援助、持续13年的“春苗慈善”活动，向吉尔吉斯斯坦收治新冠肺炎确诊病例最多的国家临床传染病医院捐赠了医用口罩、鞋套和食品等物资，定向给曾在2019年参与“我和我的祖国”大合唱表演的吉尔吉斯国家交响乐团捐赠抗疫物资，助力抗击疫情。大家不远万里到吉尔吉斯斯坦工作生活，要对这片土地心怀感激，要与当地民众建立友谊，要联手共克时艰。

吉尔吉斯斯坦三大社团——吉尔吉斯贸易促进会、中亚河南商会、吉尔吉斯斯坦中国和平统一促进会疫情爆发初期就开始储备防疫物资，侨胞只需凭借护照就可以免费领取。受疫情影响，很多华侨华人出门不便，为了给大家提

供便利，吉尔吉斯斯坦中国和平统一促进会设立了“比什凯克配送中心”，为侨胞配送生鲜、生活日用品等。疫情严重时，吉尔吉斯斯坦中国和平统一促进会发出倡议，支持中国抗疫，保护抗疫胜利果实，非紧急情况不回国，不给家乡添乱，不给祖（籍）国添乱。去年10月，吉尔吉斯斯坦政局动荡，人人自危，为避免侨胞企业受到冲击，三大社团联合当地安保力量，为在比什凯克的中资企业和办公场所设置了“安全线”，确保了大家的生命财产安全。

除了组织抗疫，吉尔吉斯斯坦中国和平统一促进会还积极关注反“独”促统工作。在日常的工作和生活中，会员都特别注意传播正能量，积极向当地社会展现中国正面形象，宣传中国发展成就。吉尔吉斯斯坦是中国近邻，人员往来密切，作为统促会组织，更应积极履行责任，反对和制止危害两国人民安全和破坏两国关系的人或事。譬如，面对美国无端指责中国香港和新疆事务时，吉尔吉斯斯坦中国和平统一促进会及时发表声明予以谴责，并向周围的人传达事实真相，为维护祖（籍）国和平稳定积极发声。2020年6月2日，组织了支持涉港国安立法暨《反分裂国家法》实施15周年视频交流座谈会，6个主要侨社负责人及部分华侨华人参加座谈会。特别值得一提的是，今年6月16日，组织了纪念中国共

产党成立100周年座谈会，讲述中国共产党百年历史。吉尔吉斯斯坦华侨华人虽身处异国他乡，但对中国共产党的热爱丝毫不减。河南发生重大洪灾后，三大社团发起“春苗慈善”活动募捐善款，紧急采购了紧缺物资送达河南新乡灾区人民手中。

陈伟：疫情期间，土耳其中国和平统一促进会主要做了四方面工作。一是防疫抗疫。2020年面对国内疫情，第一时间发动会员捐款捐物，购买N95口罩发往中国红十字会。随着土耳其确诊病例快速增长，出现了医疗资源奇缺状况，立即筹集资金和物资，先后向马勒泰佩区政府、乌姆拉尼耶区政府、贝西克塔斯区政府、伊斯坦布尔市政府等捐赠了医用防护口罩和防疫物资。贝西克塔斯区议会议长HASAN BOZKURTER接受捐赠时表示，感谢中国人民对土耳其人民的深情厚谊，特别感谢土耳其中国和平统一促进会在病毒肆虐时期送上的爱心。去年4月，土耳其新冠肺炎进入高发期，新疆维吾尔自治区政府向土耳其华侨华人捐赠了一批防护口罩，土耳其中国和平统一促进会立即将物资发放给包括台胞和少数民族侨胞在内的华侨华人，以及因疫情滞留的中国游客和当地民众。随着疫情的发展，为满足华侨华人防疫需求，土耳其中国和平统一促进会还多次向侨胞中的易感人员发放了连花清瘟胶囊。二是旗帜鲜明地

维护祖（籍）国利益。虽然疫情肆虐，但是土耳其中国和平统一促进会依然坚持高举和平统一旗帜，团结一切拥护中国统一的侨胞和各界人士，开展反“独”促统活动。一年多来，多次发表声明严正谴责美国通过所谓“台北法案”，谴责美国总统签署“2020年维吾尔人权政策法案”，强烈抗议美国卫生与公共服务部部长访台，强烈抗议美国将华盛顿中国和平统一促进会列为“外国使团”。积极发表声明支持《关于建立健全香港特别行政区维护国家安全的法律制度和执行机制的决定》，支持和拥护香港国家安全法通过并实施，坚决支持和拥护《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关于完善香港特别行政区选举制度的决定》。三是密切关注祖（籍）国发展。去年，土耳其中国和平统一促进会通过线上线下举办了纪念《反分裂国家法》实施15周年座谈会；国庆之际会员纷纷制作发布短视频，庆祝祖（籍）国71岁华诞，表达对祖（籍）国的热爱。今年3月中国召开两会期间，组织华侨华人围绕全国政协常委会工作报告中提到的“加强同港澳同胞、台湾同胞、海外侨胞团结联谊”主题进行深入交流座谈；6月庆祝中国共产党成立100周年前夕，组织举办“百年辉煌 侨心向党”云端联欢会。四是促进中土文化交流。去年5月，土耳其中国和平统一促进会发起“百人共同创作活动”，发动侨胞共同创作

小说《带路情缘》。为庆祝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71周年，发起了《大美新疆》摄影展，在线上用中土两国语言介绍新疆风光、民俗和抗疫情况。2021年中国春节，组织部分会员召开新春座谈会，在网上举办云端新春联欢会，与广大华侨华人、土耳其友好人士共同庆祝中国春节。创办了土耳其中国和平统一促进会微信公众号，7月中旬在公众号上发表了《古尔邦节的由来和传说》等文章，让更多侨胞了解古尔邦节的来历和民俗礼仪。

蔡春雷：去年3月到现在，孟加拉国疫情持续不断，越来越严重，多次封城两周，禁止聚集。孟加拉国中国和平统一促进会不得不停止线下活动，把主要精力放在线上，特别放在防疫工作上。去年年初，中国疫情防控形势异常严峻，防护物资极度短缺，孟加拉国中国和平统一促进会及时发起爱心捐赠活动，呼吁会员和侨胞捐款捐物，驰援祖国抗疫一线。向中国驻孟加拉国大使馆转交了防疫物资，后来又向广东省、重庆市慈善总会分别捐赠了口罩和防护服等抗疫物资，支持中国抗疫。孟加拉国人口众多，经济落后，医疗水平比较低。疫情爆发后，为了守护侨胞健康安全，配合孟加拉国侨胞联合会为侨胞发放“心连心”健康包；与孟加拉国医院沟通并达成合作，在首都达卡指定区域，专设核酸检测

采样点，并安排志愿者配合孟加拉国医务人员到其他城市完成核酸检测工作。“春苗行动”在孟加拉国启动后，积极组织志愿者团队赴各地协助侨胞接种疫苗。面对孟加拉国日益严峻的疫情，积极与当地民众并肩抗疫，以各种形式向孟加拉国政府部门和社会各界捐款捐物，传递中国人民的友谊和爱心。今年年初，向孟加拉国法王寺孤儿院和学校600位贫困学生捐赠了日用品和防疫物品，帮助他们渡过难关。

反“独”促统工作方面，孟加拉国中国和平统一促进会始终积极关注两岸形势，对“台独”“港独”“藏独”“三股势力”等分裂行径保持高度警惕。去年年初，成功协调有关方面撤下了孟加拉国国际服装工业机械及配件展会上的台湾旗；发布多项声明，谴责美国国会通过“台北法案”，美国卫生与公共服务部部长、副国务卿等访台，不法分子打砸抢烧在缅中资工厂；发布《关于拥护和支持建立健全香港特别行政区维护国家安全的法律制度和执行机制的声明》、坚决拥护和支持《反分裂国家法》的声明等。5月12日，参加了亚洲地区中国和平统一促进会联合总会主办的线上“反暴力、反种族歧视”和平论坛，共同发布了《关于反对欧美国家歧视亚裔的倡议》。河南遭受洪灾后，第一时间组织捐款，驰援河南防汛救灾。

七、经历了这次疫情，让您最深有感触的是什么？疫情后您最想做的一件事是什么？有什么计划和打算？

任道伟：经历疫情，我最有感触的是，在中国共产党的正确领导下，中国越来越强大，人民越来越幸福，山河越来越美丽，科技越来越进步。疫情过后我最想做的事就是确保有一个健康的体魄，不断地提高自己，更努力地工作，为中吉友好做出更大贡献。

陈伟：疫情令我感触最深的就是一句话——团结就是力量。疫情让我感受到，只要人人都奉献一点爱，这个世界将更美好。疫情后我最想做的一件事，就是回国看望父母和亲朋好友，游览祖国的大好河山，感受祖国的崭新面貌。土耳其中国和平统一促进会疫情后会积极壮大力量，扩大在当地的影响，坚决与形形色色的反华分裂势力作斗争。积极发展中土两国经济和贸易往来，主动向土耳其各界人士讲好中国故事，促进土耳其与中国友好交流。

蔡春雷：2020年回国过年，我见证了国内抗疫。2020年8月出国至今，我经历了海外抗疫。我感触最深的是，祖国日益强大，人民更加团结。疫情深深影响了人们的生活方式，也改变了人们的很多观念和想法。疫情后我最想做的事就是回国。期待疫情能够早日结束。🇨🇳

中国共产党是领导中国人民 完成祖国统一大业的核心力量

■ [澳大利亚]陈蔚东

今年是中国共产党成立100周年。100年来，中国共产党领导中国人民走过了波澜壮阔的光辉历程，立下了举世瞩目的丰功伟绩，把一个贫穷落后的半封建半殖民地国家建设成为一个繁荣昌盛的社会主义国家，实现了全面建成小康社会第一个百年奋斗目标。如今，中国共产党统筹中华民族伟大复兴战略全局，面对世界百年未有之大变局，团结带领中国人民为到本世纪中叶把中国建设成为富强民主文明和谐美丽的社会主义现代化强国而努力奋斗。

在全面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强国新征程中，推进祖国和平统一进程也将迎来新局面。由于中国内战的延续和外部势力干涉，中国大陆和台湾还处于分离状态，国家统一还没有完成。解决台湾问题、完成祖国统一大业，是中华民族的根本利益，也是历史赋予中国共产党的神圣使命。

1949年，中华人民共和国诞生，在解放战争中失败的国民党当局退踞台湾。国民党当局在美国的支持下负隅顽抗，造成了台海两岸分离的局面。中国共产党

坚持把解决台湾问题、完成祖国统一大业作为党的一个主要奋斗目标，始终不渝地探讨和寻求祖国统一的方式和途径，根据两岸关系发展不同时代背景，作出了相应的战略决策，并为此进行了长期不懈的努力。

上世纪40年代末50年代初，随着解放战争的胜利进行，中国共产党提出了“武力解放台湾”的主张。1949年3月，新华社发表《中国人民一定要解放台湾》社论，中国共产党开始考虑武力解放台湾的问题。12月，中共中央在《告前线将士和全国同胞书》中重申：中国人民解放军在1950年的光荣战斗任务，就是解放台湾，……完成统一中国的事业。同时还制定了具体的解放台湾的计划。

由于美国入侵朝鲜，并公然以武力侵占台湾，造成了台湾海峡的紧张局势，人民解放军渡海作战、解放台湾的计划被迫推迟。1950年6月，周恩来代表中华人民共和国中央人民政府宣布：“不管美国帝国主义者采取任何阻挠行动，台湾属于中国的事实，永远不能改变；这不仅是历史的事

实，且已为开罗宣言、波茨坦公告及日本投降后的现状所肯定。我国全体人民，必将万众一心，为从美国侵略者手中解放台湾而奋斗到底。”表明了中国共产党解决台湾问题的坚强决心和信心。

50年代中期，中国共产党根据台海形势变化及时调整了对台政策，在考虑武力解放台湾的同时，准备争取和平解决台湾问题。1955年5月，周恩来指出，中国人民解放台湾有两种可能的方式，即战争的方式和平的方式，中国人民愿意在可能条件下，争取用和平的方式解放台湾。中国共产党的这一战略调整顺应了国内外形势的发展，也标志着对台政策的重大转变。1956年，中国共产党关于争取和平解放台湾的政策又有了新的发展。1月，毛泽东提出准备进行第三次国共合作。6月，周恩来第一次在公开场合正式表达了中国共产党愿意同国民党进行和谈的愿望，进一步阐释了有关和平解放台湾的问题。

鉴于国民党坚持一个中国原则，反对美国制造“两个中

国”“一中一台”和“台湾地位未定论”的立场，根据毛泽东提出的“和为贵”“爱国一家”“爱国不分先后”基本原则，中国共产党郑重建议“实行国共两党第三次合作”，愿意用和平谈判的方式，使台湾重新回到祖国的怀抱，并提出了具体方案。中国共产党关于和平统一台湾的主张和争取第三次国共合作的呼吁得到了全中国人民和海外华侨华人的拥护和赞同，在台湾也产生了极大反响。许多国民党人士通过各种方式表达对和平统一的支持，台湾当局也多次秘密派人与中国共产党进行试探性接触。

1960年以后，中国共产党根据毛泽东和平解决台湾问题的思想和两岸关系形势发展，进一步为和平解决台湾问题提出了许多重要原则和具体建议，周恩来将此概括为“一纲四目”。“一纲四目”标志着中国共产党的对台政策正式从“和平解放”调整为“和平统一”，这不仅对台湾当局产生了重大的现实影响，在祖国统一进程中也有重要的历史价值。

20世纪70年代，中华人民共和国国际地位日益提高。1971年10月，联合国恢复了中华人民共和国的合法席位，世界上许多国家纷纷与中华人民共和国建交，一个中国原则成为国际社会普遍共识。1972年2月，中美发表《上海公报》明确了“一中”原则，美国在公报中公开承认“只有

一个中国”“台湾是中国的一部分”。1979年1月，美国在《中美建交公报》中首次承认“中华人民共和国政府是中国的唯一合法政府”，从而粉碎了美国制造“两个中国”“一中一台”“台湾独立”的图谋。这是中国共产党在捍卫国家主权和领土完整、维护国家统一、防止外国势力分裂中国斗争中所取得的具有历史性意义的重大成果，为解决台湾问题创造了一个较好的国际环境。

70年代末，中国共产党根据新的形势适时调整对台政策，提出了解决台湾问题的新战略。1979年元旦，全国人大常委会发表《告台湾同胞书》，这是代表全国人民意志的国家最高权力机关第一次用文告郑重宣布中国共产党以和平方式解决台湾回归祖国、实现国家统一的大政方针。《告台湾同胞书》的发表在祖国统一进程中具有里程碑意义，标志着两岸关系从此进入了一个新的历史时期。

1981年9月，全国人大常委会委员长叶剑英提出关于台湾回归祖国、实现和平统一的九条方针，建议“举行国共两党对等谈判”，并且表示“国家实现统一后，台湾可作为特别行政区，享有高度的自治权”，“台湾社会经济制度和生活方式不变”。这是中国共产党首次提出“一个中国、两种制度”的思路，表明了中国共产党的对台政策是以中华民族大义和国家根本利益为出发点，

在尊重台湾现状的基础上，充分考虑到了台湾人民和台湾当局的切实利益。

1982年1月，邓小平提出“和平统一、一国两制”，成为中国共产党新时期对台政策指导方针。“和平统一、一国两制”的核心是祖国统一，“一国两制”则是“和平统一”重点内容。1982年12月，全国人大通过的《中华人民共和国宪法》中，增加了国家在适当时候设立特别行政区，为“一国两制”和祖国统一提供了宪法保证。中国共产党把人民的意愿通过法定程序变成为国家意志。

1983年6月，邓小平进一步为解决台湾问题提出了六条方针，阐明了实现台湾和祖国大陆和平统一的构想，论述了“一个国家、两种制度”的内涵：“统一后，台湾仍然搞它的资本主义，大陆搞社会主义，但是一个统一的中国。”1984年5月，全国人大正式提出祖国统一后可实行“一个国家、两种制度”。“一国两制”作为基本国策得到确立。“一国两制”是中国共产党为实现祖国统一而设想的最佳途径，是解决台湾问题的最好办法，既照顾到了中国人民包括台湾民众的利益，又符合中国的历史发展和两岸的现实状况，从根本上维护了中国的主权和领土完整。

依据“一国两制”基本方针，中国政府就香港和澳门回归分别与英国和葡萄牙政府先后达成协

议。1997年7月1日和1999年12月20日，香港和澳门回归祖国，中国政府收回了香港、澳门主权，在祖国统一进程中迈出了历史性一步。“一国两制”在港澳的成功实践，进一步坚定了中国共产党解决台湾问题的信心。

在“一国两制”方针指引下，中国共产党为推动实现祖国和平统一采取了一系列有利于缓和两岸关系、促进两岸经贸合作和人文交流的具体措施，从而形成了多年来两岸从未有过的互动局面，使台海紧张对峙状况逐渐得到缓和。1992年，海峡两岸关系协会与台湾海峡交流基金会达成各自以口头方式表述“海峡两岸均坚持一个中国原则”的共识，即“九二共识”，确认了双方均坚持一个中国的共同立场，构建了两岸关系发展的政治基础。在此基础上，双方于1993年4月举行了“汪辜会谈”。“两会”领导人首次会谈推动了两岸协商，也带动了两岸交流蓬勃发展，使海峡两岸关系发展迈出了重要的历史性一步。1998年10月，“两会”领导人在上海举行的“汪辜会晤”开启了两岸政治对话。这两次会谈对推动两岸关系深入发展、促进祖国和平统一起到了积极作用。

1995年1月，江泽民发表了《为促进祖国统一的完成而继续奋斗》的讲话，提出了推进祖国和平统一进程八项主张，表达了中国共产党对发展两岸关系、实

现和平统一的极大诚意，进一步深化了中国共产党对祖国统一的探索。讲话明确表示了不赞成无限期拖延统一的意见，表达了中国人民早日完成祖国统一的愿望。

1997年9月，中共十五大报告提出：“在一个中国的前提下，什么问题都可以谈。只要是有利于祖国统一的意见和建议，都可以提出来。祖国统一的问题，应当由两岸中国人自己解决。”2001年10月，针对两岸关系中的一个主要难点即“国号”之争，江泽民提出在承认两岸同属一个中国的基础上，两岸可以共议双方都能接受的具体“国名”，统一后可以考虑以“中国”为涵盖两岸的国名，这充分考虑到两岸关系现状以及台湾岛内的政治现实和民意，是中国共产党对台方针政策在新形势下的重大发展。

进入21世纪，中国共产党积极务实地调整对台战略，出台了一系列新政策和新举措，使两岸关系进入了一个新的发展阶段。2002年11月，中共十六大报告指出，“世界上只有一个中国，大陆和台湾同属一个中国，中国的主权和领土完整不容分割”。再次表达了中国共产党为解决台湾问题所秉持的原则立场和求同存异的务实态度，对解决台湾问题和祖国统一产生了重要影响。2003年3月，胡锦涛就做好新形势下对台工作谈了四点意见，充分体现了中国共产党对祖国统一

工作的高度重视和对台湾同胞的关心、理解和希望。2005年3月，胡锦涛就新形势下发展两岸关系提出四点意见，阐述了中国共产党关于两岸关系的基本政策，不仅新意多且富有深意，体现了中国共产党对台工作的新思路和新策略，表达了中国共产党对维护两岸关系稳定和发展的诚意。

2005年3月，全国人大通过《反分裂国家法》，首次把中国共产党多年来争取以和平方式解决台湾问题的方针政策法律化，以法律的形式表明了中国人民捍卫国家主权和领土完整、反对和遏制“台独”分裂势力的共同意志。从此，中国的对台政策进入了“以法遏独、以法促统”阶段。中国大陆相继出台了一系列惠及广大台湾同胞的政策措施，两岸经济合作和人文交流日益密切。

2005年4月，胡锦涛与国民党主席连战举行正式会谈，这是国共两党最高领导人六十年来第一次会面，翻开了国共合作的新篇章，为促进两岸关系发展迈出了历史性一步。会谈发布的《两岸和平发展共同愿景》，确认并强化了坚持一个中国原则、认同“九二共识”，表明了决不放弃争取和平统一的努力、坚决反对和遏制“台独”的基本立场，为两岸关系开辟了更为广阔的前景。此后，中国共产党与亲民党和新党等台湾政党达成了共识，增进了彼此的了解和理解。两岸政党直接交流开辟了两岸交往新

渠道，使中国共产党“寄希望于台湾人民”方针得到延伸和深化。2008年5月，胡锦涛与国民党主席吴伯雄举行新形势下两党领导人首次会谈。6月，中断了近10年的“两会”制度化协商在北京正式恢复，双方达成了许多共识，解决了关乎两岸同胞切身利益的一系列问题。

2008年12月，胡锦涛在《携手推动两岸关系和平发展，同心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讲话中提出六点意见，牢牢把握两岸关系和平发展主题，着眼于构建两岸关系和平发展总体框架，展现了中国共产党站在台湾民众立场处理台湾问题的善意，既延续了中国共产党的—贯思想，又展现了创新思维，是中国共产党在新世纪两岸关系进入和平发展时期后对台工作的新纲领，为两岸关系的良好发展势头提供了最大保障。不久，两岸实现全面直接双向“三通”，极大便利了两岸民众往来，也有助于台湾经济的发展。双方随后签署的两岸经济合作框架协议(ECFA)将两岸经济合作推向新阶段。

中共十八大以来，以习近平为核心的党中央全面准确把握两岸关系历史和现实，从国家发展全局和中华民族伟大复兴战略高度，就两岸关系和推进祖国统一提出了一系列新理念、新思想、新战略，不仅推动了两岸关系和平发展，加强了两岸经济人文交流合作，同时还妥善应对了

台湾局势变化，遏制了“台独”分裂势力，有力维护了台海和平稳定，为实现祖国和平统一创造了条件。

中共十八大报告中提出，要在—个中国原则基础上增进两岸互信，坚决反对“台独”，以推动两岸关系和平发展为主题，以广泛团结台湾同胞为主线，积极推动两岸各方面交流合作，强调做好台湾人民工作对推动两岸关系和平发展的重要性。十八大报告中的对台政策和重大决策部署，思路清晰，逻辑清楚，表明中国共产党对应未来两岸关系和平发展可能出现的新变化新形势充满了自信。

2015年11月，国家主席习近平与台湾地区领导人马英九会面，就推进两岸关系和平发展进行交流，增进了两岸双方的信任，对进一步加深两岸同胞的深度融合交往达成了共识。这是1949年以来两岸领导人首次会面，翻开了两岸关系历史性—页，开创了两岸领导人直接对话交流的先河，是两岸关系发展史上具有里程碑意义的大事。这—“世纪之握”对深化两岸关系和平发展、推进祖国完全统一进程产生了巨大的积极影响，充分表明两岸中国人有能力有智慧解决自己的问题，也赢得了国际社会的高度评价与赞赏。

2017年10月，中共十九大报告把坚持“—国两制”和推进祖国统一确定为新时代坚持和

发展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基本方略之—，提出今后中国共产党对台工作的主要任务就是“推进祖国统一”，—步明确了国家统—问题的重要性。报告在维护国家主权和领土完整方面划出了清晰的红线，表达了中国共产党坚决遏制“台独”分裂势力的坚定意志。

2019年新年伊始，习近平在《告台湾同胞书》发表40周年纪念会上发表题为《为实现民族伟大复兴 推进祖国和平统—而共同奋斗》重要讲话，站在民族复兴、国家利益高度，再次强调“实现祖国的完全统—，是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历史要求”，重申解决台湾问题、实现祖国完全统—是中国共产党、中国政府、中国人民矢志不渝的历史任务。讲话全面系统阐释了新时代推进祖国和平统—的五项重大政策主张，是中国共产党对台战略和祖国和平统—思想的发展与创新，是中国共产党在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新时代解决台湾问题、推进祖国统—的纲领性文献，充分反映了中国共产党对实现祖国完全统—的决心和底气，具有重大现实意义。讲话秉持“两岸—家亲”理念，提出的“深化两岸融合发展”是体现“两岸命运共同体”、达到“两岸心灵契合”的重要途径，标志着中国共产党加快了解决台湾问题、推进祖国和平统—的进程。

纵观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以

七十二年，与祖国同行

■ [挪威]马列

我和我的祖国，一刻也不能分割，无论我走到哪里，都流出一首赞歌……每当听到和唱起这首歌时，我心潮澎湃，热血沸腾，精神振奋，仿佛我时时刻刻就在祖国母亲的怀抱。

趟过72年岁月的河流，是否还记得曾经的斑斓？

掀开72年风尘的画卷，是否还铭刻曾经的沧桑？

72年，足以让一个人老去。而伟大的祖国，72年后却愈发茁壮！

1949年，我是个刚出生不久的孩子，如今，我已渐入安详的晚年。那些悄然逝去不服输的岁

月，记载了太多难以言说的酸楚。而其中伴着祖国母亲共同经历的事事沧桑，愈发显得醒目起来。

72年，需要回味的太多，需要纪念的也太多。在祖国母亲的怀抱中，40年成长与生活历程，是我一生中最温暖而又坚实的记忆。

那时的记忆，虽然艰涩，但却极为清晰。而那是一段怎样的历史啊！千疮百孔，百废待兴，正是一穷二白的底色，奠定了伟大的中国人民绘制美好蓝图的基调。有伟大领袖毛主席为首的中国共产党，和人民政府的英明领导，带领英雄的中华儿女敢教日

月换新天，奇迹一个个绽放开来。

随后，动荡不安的那个年代，冲击着每一个人的心灵，盲目的激进和迷茫的绝望散开在整个中华大地。但自此以后，每一个人便加倍懂得珍惜，且更加相信真理。实事求是，改革的春风，涤荡了一切不协调的音符，伟大祖国的新时代诞生了，共和国的宏图自此快速地铺洒开来。

那是一个多么不寻常的时代。而在那些纷纭变幻、荡气回肠的事件后面，每个人又都经历了怎样刻骨铭心、难以忘怀的陈年往事，也成为了每个人埋藏在心底里空旷的沉默。

来中国共产党对台工作的战略和大政方针，可以清楚地看到，中国共产党始终着眼于中华民族整体利益和长远利益，在追求国家完全统一进程中牢牢掌握两岸关系主导权，是领导中国人民完成祖国统一大业的核心力量。虽然中国共产党的对台政策在不同历史阶段有不同的特点和发展，但坚持一个中国原则、反对和遏制“台独”分裂是始终不变的根本原则和基本立场。而不同时期的特点和发展则是中国共产党从国

家发展全局出发，以理性和务实的态度，为台湾同胞谋福祉、为台海地区谋和平，为推动两岸关系发展、为实现祖国完全统一创造条件。

在中国历史发展的长河中，国家统一始终是主流，追求国家统一是中华民族的一个重要特征。中华儿女都希望中国保持统一，这是民族凝聚力的集中体现。而国家分裂是违背民族意志的，是中国人民绝不允许的。台湾自古以来就是中国领土不可分割的

一部分，台湾同胞是中华民族大家庭的成员。解决台湾问题，中国完全统一，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是中国共产党为之奋斗的目标，是全中国人民包括海外华侨华人的共同心愿。深信在中国共产党领导下，中国人民必将早日完成祖国统一大业。

中国必须统一，也必然统一！**统**

（作者为中国和平统一促进会理事、澳大利亚首都地区中国和平统一促进会会长）

然而，在祖国开始蓬勃发展的时刻，我却离开了。1990年，已过不惑之年的我，第一次离开了故土。之后，便在北欧这片美丽而又冰冷的土地上开始了我30年的迷惑岁月。

挪威，是一个安静而美丽的国度。但面对虽完善而发达异国的一切，我却没有半点儿归属感。

寂寞与无助，带给我40年来从未有过的恐慌。国内外的巨大差异，不得不让每一个华人弱化自己固有的思维，去适应，去融入……在挪威的30年，我逐渐深刻认识到，在历史的大时代中，人变得很小很小。因此，经常在我的心中引发巨大的悲伤，冲击我的内心，激荡而疼痛。我唯一能做的就是做好自己，不给祖国丢脸。

真的离开了，才觉得出心与祖国贴得更近。大洋彼岸的冷暖，牵挂着游子薄梦的永恒追求。所以，无数的华人，最初在海外追寻着自己漂泊梦的同时，心都像一粒浸透了思乡情的种子，膨胀在每一个难眠的夜里。记不得有多少次，我在思乡感伤的乐曲、文字及缓缓舒心的旋律中，排解那一份欲盼却不可得的忧伤。血管里流淌的黄河的波浪，钱塘江的潮涌，总是不断地撩拨起我对家国的思念。乡愁是一张小小的邮票，只有这样想着、张望着，以记忆摇撼记忆，摇撼远在画中国家的山河。

1993年，我再次踏上祖国的

土地，一切都显得亲切而温暖。回到杭州，我像一个好奇而顽皮的孩子，欣喜地打量着熟悉而又陌生的家乡。仅仅三年时间，浙江杭州已经发生了显著的变化，愈发美丽而又充满生机活力，以全新姿态欢迎我回家。我为祖国的日新月异而骄傲，更以杭州的日趋美丽而自豪。

回到遥远的挪威之后，我和当地华人华侨一起感受着祖国的每一处奇妙变化，聆听着祖国发出的每一缕动人的声音。改革开放，香港、澳门顺利回归；科学发展，神六、神七载人飞船和量子卫星胜利升空，嫦娥号登陆月球，百年奥运梦圆中国；吹响习近平新时代的号角，二十国集团(G20)峰会在杭州召开，航母下水，天眼运行，“抗疫”斗争胜利……这些消息都会带给我心跳的感觉，令我心醉。

祖国的每一处变化，总牵着我的心，让我迫不及待地收拾行囊，想要回家看看。所以，从1993年之后，我每年都会回国。尤其是看到浙江在红船思想引领下，“八八战略”“绿水青山就是金山银山”“特色小镇”实施，发生了翻天覆地变化，老百姓奋斗带来了幸福美好的生活。在感动于家乡变化的同时，我也给家乡带来“走出去”的机会。因为，祖国的日益强大，为海外华人华侨奠定了坚实的基础，中国文化在海外获得广泛认可。而6000万海外华人华侨的团结奋

斗，又为祖国树立了一面对外经济文化的旗帜，成为实现中国梦的一部分。

祖国成长的40年和海外漂泊的30年，构成我充满曲折、变幻而又绚烂的72年人生历程，多少悲喜孕育其间。

而祖国的72年，从天安门城楼的开国大典，到国民经济的迅速恢复，从如火如荼的“大跃进”，到九霄之上的人造卫星；从饱经风霜的特殊年代，到拨乱反正的改革之春；从开创百业的新纪年，到享誉世界的制造中心；从加入经济交流的世贸组织，到新时代的高质量共建“一带一路”；推动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到让世界和合共生……多少起承转合在华夏大地上演。

72年共和国的记忆，是一幅从4亿到14亿人民共同描绘的铺满了960万平方公里的宏大画卷，有我曾经经历过的，也有我未曾经历过的，有已经忘记的，也有永远难忘的珍贵瞬间。而置身历史，我们融于其中，分享着过去的兴奋与悲痛；放眼未来，我们发现，面前的道路更漫长更坎坷。

我始终相信，无论何时，每一个中华儿女都会和伟大的祖国一起坚定地走下去，伟大民族复兴的中国梦定能实现。在接下来的72年、700年甚至更久远的年代里，创造更加辉煌的未来。🇨🇳

(作者为中国和平统一促进会理事、全挪中国和平统一促进会共同会长)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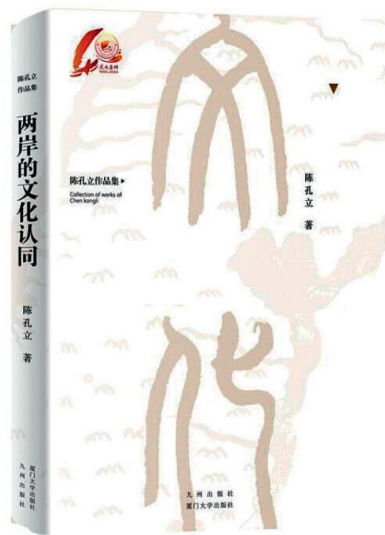
解民心契合之难题 注台湾研究之活水

——读陈孔立《两岸的文化认同》

■ 李仕燕 李智聪

曾有祖国大陆网友评论，不同面向看待两岸关系，很可能会得出不一样的结论。从两岸人员交流频率与双向经贸金额看，“你中有我，我中有你”的“一家亲”局面已是不争的事实。然而，如果从2016年以来的岛内选举结果看，会对岛内认同“九二共识”的民意板块日益被边缘化情况充满担忧。若再以中美关系战略高度看台海局势，则明显感觉两岸关系日益复杂严峻，“台独”挑衅风险上升。虽然网友的看法五花八门，但这些评论可以在一定程度上反映出台湾研究的多面性与复杂性，甚至还会出现一些与理论“相悖”的现象。

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理论认为，经济基础决定上层建筑，上层建筑反作用于经济基础。然而，当前的两岸关系却出现了让人困惑的现象：一边是逐年增长的两岸交流数量以及日益密切的经贸关系，另一边则是岛内日益升高的“台湾人”认同。为何在两岸经济社会相互融合的现阶段，台湾民众的身份认同并没有随之发生根本性改变，甚至出现交流越多，认同越“台”的情



况？祖国大陆台湾研究泰斗陈孔立教授在其最新著作《两岸的文化认同》中指出，在经济社会融合的当下，阻碍两岸人民实现心灵契合的症结在于文化认同。

文化认同，是台湾研究的老问题，也是新问题。中华文化是两岸民众共同的精神家园，也是维系两岸“同属一个中国”的文化基础。但七十多年来，两岸社会走过截然不同的发展历程，必然给双方的文化带来更多新

元素。《两岸的文化认同》围绕“两岸间的文化认同有无本质差异”“为什么两岸文化认同存在差异”“如何达成两岸文化认同”三个根本议题，通过自问自答的方式，解析民心不易契合的内在原因，解答实现民心契合的可行之法。

一、灵魂发问：民心何以不易契合？

陈孔立曾说台湾研究需要发现问题，并解决问题。秉持这一原则，《两岸的文化认同》从序言就开始“灵魂发问”。序言率先抛出10个有关两岸文化研究的“争议问题”：第一，两岸文化是否存在本质差异？第二，两岸文化的研究关注“同”，还是关注“异”？第三，两岸之间是否存在文化冲突？第四，两岸文化能否“求同去异”？第五，两岸文化认同指的是什么？只靠传统文化的认同或只靠现代文化的认同可以达成两岸文化认同吗？第六，文化认同是不是政治认同的前提和基础？文化认同是不是比较容易？第七，什么是两岸共同价值的基本要素？第八，两岸文化是否存在“文化断裂”？第

九，台湾方面建构的“台湾特色的中华文化”的目的是什么？第十，台湾生活方式是否值得引以为傲？

十个“灵魂发问”问题环环相扣，既是学术问题，也是现实问题。然而，面对自己提出的“灵魂发问”，陈孔立并没有急于回答，而是罗列出两岸专家学者的观点，并对每一个观点加以评述，引导读者更完整地理解每个观点提出背后不同的时空背景，当然，还包括两岸学者各持不同的政治立场。十个问题当中，最核心的问题自然是第一个问题“两岸文化之间是否存在本质差异”？陈孔立发现大部分两岸专家学者认为，两岸之间存在的文化差异，仅仅是局部的、有显著的、但是不存在本质性的，将两岸文化呈现差异的原因归咎于地理因素与长期的隔绝，忽略了两岸不同的社会制度对文化发展的决定性影响。在此基础上，陈孔立大胆提出两岸文化“同根不同质”的判断。祖国大陆的文化，是具有社会主义性质的，而当代台湾文化基本上保留了中华传统文化，但受到西方文化的较大影响，不可能含有任何社会主义文化的性质。两种不同性质的社会性质与社会制度导致了两岸文化存在本质差异。这种差异并不能单纯依靠交流来消除。相反，在某种程度上，正是越来越热络的两岸交流让彼此更进一步地认识到差异的存在，也不可避免地会

偶发因差异而引发“文化冲突”。承认彼此文化存在本质差异，是全书的立论基础，也是陈孔立破解民心契合难题的思考起点。

二、实事求是，解答民心契合之法

陈孔立认为，承认彼此的差异是开展两岸文化交流的前提，只是笼统地认为祖国大陆是中华文化，台湾也是中华文化，而不愿意探讨两岸文化的差异，有意回避是不能解决问题的。但这也不意味两岸文化交流没有意义，事实上，两岸文化交流的目的应当是增进相互了解，要产生“生成性对话”，而并非一味地想要说服对方。单纯地“求同去异”，不仅不符合当下两岸现状，还有可能导致双方对立的情绪，伤害两岸关系和平发展。祖国大陆要更好地推动双方文化交流，就需要“知己知彼”，客观地认识自1949年以来两岸各自不同的文化发展历程。陈孔立通过历史梳理的研究方式，提出两岸都经历了不同程度的“文化断裂”。在祖国大陆，从新民主主义社会确定马列主义指导地位开始起算，至今总共经历了4次文化断裂。而自1945年光复以来，台湾也发生了3次文化断裂。两岸各自发生的文化断裂，冲击了传统中华文化在两岸的传承，形成了当下两岸的文化在主流文化、政治文化和价值观三个方面存在本质的差异。70多年，两岸各自经历的文化断裂并不同频，由不同文化断

裂所衍生出来的主流文化以及社会价值观也难以产生“共情”，更不容易产生跨越海峡的共同文化认同。

近年来，伴随互联网的普及，两岸文化领域中“我群”与“他群”间的认同差异被一次次地放大，直接导致了两岸存在着（一定程度的）文化冲突。陈孔立认为，文化冲突集中表现在祖国大陆对“文化台独”的批判与台湾对“文化统战”的抵触。文化的冲突也逐渐扩展至政治、经济和社会等领域。更麻烦的是，网络民粹主义加重了双方的“火药味”，干扰了两岸正常交流交往，甚至成为岛内政客转移焦点，操作民意的新手法。最近台湾艺人张钧甯“被台独”事件正是典型的代表。陈孔立借鉴认同理论，提出“两岸文化认同”不仅指由共同语言、文字、历史、集体记忆等方面形成的原生性文化认同，或是中华传统文化的认同，还应当包括两岸后天建构的制度认同、心态认同，特别是价值观、思维模式、行为规范、社会心理、意识形态等方面内容。这一概念重在关注“后天建构”，即在两岸文化“同根不同质”的现有条件下，应当重视接近彼此心理距离的“双文化认同”建构。以两岸各自主流文化出发，祖国大陆的“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文化”既要“弘扬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又要“继承和发扬中华民族优秀传统文化”。台湾的“台

湾特色的中华文化”既强调“保留了完整而丰富的中华文化传统”，又强调了“吸收西方当代文明的精华”。两岸双方共存的“双文化”，应成为认识两岸文化认同的要求，既要重视两岸文化的“同”，又要尊重两岸文化的“异”。通过交流协商构建具有特色的“两岸共同价值”，也是两岸文化交流最任重道远的历史使命。

三、引入活水，新时代需要新思维

习近平总书记在庆祝中国共产党成立100周年大会上的讲话强调，“解决台湾问题、实现祖国完全统一，是中国共产党矢志不渝的历史任务”。研究问题是解决问题的前提。陈孔立新作《两岸的文化认同》，正是以学术研究的视角，关照当下两岸关系发展的难点与问题，既有与时俱进的洞察力，又有刨根问底的勇气，也带来了两点启发：

首先，充分认识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是新时代开展台湾研究的前提。过往台湾研究更多着眼于对台湾社情民意各方面的跟踪研究。然而，伴随综合实力的增长，祖国大陆最新发展动态已成为台湾媒体与岛内民众的跟踪焦点。在两岸实力已发生明显变化的新时代，祖国大陆对台研究需要有更高站位。学者应当通过强化自身对祖国大陆主流文化的理解，更好地传播与解析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核心价值与

中国共产党的执政理念，消除不必要的误解。陈孔立提倡，两岸的交流要处理好“主流文化交流与文化领域各个项目交流”与“‘同’的文化交流与‘异’的文化交流”这两对关系。前者要求要敢于面对两岸在意识形态、社会制度、发展模式的差异，开展“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文化”与“台湾特色的中华文化”之间的直接交流。只有开展两岸主流文化之间的交流才是把握文化交流的主体，才能认识双方在观念、价值方面的差异，才可能真正了解对方的文化。后者则强调两岸交流应拒绝迷恋于历史之“同”，开展“异”的文化交流，认识双方文化的全貌，全面认识双方文化，才能认识双方文化的真实性，避免虚假和片面。在相互认识的基础上，坚持两岸文化在民族性和现代性结合、统一性和多样性结合、正确对待两岸文化的差异的四对原则，促进两岸文化的融合。

其次，台湾研究既需要多学科的知识交融，也需要勇于创新。一方面，台湾研究涉及政治、经济、文化、社会与法律等多个面向，需要多学科理论协同支持。在这一点上，陈孔立亲自做出表率。在《两岸的文化认同》中，陈孔立引注来源就涵盖了政治学、心理学、历史学、文学、语言学等多个学科。而借鉴的文化认同研究经验或教训，则是来自美国、欧洲与东南亚国家

的具体案例。值得注意的是，陈孔立还与时俱进研究当代的两岸流行文化，如“周杰伦”与“中国好声音”，还延伸到了岛内人人皆是“球迷”的“棒球文化”，表明不同的经历、不同的历史记忆会导致不同的政治心理，产生不同的情结，强调从兴趣、爱好到审美至价值观等方面入手，实现心灵沟通，建构“两岸共同价值”。

另一方面，两岸关系的独特性决定了台湾研究必须在既有理论框架中“逢山开路”“遇水搭桥”。《两岸的文化认同》正是在现有理论难以单独解释两岸交往中产生的与理论“相悖”的现象之际，引入了文化认同理论，在理论与实际之间筑起一条新的“梯子”，拓展了台湾研究的深度与维度，更好地服务于祖国统一大业。

陈孔立最欣赏朱熹在《观书有感》中的两句诗：“问渠哪得清如许，为有源头活水来。”六十余载学术生涯，陈孔立始终胸怀国家与民族发展大局，坚守台湾研究的“半亩方塘”，至今笔耕不辍，从不同学科与研究视角为台湾研究引入思想活水。对于陈孔立教授一生治学的研究准则，孙亚夫曾归纳为两点：一是致力了解一个真实的台湾；二是实事求是的方针。这既是对老先生严谨治学的高度肯定，也是给予后辈学人最宝贵的精神财富。❶

“五四”影响在台湾

■ 程彩霞

轰轰烈烈的五四运动发生之后，其影响所及远播台湾，使台湾在此之后文学历史的发展总是或隐或显地包含着“五四”的影子。五四运动至今已逾百年，“五四”对台湾新文学的影响也是一个有百年历史的漫长过程了。

在这百年历史中，“五四”对台湾新文学的影响在不同历史阶段有不同的表现。因此，要谈论“五四”对台湾新文学的影响，首先要面对“五四”影响在台湾的阶段划分问题。关于“五四”对台湾影响的阶段划分，不同学者有不同的标准。潘光哲将1920年代至1949年张我军对白话文学的介绍和许寿裳对鲁迅的介绍看作第一阶段；1949年至1987年《自由中国》杂志和殷海光等人通过“五四”资源与国民党交锋看作第二阶段；1987年之后“五四传统”被纳入学术体制的知识生产事业看作第三阶段。简明海将1920年代到1945年《台湾民报》和张我军等人传播“五四”新文化视为第一个时期；1945年至1979年纪念鲁迅风潮和《自由中国》殷海光等人传播“五四”自由主义精神为第二个时期，其

中1945年光复后纪念鲁迅风潮时间短暂，只可视为一丝涟漪；1979年之后因祖国大陆形势的改变以及随后台湾本土化的趋势，“五四”在台湾进入新的阶段。陈思和认为1949年之前“五四”新文学传统对台湾有两次比较集中且深有意义的影响，第一次为1920年代到1940年代《台湾民报》等杂志、张我军与赖和等作家对“五四”新文学的介绍，第二次为1945年台湾光复到1949年许寿裳和台静农等跨海赴台的“五四”新文学中坚分子对鲁迅的介绍和对台湾文化的建设；1949年后“五四”新文学精神因具体的人的存在而得以传承，许多作家的知识背景中都含有“五四”新文学的基因。尽管各位学者的划分标准不同，在笔者看来，以史实为依据，“五四”对台湾新文学的影响实有三波。第一波以日据时期《台湾民报》和张我军将白话文学介绍到台湾为主要标志，第二波以战后初期台湾纪念鲁迅风潮为主要内容，第三波以50年代《自由中国》传承“五四”自由主义精神为显性标志，以迁台作家对

“五四”活的传承为隐性内容。

一、日据时期“五四”的台湾传播与影响

日据时期，“五四”在台湾的传播与《台湾民报》及其前身《台湾青年》和《台湾》密切相关，这些报刊在“五四”的台湾传播方面起了重要的媒介作用。1920年7月16日，陈炳在东京留学生杂志《台湾青年》创刊号上发表文章《文学与职务》，主张改革旧文学、提倡白话文，这是台湾新文学运动的首篇。1921年12月，陈端明在《台湾青年》第3卷第6号上发表《日用文鼓吹论》，文章用稚拙的白话文写成，抨击古文的使用导致文化的停滞。1922年4月10日，《台湾青年》改组为“台湾文化协会”机关杂志，更名为《台湾》。1923年1月，《台湾》月刊第1号刊载黄呈聪的《论普及白话文的新使命》，第1号、第2号也登载了黄朝琴的《汉文改革论》，这两篇文章是二人1922年暑假到祖国大陆旅行，看到祖国大陆五四运动后白话文的普及情形有感而作。1923年4月15日，《台湾民报》在东

京创刊，第1号刊登了五四运动的有关信息，选录了胡适的《终身大事》，介绍了《胡适文存》，登载台南倡议白话文研究会的广告，还刊登了陈逢源祝贺《台湾民报》发刊的诗文：“诘屈聱牙事可伤，革新旗鼓到文章，适之独秀驰名盛，报纸传来贵洛阳。”黄呈聪任《台湾民报》主编，黄朝琴以记者身份撰文，承续了《台湾》月刊的特色。1923年7月15日，留学上海的许乃昌在《台湾民报》第1卷第4号上发表文章《中国新文学运动的过去现在和将来》，介绍了小说、诗歌、翻译方面的16位“五四”新文学作者，为台湾新文学提供借镜。

除了总体介绍外，《台湾民报》还大量刊载祖国大陆“五四”新文学作家作品。前期以刊载胡适、鲁迅作品为主，自1926年底赖和接任《台湾民报》学艺栏编辑后，对“五四”新文学作品的介绍更加多元化，不再限于少数几位作家。随着祖国大陆作家作品的刊载，白话文的不断普及，台湾本土作家在《台湾民报》上的白话文创作也逐渐成熟。关于《台湾民报》“五四”新文学作品刊载和台湾本土作家作品发表两者之间的关系，叶石涛认为一开始“由于本土作家的作品稀少，因此，《台湾民报》不得不转载大陆的许多新文学作品”，后来随着台湾新文学的成熟，“转载

的大陆文学作品逐渐减少以至于全无”。朱双一也认为：“《台湾民报》引介五四新文学和推进台湾本地新文学，经历了一个此消彼长的过程。当台湾新文学尚在襁褓之中时，《台湾民报》大量转载五四新文学作品，一方面对于台湾民众具有思想启蒙等作用，另一方面也可作为台湾新文学之样板。但台湾本地新文学作家作品逐渐成熟之时，它们也就逐步取代前者，成为文学版面的主角。”

而张耀仁通过对《台湾民报》的量化分析发现，1923年至1926年间前期的“《台湾民报》文艺栏所刊载之本地的文学作品，其数量并不亚于转载之中国新文学，只因作者名声不若中国新文学作者响亮，而遭叶石涛等研究者误认为‘本土作家的作品稀少’”。无论如何，祖国大陆“五四”新文学作品的介绍，促进了台湾本土作家新文学创作的发展和成熟，这一点是毋庸置疑的。

除了以报刊为媒介的介绍外，张我军掀起的新旧文学论争对“五四”在台湾的传播也起到积极促进作用。张我军早年在祖国大陆求学，对“五四”新文化运动比较熟悉。1924年10月下旬，张我军从北京回到台湾，任《台湾民报》编辑，直至1926年6月离职赴京。1924年11月21日，张我军在《台湾民报》发表针对台湾旧文学的

论战文章《糟糕的台湾文学界》。在1925年元旦号《台湾民报》发表了《请合力拆下这座败草丛中的破旧殿堂》，以胡适的八不主张论证台湾旧诗应当废除。张我军以《台湾民报》为论战舞台向旧文学发起了猛烈进攻。张我军的主张引起连雅堂的抨击，赤嵌王生也在《台湾日日新报》发表《告张一郎书》，以及署名郑军我者在《南报》上的反击。通过这场文学论争，“五四”白话新文学为更多人所熟知和认同。“五四”在台湾的传播当然不是张我军一个人的功劳，但他的确是贡献突出的一位。

除了文字方面的宣传外，台湾留日学生还组织“文化讲演团”，利用暑假返台时巡回全岛，展开文化启蒙工作，从1923年到1926年共组织了4次“文化讲演团”。台湾本土组织“台湾文化协会”也举办各种讲习会、开办夏季学校、举行文化讲演会启蒙人心、传播新知。这种面对面直接的文化传播，使新思想新文化更深入地散播到普通民众中去。而郁达夫1936年12月访问台湾，更是对“五四”新文学的一种直接传播。

总之，日据时期“五四”在台湾的传播依靠《台湾民报》等报刊为宣传媒介，通过张我军等人大力推介，在台湾落地生根并产生了广泛深远的影响。

二、战后初期“五四”的台湾传播与影响

战后初期，“五四”在台湾的传播以介绍鲁迅的作品和思想为主要标志。1947年1月，杨逵首先出版中、日文并刊的鲁迅小说《阿Q正传》，随后鲁迅的《狂人日记》《孔乙己 头发的故事》《药》和《故乡》分别被王禹农和蓝明谷翻译成日文，可以说鲁迅的文学名著大部分都被译介到台湾。这些作品是以中、日文对照本的形式刊行，之所以出版中、日文对照本，是作为学习国语的教科书，同时也是为了介绍祖国近代文学名作。与此同时，郁达夫、茅盾、沈从文、老舍、周作人、丰子恺、张天翼等人的作品也被介绍到台湾，但都不如鲁迅作品介绍的规模大。

1946年10月19日是鲁迅逝世十周年纪念日，台湾以此为契机形成了一个纪念鲁迅的风潮。1945年10月25日，林金波在《前锋》杂志发表文章《学习鲁迅先生——十周年忌辰纪念》，这是光复初期台湾“鲁迅风潮”的先声。1946年10月，“鲁迅风潮”进入高涨时期，台中《和平日报》是一个重要据点，连续刊登纪念鲁迅的专辑，张扬鲁迅韧性战斗的现实主义精神。将“鲁迅风潮”推向高潮的是《台湾文化》制作的“鲁迅逝世十周年特辑”。《台湾文化》作为“台湾文化协进会”机关刊物，创

刊于1946年9月15日，积极介绍“五四”以来的新文化和新文学。1946年11月，《台湾文化》第一卷第二期制作了“鲁迅逝世十周年特辑”。编者在《后记》中预言：“我们相信，这一本‘纪念鲁迅特辑’，对于台湾文化的贡献一定不少。”的确，《台湾文化》制作的“鲁迅逝世十周年特辑”已成为战后初期鲁迅思想和“五四精神”在台湾传播的一个标志性事件。后因“二二八”事件影响，“鲁迅风潮”受到一定的冲击，但是，“对‘鲁迅风潮’造成致命打击的，是一九四八年二月十八日许寿裳先生的被害”。许寿裳可以说是为鲁迅而死。至此之后，“鲁迅风潮”消退，鲁迅开始成为台湾文坛一个禁忌。

许寿裳是战后初期在台湾传播鲁迅思想的一位核心人物。台湾光复之初，祖国大陆有一批文化人来到台湾，传播“五四”新文化思想，致力于台湾新文学建设，其中包括许寿裳、台静农、黎烈文等与鲁迅交谊并在思想上接近鲁迅的左翼文人。1946年6月，许寿裳受陈仪之邀出任台湾省编译馆馆长。许寿裳到台湾后致力于鲁迅思想的宣传，先后发表了《鲁迅和青年》《鲁迅的德行》《鲁迅的精神》等重要文章，在台湾完成了两部专书《鲁迅的思想与生活》《亡友鲁迅印象记》。黄英哲研究认为，许寿裳之所以极力向台湾介绍鲁迅思想，是和他担任台湾省编译馆

馆长的职责有关，他希望借由鲁迅思想的介绍传播中国新文化运动的精神，以此作为台湾文化重建之道。陈建忠因此将许寿裳看作借鲁迅在台湾推行“中国化”诉求的代表人物，与此同时，陈建忠将在台湾大力宣传推行木刻版画艺术的黄荣灿看作借鲁迅在台湾推行“民主化”诉求的代表人物，两者共同促进了鲁迅的现实主义文学在台湾复苏。

《新生报·桥》副刊是战后初期“二二八”事件后一份维持时间较久且较有影响力的刊物。《桥》副刊创刊于1947年8月1日，1949年4月因“四六事件”的影响而宣布停刊，维持了20个月之久，共出刊223期，主编歌雷（原名史习枚）。《桥》副刊最引人注目的是，从1948年4月“百期扩大茶会论题征文”开始，进行了一场关于“如何建立台湾新文学”的热烈争论。杨逵等本省作家认为台湾文学有其特殊性，要先了解台湾文学的过去，才能再谈台湾文学的未来建设问题。歌雷将台湾文学定位为中国的“边疆文学”。而濂南人强调台湾的历史和自然环境相互影响造成了其特殊性，台湾文学的目标不是建立“边疆文学”，反对以“边疆文学”窄化台湾文学。“省内作家倾向于综合台湾历史与地理环境特质来发展台湾文学的特性，省外作家……以抚平历史伤痕、推动地域上的边疆文学祖国化为鹄的，的确存在着不易媾和

的歧异。”省内外作家虽然意见有分歧，可是他们和衷共济建设台湾新文学的高昂热情却是一致的。

“‘五四精神’与‘鲁迅精神’一样，乃战后初期两岸文化人沟通的语境，共同推许并发扬的文化资本。”1948年2月许寿裳被害后，“鲁迅风潮”戛然而止，而关于“五四精神”的讨论仍在继续。在《桥》副刊，本省文化人大都认为台湾新文学的发生受五四运动影响，而外省文人却进行了一场应该扬弃还是继承“五四”的争论。胡绍钟认为不必“回复五四时代”，扬风提出“不必向‘五四’看齐”，而孙达人、雷石榆、骆驼英则认为应该继承“五四精神”。继承“五四”与否的争论又进一步引发“中国社会性质”和“新现实主义”创作方法与世界观的争论。这些争论客观上促进了“五四精神”在台湾的进一步传播。

由以上分析可知，战后初期“五四”在台湾的传播以鲁迅作品和思想的推介为主要特点，以《台湾文化》等刊物为主要阵地，具有左翼色彩，但也因与国民党政治理念向背而遭到镇压，不过其影响力却已散播开来。

三、1949年之后“五四”的台湾传播与影响

“五四”在台湾的第三

波传播是以50年代《自由中国》传承“五四”自由主义精神为显性标志，以迁台作家对“五四”活的传承为隐性内容。

1949年“四六事件”发生后不久，国民党在台湾实施“戒严令”。1949年5月20日，台湾省主席兼警备司令陈诚宣告“台湾全省实施戒严”，直至1987年解严为止，台湾进入长达近40年的戒严时期。由戒严法延伸出来、直接与文学出版相关的法令是《台湾省戒严期间新闻纸杂志图书管制办法》。1949年国民党败退台湾时，大部分30年代已经成名的作家都选择留在祖国大陆，没有随国民党迁台，根据此法令，这些没有随国民党迁台的作家都被看作“匪干”，他们的作品也都在被查禁之列。因而台湾禁绝了祖国大陆30年代大部分作家的作品，鲁迅、巴金、老舍、茅盾、丁玲、沈从文等大多数作家作品都在被查禁之列，只有徐志摩、朱自清等少数几位作家因在1949年之前去世而免于被查禁。鲁迅虽然早在1936年就去世了，但是其作品的现实批判性早在战后初期就为国民党所忌惮，自然更在被禁之列。

国民党在台湾实施如此严苛的“戒严令”，整个50年代台湾都笼罩在白色恐怖阴影之中，“五四”在台湾的传播受到重挫。而《自由中国》是这肃杀年代中的一个异数，它以传

播“五四”的自由民主精神为己任，是1949年后“五四”在台湾传承的显性标志。《自由中国》创刊于1949年11月20日，创立之初打出的口号是“反共抗俄”，也因此与国民党有一段相处比较融洽的时期，甚至一度得到国民党的经费支持。可是后来蒋介石的独裁统治越来越变本加厉，这与《自由中国》所奉行的反独裁反专制、自由民主理念完全不相容，以致《自由中国》与国民党的关系越来越淡薄，到最后公开对抗蒋介石的独裁统治，雷震也因此于1960年9月4日被捕，《自由中国》亦被迫停刊。《自由中国》以胡适为发行人，实际的主持者是雷震，殷海光也是《自由中国》一位重要人物，是逆时代潮流而动、在台湾大力倡导“五四”自由民主精神的“五四之子”。而聂华苓主编的《自由中国》文艺栏更是成为50年代台湾文学历史的一个缩影，也显示出50年代台湾文学与“五四”新文学传统之间的关联性。继《自由中国》之后，《文星》杂志对“五四精神”也有所传承，使“五四精神”在台湾不致中断，但它已经没有《自由中国》那种以传承“五四精神”为己任的鲜明特色了。

除了《自由中国》对“五四精神”的显性传承外，在国民党严苛统治的政治环境中，1949年之后“五四”在台湾更